



引用格式:余斌. 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 ——驳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早产论”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4): 1-8.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01-08

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

——驳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早产论”

Why i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rather than the July Revolution

—Refuting Kautsky's socialist premature birth theory

余斌

YU Bin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考茨基提出了社会主义“早产论”。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的社会主义早产,并不是社会主义早产。如果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十月革命从酝酿到发生进行总体性的回溯,发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关键词:

十月革命;

早产论;

布朗基主义;

苏维埃

收稿日期:2017-10-26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8年创新工程项目(myycx201803)

作者简介:余斌(1969—),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家、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认为,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种社会主义“早产论”一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末,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早产论”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因而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2]。为进一步阐明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回应所谓社会主义“早产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挑战,本文拟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进行一个总体性的回溯,给予社会主义“早产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反驳,以正视听。

一、社会主义并未早产

其实,考茨基所说的“早产”,是指俄国社会主义的早产,而并非是指社会主义的早产。社会主义不但未早产,反而有点“过月”了。

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指出,“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由上述每个国家各自单独得出来的。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并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3]。在1844年写作《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即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美国的许多公社中以及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已经真正实现,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它们还颇有成效”^[4]。这在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被深刻地概括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43}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两个必然”。

但是,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592}人们据此得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似乎资本主义只要还能发挥出一些生产力,社会主义就决不会出现,似乎马克思放弃了“两个必然”或把“两个必然”无限期推后了。但是,这些人忽略了马克思在这里紧接着写下的这句话:“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5]592}按照这句话,既然《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那么解决这个任务的物质条件就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从而也就不存在所谓“决不会”的问题。正是如此,马克思在后来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中又再次提出同样的任务:“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

更进一步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

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3]26}。因此,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决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早产;反之,就欧洲而言,是“过月”了。“过月”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后,包括考茨基在内的第二国际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成为马克思本人所否定的那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考茨基的背叛,列宁1918年专门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对其进行了清算,此不赘述。

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的可能性

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8}。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发生也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

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计划在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来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并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说明了革命的策略。实事求是地讲,后来的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其实都是有意或无意地按照这个策略来进行的。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等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国内就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从而在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进而不得不武装无产阶级为他们卖命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也获得了抗衡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 and 政

治力量。这个时候,只要外界环境有利、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得当,在落后国家取得甚至率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7]

实际上,马克思曾明确反对别人把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8]466},并明确地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8]464}。

那么,为什么俄国和其他国家可以不必走那条似乎注定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们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只要这些国家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并且不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对此,马克思解释道:“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8]571}显然,只有像考茨基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才会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或不应当在俄国取得胜利。

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已经指出,在一定的形式和一定的程度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9]138}。于是,列宁在这里

提出的任务,正是十月革命所要完成的任务,“已是另一个任务,新的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公社派的’即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列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即反对走向公社,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的人)实行分裂”^{[9]138}。

三、列宁的革命策略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书》一文中针对那些对他的“四月提纲”的质疑曾作出过回应。

列宁首先自问:“我们会不会有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会不会有想‘跳过’尚未完成的(农民运动尚未失去作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呢?”然后,他指出,“如果我说‘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那就有这种危险。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我是说,在俄国,除了工人、雇农、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外,不能有别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除开不算)。我是说,目前俄国的政权只能从古契柯夫和李沃夫的手里转到这些苏维埃的手里,而在这些苏维埃中,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农民和士兵,如果不用生活上的、习俗上的、职业上的说法,而用阶级的说法,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说,那么占大多数的恰巧是小资产阶级”^{[9]142}。这说明,列宁对俄国的阶级关系状况十分清醒。基于这种状况,列宁认为,俄国就不能冒险从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跳跃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还特别指出,“在我的提纲中,绝对保险一点也没有跳过尚未失去作用的农民运动或整个小资产阶级运动,一点也没有由工人政府‘夺取政权’的儿戏,一点也没有布朗基主义的冒险行动,因为我直接提到了巴黎公社的经验。

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也正像马克思在1871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详细论述过的,这种经验完全排斥布朗基主义,完全根据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充分保证大多数人实行直接的、绝对的统治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我在提纲中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要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对这一点产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9]142-143}。

由此可见,列宁根本就没有实行早产社会主义的(军事)冒险主义打算,其策略主要是争取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人的支持,其依据完全来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主革命理论。

恩格斯曾经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进行探讨”^{[10]538}。有人据此歪曲恩格斯的意思,说他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所探讨的是:“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10]538-539}而历史的事实则表明,“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

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已经有了经验教训从而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10]540}因此,恩格斯所反思的只是如何克服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并去追求多数人的革命;其目的是强调要从表面上的或自称的民主革命转向真正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放弃暴力革命。列宁的革命策略正是这样的:“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因为在没有对群众使用暴力的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得政权。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反对沙文主义—护国主义,反对空谈,反对依赖资产阶级。”^{[9]133}这也正是列宁要求“工人阶级的党决不放弃合法活动,但一分钟也不对合法活动抱过高的希望,应当像在1912—1914年那样把合法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11]5}的原因。

四、列宁对七月起义的叫停

俄历1917年7月3—4日(公历1917年7月16—17日),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组织的一战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堡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爆发了群众性游行示威。这场自发的游行示威由第一机枪团带头,从维堡区开始,并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是决定劝阻群众,然后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又努力将其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上去。列宁本人于1917年7月4日赶回彼得堡,向游行的水兵发表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

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7月5日也发表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这场和平的游行示威,最后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镇压下去了,临时政府还以德国间谍罪的名义下令逮捕列宁。于是,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里,苏维埃成了它的附属品。^{[12]469}这样,七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就被各方面的力量扼杀了。列宁事后在答复彼得堡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的受审通告时指出,“谁也不否认,7月4日出现在彼得堡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大多数是站在我们党方面的。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官所说的‘组织武装暴动’的神话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们党完全有可能着手撤换和逮捕几百个官员,占领几十座国家和政府的大厦和机关等等。但是这类事情并没有发生”^{[11]37}。那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列宁为什么要叫停七月起义,从而使可能的七月革命流产了呢?

这是因为,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虽然也能够走自己的道路,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数半无产者争取过来。^{[12]412}而前面我们所阐述的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制定的革命策略意味着,决不能用寻常的方法去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因为它依靠第二个政府即工人代表苏维埃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这第二个政府是直接反映大多数工农的意识和意志的唯一可能的革命政府”^{[9]133}。而且,“一小批人夺取政权是不够的。俄国革命已更进了一步:除苏维埃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政权。资产阶级正是害怕这一点。只要苏维埃还没有取得政权,我们就不会把政权拿过来。但是必须由有生力量去推动苏维埃执掌政权”^{[9]240}。于是,虽然“这个政府可以推翻,而且应当推翻,但要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9]240-241}。而正是在这场后来被称为“七月事变”的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

维埃中占多数,布尔什维克只占少数。因此,“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取得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实际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妥协造成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11]143}。可见,正是基于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尚不可能夺取国家政权而起义则会造成无谓牺牲这个原因,列宁作出了叫停七月起义的果断决策。

列宁叫停七月起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到7月4日之间,革命有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较强的力量能够抗拒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而且还由于苏维埃内部各阶级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能够最和平、且代价最少地进行。^{[11]17}但是,七月事变之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11]18}。

不过,“工人的武装起义,只有同经济破坏和战争延长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的巨大高潮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11]2}。“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是:不仅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群众,而且要人民群众离弃已经背叛革命事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11]19}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仍然要实际地争取到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不是自以为可以代表多数的群众。

五、列宁对十月革命的坚持

1917年9月,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彼得堡

和莫斯科两个政权首都的工兵代表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列宁提出,“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11]232}。他指出,“如果说在7月3—5日有错误的话,那只是错在我们没有夺取政权。我认为,那时并不存在这个错误,因为那时我们还不是多数。而现在如果还这样,那就是致命的错误,甚至比错误更坏”^{[11]379}。

列宁还指出,“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也不是靠一个党,而是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既然这些条件已经具备,那么不愿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11]235-236}。

俄历1917年9月27日,列宁在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必须在党内进行鼓动,让大家认真对待武装起义,为此应当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寄给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11]259}他还直接给斯米尔加布置了军事准备任务。俄历1917年9月29日,列宁又撰写了《危机成熟了》一文。在该文中,列宁指出,“在俄国,革命的转折时机显然已经到来”^{[11]268}。同时,他还批评,“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或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或意见。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11]276}。在这里,列宁不仅从六个方面分析了起义的胜利是有保证的,而且“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没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议开幕以来所坚持的上述精神的主张,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维克

作出参加预备议会的可耻决定,把苏维埃主席团的席位让给孟什维克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几段话”^{[11]278},甚至提出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11]278}。这是列宁以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强势推动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的。

俄历1917年10月1日,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堡、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中又进一步强调:“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得政权,那就应当立即举行起义。……胜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11]333-334} 俄历1917年10月8日,列宁提出了如何把马克思关于起义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运用于俄国的办法,并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11]375}。然而,列宁的这个预期落空了,他关于起义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

俄历1917年10月10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指出,“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早就应当注意这个问题的技术方面。现在看来,大量的时间是放过了”^{[11]383}。在列宁的推动下,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尽管有两票反对):“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11]385}

俄历1917年10月16日,在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上,“列宁同志同米柳亭和绍特曼发生争论,列宁同志证明,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问题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他不认为这里所谈的有什么悲观主义。他证明,资产阶级方面的力量并不强大。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开始行动呢?从所有的材料都得出不出这种结论”^{[11]388}。会议最后形成决议:“号召一切组织、全体工人和士兵从各方面加紧准备武装起义,支持中央委员会为此而成立的总部;会议完全相信中央和苏维埃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方法。”^{[11]389}

然而,会后,彼得堡流传出一份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表示反对发起行动的手抄传单。对此,列宁愤怒地指出:“两个‘知名的布尔什维克’在10月20日这一紧要关头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战斗问题,竟在一家非党的而且正好在这个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携手反对工人政党的报纸上,抨击党中央没有公布的决定!这可是比普列汉诺夫1906—1907年在非党报刊上发表的那些受到党痛斥的言论还要卑鄙千倍,有害百万倍!因为当时涉及的只是选举的问题,而现在涉及的是举行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决定,——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11]412}正是这种工贼行为,使原定俄历1917年10月20日发动的十月革命被迫推迟,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以采取一些对抗革命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俄历1917年10月24日晚上,列宁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指出,“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11]430}。在列宁的强势推动和坚持下、在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革命群众的不懈努力,十月革命终

于于俄历10月25日爆发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六、结语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13]。俄国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早产,也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即以列宁为核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俄国人民证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实践问题。我们看到,从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到十月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列宁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坚实有力,根本不存在俄国社会主义早产的问题,更谈不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早产问题,而是恰恰相反,十月革命向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十月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了,欧美发达国家仍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说明那里本该发生的社会主义“过月”了,这不仅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危害,也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1929年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败和战争破坏,就是突出的例证。而1990年代苏联亡党亡国也不是验证了什么早产论,而是验证了社会主义实践如果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葬送或中断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进步事业这一真理。今天我们纪念十月革命,首先应当像列宁那样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中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正确道路,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

参考文献:

- [1] 卡尔·考茨基. 考茨基文选[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6.
- [2] 本书编写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2015年修订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70.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5.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1.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74.
- [7] 余斌,古胜红.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C]//程恩富,蒋乾麟. 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75-83.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 列宁. 列宁全集:第29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列宁. 列宁全集:第3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2] 列宁. 列宁全集:第30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0.



引用格式:张伟.论十月革命的三大合理性[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9-15.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09-07

论十月革命的三大合理性

On the three reasonablenes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张伟

ZHANG Wei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要: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其焦点主要是指向十月革命是否可能发生、必然发生、应该发生这三个存在某种递进关系的问题。其实,十月革命的发生有其内在的理论合理性、历史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1)从理论上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为十月革命的发生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存在条件,十月革命的发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指向相符合,从而具有理论合理性;(2)从历史上说,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俄国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其领导权之所以落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肩上,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真正代表了当时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并采取了适应群众要求的纲领、策略和行动,它符合俄国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从而具有历史合理性;(3)从政治上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一种公平公正、使人能够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瓦解,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某些改良,从而具有政治合理性。

关键词:

十月革命;
布尔什维克;
早产论;
两个决不会

收稿日期:2017-09-19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MYYCX201804);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伟(1977—),男,江西省玉山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从未停止,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困难的时期,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十月革命是否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否具有理论合理性;二是十月革命是否合乎俄国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即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三是十月革命对俄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来讲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即十月革命是否具有政治合理性。这三个争论的本质分别指向十月革命是否可能发生、必然发生、应该发生这三个存在某种递进关系的问题。本文将分别回应这些质疑,以期澄清误解,彰显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一、十月革命的理论合理性

1. “早产论”的逻辑错误

对十月革命的理论合理性质疑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当属“早产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撰写的《四月提纲》中提出,要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对此展开了反对和攻击。他们认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只有到俄国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将会给俄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考茨基延续并强化了这种观点。他在1918年为否定十月革命而撰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认为,十月革命好比是“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一论点就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早产论”。在“早产论”者看来,既然十月革命不具备发生的条件,它就不应该发生。

“早产论”者的重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

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592}。“早产论”者认为,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强调了生产力在新旧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就自然可以作为否定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依据。那么,从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能否得出俄国十月革命是“早产”的结论呢?我们不妨先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角度进行分析。

十月革命后出现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这与“两个决不会”中的第二个“决不会”直接相关,因此我们这里只讨论第二个“决不会”。我们可以将第二个“决不会”,即“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转换成一个逻辑命题——

如果“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未成熟,那么“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决不会出现。

那么,这个命题的逆命题则为——

如果“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出现”,则表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

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原命题与逆命题为等价命题,即如果原命题成立,则其逆命题也成立。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那么我们依据上述逆命题,就可以得出“现实世界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的结论。由此可以从逻辑上证明:既然在十月革命后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说明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

“早产”问题;同理,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并不存在矛盾。^[3]

近年来,有人认为,苏联的解体从实践上证明了十月革命的“早产”。这个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这如同将一个人英年早逝的原因归结为他的“早产”。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仅仅通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用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实现的工业化,并快速崛起超越了英、法、德等传统资本主义列强。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并且在战后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强国。实践充分证明了苏联及其新的生产关系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因而,十月革命并未“早产”,不是什么“早产儿”。

2. 十月革命胜利的物质存在条件的理论说明

前面我们只是依据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从逻辑上证明了十月革命爆发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但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还是一个封建性很强、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那么,为何说十月革命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析。

首先,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是否已经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4]564}。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产生“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不再仅受限于其国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还受益于世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俄国率先建立了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表面上看似乎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但如果进一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

察,这种“跨越”实则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只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在俄国等落后国家出现。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国摆脱了孤立状态,为俄国等落后国家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成果从而实现生产力水平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使其有可能跳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轨迹。因此,马克思以反诘的语气深刻地指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5]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实施的新经济政策,通过租让制积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主动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成果,为其巩固革命果实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了重要的铺垫。

其次,我们可以从生产力要素中劳动者的作用来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生产力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要素的有机结合,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力的主体。“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4]655}劳动者的素质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决定了其他两个要素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程度。十月革命胜利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得以极大激发,使生产力水平得以实现跳跃性发展。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在建

立过程中存在着其物质存在基础即生产力的自我强化的过程,劳动者既是这个过程的关键因素,又为这个基础提供了重要的主体条件。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592}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建立在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准备的、成熟的物质存在条件基础之上的,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基本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并不存在一个用来衡量某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否够条件的绝对的生产力水平标准。促进社会形态变革的革命在何时何地首先出现,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早产论”的理论错误在于其机械地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另外,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形态的更替、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往往不是首先发生在旧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发达的地方。例如,封建制度并非首先出现在奴隶制度最成熟的古希腊、古罗马,而是首先产生于奴隶制度并不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并非首先出现在封建制度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于封建制度并不特别发达的西欧。可见,“跨越”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并非罕见。当然,社会形态的跨越并非脱离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任意跨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是以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演进中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其巨大的生产力为前提的。

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物质存在条件只是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物质存在条件不具备不可能发生革命,但具备了物质存在条件也

并非一定发生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为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某个国家是否能够发生革命,还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因此,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合理性应从俄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中去探寻。

20世纪初的俄国存在四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俄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俄国“‘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6]。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的合法性日渐丧失,而不堪重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力也日趋接近临界点,革命一触即发。对此,沙皇政府束手无策,失去了足以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资源。这种情势表明,除进行革命外,俄国已经没有其他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俄历1917年2月19日,彼得堡因缺乏面包开始发生骚乱;23日,出现了自发性罢工,罢工规模在此后两天越来越大;27日,罢工升级为武装起义;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让位给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在继位后即宣布自己退位,并将政权交给其间成立的临时政府。至此,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7]

然而,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但它并没有缓解俄罗斯的各种社会矛盾。二月革命胜利后,饥饿的工人、农民和疲惫厌战的士兵都期盼着一个新社会的出现,形势稍为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并没有着力去解决劳动人民迫切关心的和平、面包、土地等问题。临时政府为得到协约国支持而继续对外进行战争,对工人关于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对生产进行监督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对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运动进行镇压,致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愈演愈烈。由于受到人民

群众的激烈反抗,临时政府危机不断^[8]并很快成了革命的对象,再次发生革命已不可避免。

于是,革命的领导力又历史地落到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当时在俄国主要的革命力量中,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多个党派,那么革命的领导力何以最终又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这与其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以及革命时机来临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列宁从建党初期就反复申明,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格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9]⁹⁵列宁主张,党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就应当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善于对一切专制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列宁提醒全党要为时刻可能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9]¹⁶⁸

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当时最具号召力和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从而使它拥有其他党派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优势在革命时机到来时势必会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积极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充分利用推翻沙皇后的社会自由形势,十分注重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致力于在工厂、工会、

农村、军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各大工厂组建工人赤卫队。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队伍随之迅速扩大,到1917年4月底,布尔什维克已拥有10万名党员;而到七八月间布尔什维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为拥有24万党员的政党组织。正是布尔什维克艰辛而又卓越的基层组织和宣传工作积累起来的领导力与影响力,使其在平息1917年9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并因此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占居了多数。而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胜利加速了其他地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进一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到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已激增至35万人。随着布尔什维克实力与影响力的迅速增加,二月革命以来形成的脆弱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力量对比迅速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面发展。^[7]叛乱平息后,列宁曾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建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保持民主革命力量在军队进攻彼得堡时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以夺取政权。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因害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加强,对这一号召没有回应,夺取政权的领导任务自然落到布尔什维克身上^[10]。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纲领,兑现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承诺,由此赢得了俄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从而使其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赢得后来的国内战争和抵御外国干涉战争的胜

* 当时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试图建立独裁统治而从前线召回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来对付“不听话”的首都驻军,而科尔尼洛夫则希望自己成为独裁者。当科尔尼洛夫把军队集结到彼得堡后要求解散临时政府时,克伦斯基遂将科尔尼洛夫的行动称为军事叛乱,并求助于革命组织和工人武装。布尔什维克在瓦解叛军、平息叛乱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叛乱事件让首都士兵明白临时政府召回前线部队是为了对付自己,科尔尼洛夫军队中的士兵也明白了自己的角色,这导致广大士兵不再相信政府并纷纷转向布尔什维克。

利,保卫和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而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领袖人物的主观选择,更不是什么“密谋”“政变”“冒险主义的结果”。布尔什维克能够成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是俄国广大工农群众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选择。^[12]

三、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

革命需要打破原有的国家机器,冲破原有法律制度的限制,而统治者则会通过暴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这就决定了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包括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站在封建特权阶级的立场上看是非法的,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本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进步,它们无疑是具有政治合理性的。考察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同样不能抽象地站在某个落后阶级的角度去看其是否合法、是否使用了暴力,而应该看它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进步。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十月革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制度创新

十月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重大制度创新。资本主义制度是“物支配人、金钱支配一切”,而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制度,则以“人支配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它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文明的制度。这种制度追求并初步实现了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幸福——公平、就业、福利、教育、民主、和谐,展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公正、自由、平等、民主、互助、和谐

的新社会文明。它通过建立公有制经济,铲除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使社会生产的不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从而为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提供了条件;它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组织社会生产,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的无序和盲目而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它建立起了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在内的全民普遍享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所能实现的最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公正。^[13]在新自由主义泛滥导致全球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西方国家政府穷于应付的今天,回望这些具有革命性的制度创新成果,令人更加认同十月革命伟大的开创意义。

2. 十月革命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

马克思曾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690}现代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野蛮的殖民掠夺和奴役基础之上的。残酷的殖民掠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造成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极端贫困与落后,使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推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摆脱被剥夺和被奴役的状态,才能走向自主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和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意识,提振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摆脱被奴役地位的信心,从而极大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后,一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普遍将“走俄国人的路”“以俄为师”看作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有效途径。1918—1923年,中国、朝鲜、蒙

古、越南、印度、印尼、土耳其、伊朗等国都纷纷掀起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猛烈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并为二战后进一步摧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

3. 十月革命迫使资本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全世界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削弱社会主义俄国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对工人阶级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在改良过程中,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素被吸收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的改良在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时,客观上提高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地位,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政府开始承认工会的地位和工会活动的合法化,设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禁止雇用童工,取缔血汗工厂,一些国家左翼政治力量也得到快速发展,有的还上台执政并主动推行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和调节,在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产业设立国有企业,对私人垄断资本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减少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经济波动。在社会方面,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就业救济,实施累进收入所得税,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贫富差距。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改良,虽然并没有改变其根本性质,但也减褪了其原来野蛮的本色而变得“人性”“文明”起来,劳动者阶级的权益和生存状况得到一定的提升和改善。苏联解体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下降,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地位又开始下降,工人的很多福利和权利被削弱

或被取消,而对资本的管制则以自由化的名义不断放松,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下降,在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却在增加。这些现象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削弱后开始向野蛮方向倒退,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

参考文献:

- [1] 卡尔·考茨基. 考茨基文选[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76.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张伟.“两个决不会”思想与落后的社会主义[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5):39.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 [6] 列宁. 列宁全集:第39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
- [7] 蒲国良. 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4):19.
- [8] 周玉,马建军. 论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视解[J]. 理论月刊,2008(2):71.
- [9] 列宁. 列宁全集:第6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0] 普里马科夫班婕 E. 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J]. 俄罗斯研究,2011(3):81.
- [11] 陈之骅.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历史意义[J]. 史学理论研究,2007(4):4.
- [12] 宋萌荣. 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质要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 科学社会主义,2007(4):20.
- [13] 赵曜. 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J]. 科学社会主义,2009(6):29.



引用格式:陈宏滨,赵娜. 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16-24.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16-09

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之因

The reason of history nihilism of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陈宏滨, 赵娜

CHEN Hongbin, ZHAO Na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苏联解体中,历史虚无主义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通过各种手段全盘否定斯大林,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他们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推动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主要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推行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等。当然,对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击是由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叶利钦完成的。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推动苏共变色、苏联解体蓄谋已久。

关键词:
苏联解体;
历史虚无主义;
十月革命;
共产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

收稿日期:2018-03-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201511000303003);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一般项目(201411000303012)

作者简介:陈宏滨(1967—),男,湖南省宁乡市人,湘潭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9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高歌猛进中遭受重创,跌入低谷。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苏联解体之原因,我们认为,历史虚无主义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拟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危害机制、支持力量三个方面,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以求教于学界。

一、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

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其集中表现为: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通过各种手段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

1. 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内的苏共历史

与其他国别的历史虚无主义相类似,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的侵蚀是从抵毁、否定苏联革命史入手的。1980年代,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列宁,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他们随意编造十月革命的历史过程,攻击和挖苦列宁的正确领导,否定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最典型的代表是亚·齐普科,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杜撰了《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一文。该文错误地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扰乱了当时俄国的正常历史进程。当然,十月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对十月革命进行评价,结论自然是荒唐的。但就是这种荒唐的结论,给苏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篇文章表面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则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1]。

十月革命是一场武装起义,但反动势力作鸟兽散,根本没有负隅顽抗,没有出现血流成河的后果。从某种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是以一种较为和平的方式取得胜利的”^[2]¹⁷。的确,当时攻下冬宫后,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委员

霍尔文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德宾科报告了武装行动的损失情况。他说,武装起义中“死5名水兵、1名士兵,伤多人”^[2]¹⁷。

除少量的人员伤亡外,破坏情况也很轻微。据伯努瓦记述,从亚历山大花园的那头开始,熟悉的景象依然如同昔日,看不到任何战斗的痕迹^[2]¹⁷。约翰·里德在第一时间写出了关于攻打冬宫的报道,做了最为真实的历史记录,其《震撼世界的10天》也记录了与伯努瓦的描述一致的情况。这些资料都说明,并非如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渲染的那样,十月革命是一场血腥和暴力的革命。

十月革命之所以没有遭到反动势力的负隅顽抗,是因为十月革命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虚无主义者渲染十月革命的血腥和暴力,只能说明历史虚无主义罔顾历史事实,这也暴露出他们颠倒是非的真实面目。

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否定十月革命,而且歪曲苏联一些历史事件。例如,歪曲1918年的“行骗案”,由此造谣苏联实行“共产共妻”的社会制度。这次“行骗案”的经过是:无政府主义者赫瓦多夫,出于自己敛财的目的,假借政府名义散布《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审判赫瓦多夫的庭审中,法官们围绕对性的认识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直接影响了对赫瓦多夫的公正审判。这次闹剧在西方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度成为仇视社会主义政权者的口实。例如,当时英国著名作家戈尔别尔特·韦尔斯不怀好意地向列宁核实该事件。列宁当时就斩钉截铁地提醒韦尔斯,共产主义政权从未发布过诸如此类的文件,也从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口头命令,并警告韦尔斯等人不要栽赃陷害。但随着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侵蚀的加深,本来已成为定论的历史事件,却成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混淆视听的工具。

2. 全盘否定斯大林

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否定包括十月革命在

内的苏共历史,而且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历史人物。作为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按理说应当维护斯大林的权威,但他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次会议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标志。总体来说,历史虚无主义者全面否定斯大林,开端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集中表现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具体地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斯大林,渲染和夸大斯大林在领导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对斯大林的否定,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呈全方位攻击之势。他们不仅从人格上攻击斯大林,而且夸大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批判和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

经过列宁的艰辛探索和斯大林的大胆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和工业的全民化。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更为难得的是,取得卫国战争伟大胜利后不久,苏联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历史虚无主义者十分狡猾,他们意识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办法就是否定斯大林本人及其在位时期所开展的运动。

历史虚无主义者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切入点是斯大林在位时期所做出的一些错误决策,尤其是“大清洗”运动。他们的主要伎俩是,肆意渲染“大清洗”运动的错误且恶意夸大受害者数量。

应当承认,斯大林当年确实有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嫌疑,酿成了“大清洗”运动的悲剧。为了准确把握“大清洗”运动的影响,弄清“大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数量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围绕“大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数量,历史虚无主义者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此,我们可从苏共中央委

员会1957年7月全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据这次大会公布,“在1937—1938年共逮捕了约150万人,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 692人”^[3]。2000年,俄罗斯学者泽姆斯科夫根据最新解密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为1 575 259人。”^[3]

如果说,以上数据来源于苏联官方或者俄罗斯官方,那么不妨与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和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所采用的数据作一下对比。康奎斯特在其著作《大恐怖》中指出,在1936—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至少有600万人被捕,300万人被处死,200万人被埋葬在集中营”^[4]。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控与大混乱》中指出,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是一场失控的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由此造成苏联非正常死亡人数不少于2000万,甚至可能超过2500万。我们虽然不知道布热津斯基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何处,但其确实令人震惊。尤其是他认为1937—1938年这段时间,苏联“有100万人被枪决,另有200万人死于劳改营”^[5]。后来,号称戈尔巴乔夫精神教父的雅科夫列夫认为,“大清洗”运动有4100万人被判刑,又说有2000多万人是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3]

从以上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20世纪苏联“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的人的数量,如果说苏联官方或俄罗斯官方的数据只是十万级,英国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采用的数据拔高至百万级,那么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则将该数据夸大到千万级。从中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者编造历史与试图抹黑斯大林的险恶用心。在妖魔化斯大林的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者无不将其推至极致,一度甚至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3. 抹黑苏共创始人列宁

为了彻底否定苏共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

利用苏共当时对德国帝国主义的策略性做法,抹黑苏联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列宁。历史虚无主义者抹黑列宁主要是通过造谣或传谣进行的,如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

为准确认识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或传谣的事实,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制造列宁谣言的历史背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资产阶级在国际上共同剥削无产阶级,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形成了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面对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支持一方且参与战争,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则反对战争。随着俄国国内斗争的不断激化,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封建沙皇尼古拉二世无奈地退位,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获取了国家政权。这样,当时的俄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存的局面。面对如此状况,列宁不得不思考“无产阶级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身在瑞士的列宁迫切需要返回俄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列宁返回俄国只有两条路:一是途经德国、瑞典到芬兰,然后回国。但面临的困难是,俄国与德国正在交战,德国不会让他回国。二是绕道法国,渡海去英国,经海路回到俄国。由于俄国与英法是协约国,俄国当局肯定会阻挠列宁回国闹革命,英法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借道给列宁这样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正当列宁在如何回国这个问题上感到焦头烂额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主导下的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德国无奈地应付东西两条战线的战争。有一个时期,德国在东方战线与俄国作战的军队规模超过在西方战线与英法作战的军队规模,这使德国备受困扰,担心顾此失彼,导致战争失利。此前,“凯撒(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号)企图同沙皇缔结单独和

约,但没有成功。”^[6]当时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和军事战略考虑,德国急需缓解与俄国的东线战事,同意协助列宁乘坐由德国安排的“密封列车”回国。出于战略需要,列宁接受了德国的安排与支持。回国后,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积极领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批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制定的《四月提纲》,代表无产阶级主张“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领袖克伦斯基等人,在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由于逐步处于劣势,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便采用造谣的手段,这就是“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谣言的起源。

对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的做法,不值得过多地驳斥,这里只扼要提及一下。对于指控列宁提出的“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策略,如果不是出于幼稚,就是造谣。至于由列宁承认德国强加给苏联人民的《布列斯特和约》而造谣“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谬论,如果不是诬陷,就是忽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国际国内的险峻形势。当时,苏联外部面临协约国和同盟国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内部遭到高尔察克、尤登尼奇、邓尼金等反动武装的威胁。面对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俄国共产党当时困难重重。1918年3月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就间接地提及过此事。该决议指出,俄共“没有军队”,苏维埃“前线士气低落”^[7],在这种十分无奈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必须调整战略部署,必须与德国媾和,以赢得一切可能的喘息机会。

二、历史虚无主义对苏联解体的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来瓦解社会主义苏联的思想基础。

1. 通过瓦解主流意识形态扰乱人们的思想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此缔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先后取得了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苏联成为当时能与资本主义大国相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

然而,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一报告全盘否定了作为列宁接班人的斯大林。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相当尖锐。为维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地位,斯大林实施了“清洗”运动。这一基于当时苏联国内外局势而作出的决策实乃是无奈之举。至于平庸的执行者将“清洗”运动推演为“大清洗”运动,斯大林自然要承担领导责任。

在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前,苏联领导层和群众对“大清洗”运动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历史事实。如果苏联共产党能够认真反思,深刻吸取教训,采取稳妥的方式纠正错误,就会对党的领导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赫鲁晓夫突然且不计后果地批判斯大林,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贡献,在苏联和国际共运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有人开始质疑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指导思想。就连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当时也十分担忧苏联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对此还有所作为,那么到了其继任者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则完全对此无能为力了。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比较僵化,仍然是遵循以前的做法,现实针对性也不强,难以澄清人民头脑中的糊涂观念,达不到以正视听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所谓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改革。由此,苏联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多元化局面进一步突显,尤其是对斯大林

的评价十分混乱且无底线。就连美国合众国际社都认为,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暴露在公开性原则的聚光灯下”^[8]。由此导致大量的文章用信件或回忆录的形式,质疑和挖苦斯大林的每一个重大行动,苏联社会生活中由此出现了一种公开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者趁机在文学界、史学界与政论界等领域推波助澜,苏联社会由此掀起歇斯底里地批判斯大林的高潮。

伴随这种高潮的加剧,历史虚无主义者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地否定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毫不手软地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出现的失误与错误,并以此为契机,颠覆苏联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念,代之以新自由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念。

2. 通过否定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们的价值追求

为颠覆苏联人民的价值追求,历史虚无主义者将罪恶的目光瞄准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知道,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深入人心,鼓舞着苏联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社会主义成为苏联人民的价值追求。

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鼓噪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开始动摇。戈尔巴乔夫公开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实践的合理性,企图动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1987年7月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攻击苏联中小学历史课教材,污蔑“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9]。这种现象不仅表现于苏联的重要新闻媒体,而且反映在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重要决策中。苏联教育主管部门是维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部门,但竟然于1988年6月取消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于1989年销毁全国所有学校的历史课教材,于

1989年12月在苏联所有高等学校停止开设马列主义课程。如果说取消历史课考试,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等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阵地,那么取消马列主义课程,则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遭受了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阵地丧失了。

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攻击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开始瓦解。与戈尔巴乔夫公开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相呼应,历史虚无主义者歪曲说,“马克思主义是造成社会主义‘罪恶’的根源”,荒唐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已经过时”,甚至叫嚣“将马克思主义从俄国驱逐出境”^[10]。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否定苏联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展开的。苏共二十大后,苏共部分党员和群众开始质疑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先进性。部分群众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将党的领导人塑造成独裁、残暴的封建帝王;部分群众出于对被批判、被处理或被清洗的朋友和邻居的同情,将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暴力与血腥统治。这样,人们便由质疑党的领导人,推及质疑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还比较单一,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则进入全面化、系统化阶段。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限于理论上而且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否定。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推崇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攻击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推崇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推崇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体制。

3. 通过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人们的精神支柱

为了动摇苏联人民的精神支柱,历史虚无主义者盯住了共产主义信仰。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建立于虚幻的说词基础上,而共产主义信仰则建立在科学理论上,是具有真理性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的真理性体现在共产主义认识的科学性与共产主义实践的正确性之中。

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苏联共产主义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动摇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仅看不到苏联共产党取得的历史功绩,而且还放大苏联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失误,如闭口不谈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却大肆渲染斯大林执政时期出现的失误。历史虚无主义者一方面大肆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鼓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对苏联人民进行的精神引诱中,他们一方面鼓吹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和经济自由,另一方面美化与吹捧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他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用对比的方式,否定集体主义,宣扬个人主义;通过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法是,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并将这种情绪的矛头指向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1],不断地对苏联民众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

历史虚无主义者还通过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动摇苏联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改革“新思维”,其实质是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戈尔巴乔夫这一错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严重打击。苏联人民对苏联共产党的执政逐渐失去了信心,从而导致苏联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更可悲的是,苏联人民逐渐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动摇对

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此,我们可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99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的一项社会调查来证明。这项调查的对象是苏共党员,调查的主题是对党组织前途与命运的看法。该调查结果显示,21%的党员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威信,67%的党员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12]。苏共党员对党的态度、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态度如此,共产主义的科学性遭受到何等的否定可想而知。

三、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

如果说揭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机制,是为了把握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那么探索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则是为了分辨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首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历数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斯大林在“大清洗”运动中杀害无辜,在卫国战争初期军事指挥失误,在处理民族问题中措施欠妥,在共产国际运动中干涉南斯拉夫内政。然后,将斯大林界定为政治专制、搞个人崇拜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不仅全面否定斯大林个人,而且全面否定斯大林执政时期做出的历史贡献。我们承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完美,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犯过错误,但斯大林的历史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正是今天俄罗斯人民怀念斯大林的缘由。对此,我们可以从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中来说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评价,其动机绝不可能是赞扬的。但丘吉尔客观地指出,

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13]。丘吉尔的这一评价,十分中肯,尊重历史。这个评价由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作出,足以说明斯大林执政时期做出的历史贡献。

当然,前面也已提及,全盘否定斯大林有极其严重的危害。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及时且准确地预见到了。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14]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无论从客观历史还是从政治上分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都犯了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造成了苏联人民思想上的混乱。“潘多拉魔盒”被赫鲁晓夫打开后,代表反动势力的部分学术研究与舆论宣传又进一步推波助澜。历史虚无主义者趁虚而入,开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攻击苏联社会主义。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以说是一把钥匙,它为历史虚无主义者打开了否定和歪曲苏共历史的大门。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标志着历史虚无主义者开始正式登上苏联历史舞台并产生巨大危害。这样,赫鲁晓夫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成为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一大支持力量。

2. 推行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

如果说赫鲁晓夫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则是完全自觉地成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支持力量。其实,对于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人民是寄予了厚望的。刚开始,戈尔巴乔夫顺应苏联人民的愿望,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他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思想上进行垄断,这是专横的、极权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已

经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合时宜,应当实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和民主性过程中,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现象日益严重,其实质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当时,雅科夫列夫深受戈尔巴乔夫的信任,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戈尔巴乔夫对他寄予重望,安排他负责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雅科夫列夫一上任,马上撤换《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星火》与《文学报》等主流报刊的主编,启用了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

正是这一助力,历史虚无主义者将这些主流报刊演变为他们的宣传工具,将这些主流报刊改造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作为苏共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竟然发表社论对坚定的女共产党员尼娜·安德雷耶娃展开批判;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也在《新世界》上发表文章攻击列宁。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痛心他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期间,苏联“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入侵我国时用火和剑未能实现的目标”^[15]。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著名历史学家利加乔夫愤慨地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报刊上发表歪曲和否定苏联历史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极右报刊所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16]。历史虚无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歪曲苏联历史,试图向人们表明,生活在社会主义苏联的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受着折磨。似乎由于有了十月革命,有了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历史就中断了。正是这种不真实、不公正、恶意中伤的报道,严重败坏了苏联的社会风气。在这种氛围下,历史虚无主义者将矛头指向了苏联人民对苏维埃光荣历史的怀念。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历史虚无主义蔓延

营造了适宜的土壤,无疑助长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气焰。从这一期间报刊电台等主流媒介的人事安排及其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为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的猖獗扫清了障碍。从戈尔巴乔夫否定苏联共产党光辉历史与苏联社会主义成就中,我们可以发现,戈尔巴乔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大支持力量。

3. 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

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猖獗,既是苏联内部反动势力作恶的结果,也是西方反动势力“和平演变”作祟的结果。苏联建立伊始,就遭到西方国家的敌视和遏制。在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无效后,西方国家一直在苦苦寻找削弱或摧毁苏联的契机与方式。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带来了希望。他们一方面运用政治与经济手段遏制苏联,使其无暇顾及历史虚无主义的作恶;另一方面,利用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促使苏联人民思想发生混乱。他们深信,只要内外结合、软硬兼施,就能达到削弱或摧毁苏联的目的。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在电文中他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1947年,他作了《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报告,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该报告的核心内容是软化和演变苏联。凯南认为,如果苏联“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受到破坏的话,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17]。该报告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继承并发展了乔治·凯南的思想,于1953年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强调:“我们希望鼓励苏联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上自由的威胁。”^[17]这样,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图谋便完整地出现了。从此以后,美国历届总统对包括苏联在内的社

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有了清晰的路线。当然,美国历届总统或主要领导人关于“和平演变”有不同的提法,如杜勒斯将之定义为“解放政策”,尼克松将之定义为“不战而胜”,里根将之定义为“遏制战略”,布什将之定义为“超越遏制”。但是,不管形式如何,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增强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欺骗性,使其逐渐西方化。

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极力迷惑苏共主要领导人。可悲的是,苏共主要领导人逐步成为了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在苏联的政治工具。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曾经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诱骗戈尔巴乔夫,导致戈尔巴乔夫不断作出符合西方利益的决策。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培植大批拥护西方政治体制的代言人。杜勒斯毫不讳言地宣称:“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崇拜、背叛行为崇拜。”^[18]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常常与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纠缠在一起。众所周知,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是西方资产阶级谋划的产物,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利益。某种意义上,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在苏联的代言人。西方“和平演变”反动势力是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在国外的支持力量。

当然,对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击是由叶利钦完成的。至于叶利钦在苏联历史虚无主义阵营中扮演什么角色,有待我们深入研究。总之,苏联历史虚无主义者推动苏共变色、苏联解体是蓄谋已久的。

参考文献:

[1] 李慎明. 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34.
[2] 闻一. 十月革命:阵痛与动荡[M]. 广州:广东人

民出版社,2010:17.

- [3] 吴恩远. 从档案资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J]. 世界历史, 2003(4):26.
[4] 斯·库尔图阿. 共产主义黑皮书[M]. 莫斯科:莫斯科出版社,1999:189.
[5] 郑异凡. 斯大林时期镇压规模考[J]. 世界历史, 2003(4):14.
[6] 路易斯·费希尔. 列宁的一生[M]. 彭卓吾,译.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182.
[7] 列宁. 列宁全集:第3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2.
[8] 江流,陈之骅. 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61.
[9] 肖三,王乐,李清津. 实现中国梦必须汲取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教训[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5(2):28.
[10] 窦凌. 苏联剧变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J]. 求实,2006(7):70.
[11] 苗志娟. 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文化安全视域下的解析[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2(10):26.
[12] 陈爱茹. 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124.
[13] 李士坤. 《共产党宣言》与社会实践[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62.
[14]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91.
[15] 陈之骅. 意识形态自由化的恶果 历史虚无主义搞乱苏联[J]. 人民论坛,2013(9):68.
[16] 叶·利加乔夫. 戈尔巴乔夫之谜[M]. 赫崇骥,方黎,徐光良,等,译. 北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137.
[17] 梁柱.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思考[J]. 新视野, 2011(4):10.
[18] 尼·伊·雷日科夫.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 徐昌翰,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8:1.



引用格式:吴永辉.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逻辑体系[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25-34.

中图分类号:D262.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25-10

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逻辑体系

On the logical system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吴永辉^{1,2}

WU Yonghui

1. 河南大学 经济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制度创新是继理论创新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保持活力的又一关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制度创新的总目标,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作为制度创新的两大主线,把执政党的建设、国家治理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作为制度创新的三大领域,把人民立场、精准务实、立破并举、统筹有序作为制度创新的四大原则,把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五大着力点。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实践,对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新时代;
制度创新;
党的建设;
国家治理;
国际治理;
人民立场

收稿日期:2018-04-1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BKS003)

作者简介:吴永辉(1979—),河南省南阳市人,河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制度创新作为贯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新时代“三步走”战略安排的核心举措。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新历史使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制度自信与改革创新相统一,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在党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推进一系列精准务实的制度创新实践,有效应对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积极化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在新时代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为走出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关系构建困境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框架。本文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诸多领域制度创新的专题性研究基础上,力图从整体性视角把握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框架和脉络,展现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逻辑体系。

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总目标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百年目标的蓄力和整合阶段。这一阶段的问题和矛盾最集中,我们既需要有效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又需要妥善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异常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助

力当前全球问题的化解和全球化进程困境的破局。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制度创新实践,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关键,构建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治理结构,形成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科学导向,实现全社会的凝心聚力和资源的统筹协调,有效破解了诸多发展难题和困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核心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现代化治理结构和治理行为相适应的制度体系。20世纪以来的全球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凸显出制度创新对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对于广大新兴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其重要性体现在:为新兴国家摆脱基于发达国家利益的现代化模板、踏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国家整体安全保障和战略导向。20世纪中叶以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西方民主陷阱,甚至丧失经济和政治国家主权的诸多新兴国家发展历史一再证明,适合自己国情的制度创新实践是新兴国家在21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推动现代化的基本政治前提。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部分,与西方发达国家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三权分立”的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般理论虽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但其具体实践和制度内涵会因为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国情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

“在中国,以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将党的执政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这一国情决定了中国政治领域的现代化目标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板具有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推动制度创新的目标不是西方“三权分立”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政治体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是党的执政能力的现代化和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两条主线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遇到了新问题和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制度创新实践的问题导向。

首先,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3]其中,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上存在的种种问题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4]¹⁶因此,以制度创新推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开启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的伟大工程,是解决我国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的关键。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的始终。因此,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逻辑主线之一。

其次,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主要矛盾化解的制度诉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法治化亟待加强。一方面,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最大政治优势。然而,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国内外存在质疑、否定党的全面领导的声音;新形势下,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的“四大危险”进一步弱化了人民群众对党的全面领导能力的信任。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面临大变革大调整,国内现代化进程也进入到了改革攻坚阶段,系统性矛盾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交织叠加。回应质疑、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性和协调性问题;全面依法治国,完善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从根本上讲,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增强党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领导,完善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和执行能力,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诉求。因此,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然成为党在新时代推动制度创新的逻辑主线之一。

三、执政党的建设、国家治理、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三大领域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属性决定了党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不仅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问题,还要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这三个层次的制度创新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球政党大会主旨讲话中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5]8}。

1. 执政党建设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首要领域

加强执政党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属性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不忘初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客观需要,更是建设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完成党在新时代历史使命的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人民群众是否会一如既往地信任、拥护党的领导,取决于执政党建设能否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形势,取决于党的执政体系和执政能力能否一如既往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并且把制度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这体现了执政党建设在新时代的新要求。

2. 国家治理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主要领域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是人类共同体的主要存在形式,国家治理也必然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国家治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治理,现代社会人们多层次生活和多元化利益诉求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国家治理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能否让生活在一国之中的人享受到更多的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的完善始终是现代社会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就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提供制度保障。

国家治理作为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主要领域,就是要以制度创新实践同阻碍改革的顽瘴痼疾做斗争,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提高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补齐民生短板,进一步落实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 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重要领域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已经超越国界,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对于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积极参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是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方式。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高度重视对国际关系的持续影响,注重以实际行动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的构建。

这也是基于中国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新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走上了全面融入全

全球化的道路,我们在这个进程中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当今的国际关系是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广大新兴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其国民利益不仅得不到保护,而且还在不合理的国际关系中被剥夺。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应坚定不移地推动国际关系的变革,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提供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理念和制度框架。这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人民立场、精准务实、立破并举、统筹有序,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四大原则

党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秉承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在制度创新上的一贯特色,即民族性、时代性、先进性、渐进性。民族性体现在制度创新扎根中国社会的土壤,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既不因循守旧,也不迷信教条和西方经验;时代性体现在制度创新与时俱进、针砭时弊,反映并致力于解决现实矛盾和适应时代诉求;先进性体现在制度创新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主义的先进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目标;渐进性体现在制度创新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妥善处理,点面结合,以稳为先,循序渐进。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诸多特点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密切相关,并内含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要求。

一是人民立场原则。为人类解放和进步事业而奋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原则。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党章中,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

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制胜法宝之一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更是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源泉。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到中共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人民立场作为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首要原则,其内涵是在坚持党的宗旨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改革创新,以更加科学、规范、民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服务于人民的当前和长远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内部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决定了在不同领域的制度创新中,人民立场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实践中,人民立场主要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创新理念,即构建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实践中,人民立场主要表现为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创新理念,即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和法制体系,从国家治理到民族区域自治,再到社区基层自治,都充分尊重和坚决捍卫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在现代化经济治理结构的制度实践中,人民立场主要表现为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为人民的创新、创业提供公平竞争、合作共赢的市场氛围和法治保障;在社会民生领域的制度实践中,人民立场主要表现为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质量、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精准扶贫攻坚等;在文化领域的制度实践中,人民立场主要表现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制度实践中,人民立场主要表现为以

制度建设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满足人民对生态宜居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是精准务实原则。精准是指制度创新举措不千篇一律、不搞一刀切,而是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问题意识,抓住关键环节和重点问题。务实是指制度创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作为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则,精准务实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制度创新上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重视实践的风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4]74}从党的建设、社会治理到国家治理,党的制度创新始终瞄准现实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强调制度创新的针对性和务实管用。正是由于围绕着问题,制度设计没有泛泛而谈,而是具体到人,具体到事,实施分类诊断,精准治理。随着在各领域精准实施的改革举措的协调推进,我们党解决了一些多年来想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许多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反腐倡廉、精准扶贫、政府机构改革、生态治理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曾经的顽瘴痼疾通过精准的改革举措得以解决,改革赢得了民心民意,改革成效在国际场合得到积极评价。

务实作风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建立和实施求真务实的制度体系的重要性。例如,党在新时代的干部选拔任用问题上,强化责任担当,建立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的干部选拔机制;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突出政策和制度的执行力、实效性。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37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要落地生根和重在实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实施方案上要上连天线、下接地气,各项指标要切实可行,实施措施要务实管用,拿起来就能干;在改革推进上要讲求战略战术,注意方式方法,做到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办一件事成一件事;在评价改革成效上要坚持群众立场,关键要看办成了多少事,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群众到底认不认可、满不满意”^[6]。这就充分体现了党在新时期的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求真务实精神。

三是立破并举原则。改革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就制度创新的结果而言,先破后立是常态,但从制度创新的全过程来看,科学的制度创新必然是在把握主要矛盾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理念先行,立字当先。首先树立制度创新的基本理念、目标原则、战略布局,然后才是在实践层面上针对问题和短板,立破并举、推陈出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优势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制度创新理念指导改革实践,在长远和整体规划中为改革谋篇布局,理念先行;在战略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中推动新旧制度从点到面,立破并举。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实践充分“彰显了立字当头、立破并举、创新为要的科学导向”^[7]。

在党的建设领域,制度治党、思想治党和反腐倡廉并行,相互促进,立“明规矩”,破“潜规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上,十八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的“新三步走”战略,为制度创新确定航向;在经济改革这一中心环节上,我们党提出了经济新常态和“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推出了立破并举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实施

了“三去一降一补”为主体的创新举措,有力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框架,在此基础上以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金融体制和国际贸易体制改革。

四是统筹有序的原则。党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高度注重制度创新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要求做到各项改革举措的统筹联动、衔接有序。首先,统筹有序地推动制度创新是由党在新时代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改革进入攻坚期,诸多矛盾和问题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项单独的改革举措都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受到来自于各方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和责难。系统性的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整体性、系统性的改革举措来应对,形成相互衔接、环环相扣的制度创新体系。只有这样,改革才能既确保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可控,又能实现对常年积累的顽瘴痼疾的根本性解决。其次,统筹有序的制度创新原则也是形成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新时代的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决定了党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必须致力于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效应和制度的联动效应。

统筹有序的制度创新原则体现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各项改革举措中。从组织机构上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先后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等 20 多个由中央牵头的领导小组,从国家监察委员会开始,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的制度创新,目的就是要从党中央的全面领导层面统筹协调各领域改革,使之相互配套、协调推进。从具体的制度创新实践看,党和国

家实现了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统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这些都是对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系统性、统筹有序的改革原则的积极实践。

五、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制度创新的五大着力点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制度创新贯穿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始终,推动了一大批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制度创新实践。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于过去 5 年的历史成就给予了高度肯定,明确了持续推进和深化诸多制度创新实践的方向,制定了未来党和国家制度创新的阶段性目标。概括起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以下既紧密相关又互有侧重的五大着力点。

1.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基本着力点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创新实践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在每个阶段上任务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阶段,首要的工作是清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群体和制度藩篱等顽瘴痼疾。与这一任务相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是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从“八项规定”、海外猎狐到巡视巡察制度,从反“四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到“三严三实”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常态化,党的建设着力在思想和制度层面扎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笼子,解决精神懈怠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应对执政考验,提升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随

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到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和攻坚期,针对部分领导干部存在的消极不作为现象,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也转向了构建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基层党组织建设制度等的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的轨道上,以制度建设保持全党的战略定力,着力解决消极腐败问题,以更好应对市场经济的考验。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以打造创新驱动战略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后,科学、规范、高效、透明的社会治理和服务能力在经济社会诉求中的呼声愈加凸显,与这一需要相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转向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执政能力,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创新实践成果卓著。从党内规章制度建设看,中共中央在首次开展党内规章清理的同时,已经陆续制定出台超过50部重要的党内纪律规章,由党章统领的党内制度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由重点治标走向了重点治本,管党治党由宽松软走向严实硬,以党的现代化执政能力引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局面正在形成。

2.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主体内容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内容,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相辅相成的综合性、系统性改革实践。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集中体现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引领和统筹“五位一体”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是有主有次、统筹兼顾的制

度创新实践。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也会因时因势而异。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在制度创新上的着力点在于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体系,以及以党的全面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为基础的现代治理体系。围绕这些关键问题,我们党积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要素市场改革和市场机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和民主协商制度建设,这些制度创新统筹协调,形成制度合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框架的建设。同时我们党还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实施了多层次的民生问题治理机制,打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美丽中国建设。这些领域的改革同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一道构成了通向现代化中国图景的制度创新体系。

3.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基石。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内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制定法律,把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并使法律成为全社会的最高权威和行为规范,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内容。

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

重要保障,是出于国家长治久安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曾经快速发展,但又昙花一现,跌落到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各种“陷阱”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治不彰、朝令夕改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不足。中国当前进入改革攻坚、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能否激发市场活力、创新动力,能否打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魔咒、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否完善和全面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

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党在新时代推进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和重要保障,体现在从党的建设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深化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把完善党内规章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提出了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的诸多制度创新举措。中共十九大报告又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提出了新时代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可以说,依法治国的实践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全面实施。

4. 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

科学的制度设计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各项制度和战略举措能否落地生根、贯彻有力,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和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落实的主体首先在于党和政府机构的各级领导干部。因此,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的关键。

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做出部署,强调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8]。

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是简单地精简人员,而是要围绕着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进行重新部署,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对职能相近的党和国家机构统筹设置,实行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优化职能配置,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机构更多自主权,整合基层相关职能和机构,设立综合性机构,提高党和国家机构的效能。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归根结底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39]。只有持续深入地推动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在新时代制度创新在国际领域的必要补充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推动中国外交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从外交理念上看,中国共产党基于“和平和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158]和“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158]这两个基本判断,提出树立和贯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外交意识和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总体外交理念。在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基础上提出了坚持国家核心利益观和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新理念,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真实亲诚的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理念。从外交布局上看,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为区域热点问题、生态治理、贫富差距治理等全球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认同,并通过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深度参与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真正实践了中国共产党在2017年全球政党大会主旨讲话中的承诺,中国共产党要“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作贡献”^[5]11。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是党高屋建瓴、科学谋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布局的顶层设计。在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为出发点,实施有针对性、创新性的改革举措,并将这些举措充实到制度创新的逻辑体系中,推动改革进程不断地向前发展,其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问题导向、精准的务实作风、科学的统筹有序原则,对国家未来的制度创新起到了引路领航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 [2] 张健. 以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为引领[N]. 人民日报,2017-07-23(05).
-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胡锦涛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53.
-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5]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习近平. 敢于担当善谋实干锐意进取 深入扎实推动地方改革工作[EB/OL]. (2017-07-19)[2018-03-2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19/c_1121347268.htm.
- [7] 施芝鸿.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导向[N]. 人民日报,2017-07-12(07).
- [8] 冯勇. 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之维[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15.



引用格式: 聂庆彬. 新时代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路径探析——以阶级分析为视角[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4): 35-42.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4-0035-08

新时代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路径探析

——以阶级分析为视角

The path analysis of the united front to strengthen class found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analysis

聂庆彬

NIE Qingbin

中共河南省委 统战部,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 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 统一战线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法宝。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 我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即经济标准), 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大致可分为资产者、工人和中间阶层。阶级意识的阶级性和层次性为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供了必要性; 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工人或“准工人”大部分在党外, 为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个人经济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内在间距为作为政治联盟的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供了理论可能性。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路径: 一是要加强对资产者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服务引导管理, 依法治理各种削弱党的阶级基础的行为, 依法规范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行为; 二是要维护工人阶级利益, 加强“两新”组织党建,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 提高工人的政治自觉。

关键词:

统一战线;
阶级基础;
新的社会阶层

收稿日期: 2018-0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KS009)

作者简介: 聂庆彬(1982—), 男, 河南省清丰县人,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主任科员,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统一战线理论。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讲话中强调,“我国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定团结的根本力量”^[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条例(试行)》也指出,统一战线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作为特殊的群众工作组织,长期以来,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最大限度地把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紧密团结起来,围绕共同理想目标而奋斗,使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其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法宝地位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认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所有制形式、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相当多的人在党外、体制外,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对象,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利益诉求、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与传统的阶级阶层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同时,工人阶级和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阶层同以往相比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分化。这样以来,有些人在思想上就对这些新社会阶层的特点尤其是其经济属性、政治立场认识不清,以致于在工作上态度不明、举棋不定,进而对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法宝的地位产生质疑。

列宁曾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2]。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3]。当前,学界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时候,主要采取的是阶层分析,即以权力、财富、职业、社会地位、学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因素作为标准划分社会阶层,这种分析框架在理论上更加精细、更加符合科学化特征,在实践上更易把握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更具针对性。但阶层分析也模糊了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不利于把握各群体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阶层分析的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4]。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也指出,以为阶级范畴多少有些过时和多少有些斯大林主义色彩而放弃这一极其丰富和事实上尚未涉及到的分析领域,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大错误^[5]。

鉴于此,本文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新的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以澄清误解,进而探索统一战线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的条件与实现路径。

一、正确把握阶级概念及其划分标准

要正确把握新的社会阶层的阶级属性,首先要正确理解阶级概念。“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明确

* 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之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包含在新的社会阶层中间的。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四条“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中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单列,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股份制公司中的自然人股东等,在统一战线实际工作中,主要指私营企业主中的代表性人物。而将“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统称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考虑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所以本文中用“新的社会阶层”泛指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一切改革开放后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以示区别。

给阶级下过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有一个说明值得我们注意:“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6]¹⁰由此可见,资本家并不是指具体的现实的个人,而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即资本的人格化,资产阶级也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的整体化,而资本的本质也不是物,它代表一种社会关系。因此阶级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即特定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的整体化,是特定生产关系和物质利益的主体与承担者,是在特定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群共同体。^[7]

1919年,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给阶级作了如下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8]G. A. 科恩也指出,划分阶级应根据其成员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实际权利和义务。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只能由他在所有制关系网中所处的客观地位来确定,他的意识、文化和政治不进入他的阶级地位的定义,甚至他的行为也不是定义的必要部分^[9]。由此可见,划分阶级的根本标准是经济标准,即根据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其在生产方式、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作用和分配关系等进行划分。

二、新的社会阶层中不同群体的阶级定位

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描述性而非限定性概

念,其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阶层,而是囊括了社会各阶层和各领域。构成新的社会阶层的不同群体在各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且处在不断形塑和分化的变动过程中。目前,学界对新的社会阶层的认识有共识也有争议。例如,农民工等阶层属于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对于他们的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已基本形成共识。争议较大的主要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私营企业主和某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认识,如关于私营企业主阶层,就有资本家、资产所有者、新资本家等各种说法。有学者认为他们就是资本家,已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有学者认为他们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但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还有学者认为他们以后也不会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则有新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白领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等各种表述,不同的表述其实代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划分依据。对这两个争议较大的阶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和阶级结构框架进行分析,根据不同群体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大致可以把其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资产者

资产者包括私营企业出资人、股份制公司中的自然人股东、盈利性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出资人、新媒体企业出资人等,他们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者,存在对工人的剥削,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用资产者而不用资本家指代他们,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受理论和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往往一谈到资本家就将其同反动、剥削、专政对象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一提阶级就将其与阶级斗争甚至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但阶级斗争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各领域的斗争)联系起来,导致现在大家对资本家、资产阶级等词

汇讳莫如深。其二,当代中国的这个阶层“既不同于欧美各国的现代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旧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本质上具有“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资本家于一身的双重品格”,在实践上既有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积极一面,也有剥削劳动者甚至“有程度不等的违法经营行为”的消极一面。^[10]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并考虑到当代中国资本家相较于传统意义资本家的特殊性,故采用资产者这一说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资产者还是资本家,都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或者说,“资产者/资本家”这个词汇只是标识作为“资产者/资本家”个人的经济属性,而不代表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政治立场,这一点是一定要在理论上加以澄清的。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恩格斯是一个资本家,却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荣毅仁虽是一个大资本家,却被陈毅副总理称为“红色资本家”,并于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其逝世时,中央发布的讣告还称其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2. 工人

工人除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普通务工人员外,还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新媒体企业中的经营管理人员、采编人员和技术人员等,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处于被雇佣地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取报酬、维持生计,受到剥削。由于其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收入丰厚,已然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因此对于他们雇佣工人的阶级属性,很多人存在质疑,甚至其自身也并不认同这个身份。理解他们的工人身份,需要把握以下三点。

首先,工人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对应,其作为现代大工业的

产物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和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相对应,作为没有财产的阶级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无产阶级一般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指出,“我也经常把工人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11]。这主要是与当时工人普遍贫穷的状况有关。但是我们不能把财产作为判定工人阶级的依据,也不能把有没有财产作为划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标准,“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2]。

其次,应正确看待工人收入增加和生活待遇改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6]714}。

最后,脑力劳动仍旧是雇佣劳动。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即直接被资本剥削的和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工人的概念下。”^[13]而且,马克思还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他预言“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

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6]582}。因此,当代工人阶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也包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脑力劳动者。综上所述,上述群体作为雇佣脑力劳动者,应属于工人阶级。

3. 中间阶层

除上述两种类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无法明确划分为资产者和工人阶级的人群,我们用“中间阶层”对其进行标识。当下,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新媒体企业中的很多管理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或者技术入股,同时参与日常的工作;一些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的知识分子也凭借自己掌握的技术知识或资本在外开办企业或在其他企业里入股。对这部分群体不能一概而论,首先要明确普通员工持股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的受剥削地位;对于管理技术人员的管理入股或技术入股则要看他们持有股票的数量,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收入还是股息分红等,进行综合判断。一般来说,低级的管理技术人员比较接近于雇佣工人,高级的管理技术人员更接近于资产者。对于自由职业人员,目前学界的研究还很少*,就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自由职业人员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他们不固定供职于某一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但现实中一些典型的自由职业人员经常处于自雇、他雇、雇他相交织的状况,许多自由职业人员当自身业务有一定发展后,往往会建立工作室或成立小型经济组织,雇几个甚至十几个助手来协助自己开展业务;有的会与业务上下游单位建立比较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有的会采取半受雇半自雇方

式。^[14]尽管他们的收入总体上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在群体内部其实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二八”分化现象比较突出,低收入人群较多。对于这一群体而言,一方面,他们可能代表着雇佣劳动向自由劳动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他们中间的许多收入较低、工作繁重的自由职业者更接近于雇佣工人,而一旦他们与上下游单位建立起比较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便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如果成立工作室或小型经济组织,他们便类似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的个体工商户,当他们雇佣的人数较多时,便成为资产者或准资产者。

三、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必要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阶级意识作为阶级利益、阶级关系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它必然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具有阶级性。同时,阶级意识是有层次性的,它并非突然就能被唤醒并成熟的,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在阶级斗争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的高级阶段是政治意识,即组成政治组织、开展政治斗争、争得政治权利的意识。马克思尤其重视阶级意识的觉醒,他曾用“一袋马铃薯”的比喻和“自为的阶级”来形容只有政治意识觉醒的阶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在当代中国,随着利益的分化,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思想意识相互交锋,同时,各个阶层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程度又不尽相同,这对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提出了挑战。

今日中国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生存压力较大,岗位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其工人阶级意识还相当

* 以“自由职业人员”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篇名搜索,显示结果只有40条。

** 这只代表阶级意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不代表将意识纳入阶级划分标准。就像一个人,其意识有一个逐渐发展成熟的过程,小孩子尽管意识还不成熟,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作为人的存在。

淡薄,尚在形成期(尽管还有许多农民工不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15],但认同感在逐渐增强,甘满堂^[16]认为用工荒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新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有的甚至连朴素的阶级意识都没有,组织性较差,对工会的了解和认可度较低。某一沿海用工大省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农民工中竟有1/2的人没听说过工会,有3/4的人不知道工会是职工群众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对单位成立工会组织只有4%的农民工认为是自己的要求,绝大多数农民工说是上级组织的要求。^[17]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处于快速成长但尚未完全定型期,阶级意识同样尚未形成,其中的工人或准工人阶层尽管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但由于职业收入、教育背景、工作生活环境的差别,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他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多元,主体意识、独立意识更强,而集体意识、纪律意识较差,有些对国情、党情了解不够,有些从业流动性强、收入不稳定,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强烈,容易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

私营企业主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资产者或准资产者,目前“既未形成代表其利益要求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更未自觉地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18],但其自我意识、自我评价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在逐渐增强,试图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权力。例如,一些人通过微博、网络平台发表时事意见吸引数量庞大的粉丝;一些人通过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体制内的政治参与,“一些企业主还拿出大量金钱,成立基金会,招揽人才进行政策研究,使他们原先比较感性和模糊的自我意识,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有些甚至还具备了‘理论形态’”^[19]。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和领域,该群体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已经初现端倪。例如,“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中,56名被

依法确认当选无效的省人大代表有32人是民营企业企业家;“辽宁人大代表贿选案”中通过贿选产生的45名全国人大代表有42人为企业家,且一大半是民营企业企业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行贿受贿案件,而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破坏,是资本对国家权力的争夺。

此外,近年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虽不断巩固,但也出现了一些试图削弱党的阶级基础、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现象。在经济领域,非公有制企业恶意欠薪、随意克扣工人工资、管理严苛至公然违犯《劳动法》及由此诱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还有人大力宣扬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高呼“国退民进”;在政治领域,有人鼓吹西方的民主制度,试图把“颜色革命”引到国内制造街头政治,甚至提出所谓的“零八宪章”;在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泛滥,不断地对我党历史进行抹黑、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有的网络意见人士受国外资本和反华势力的资助,在社会生活领域借对医疗、教育、公安、司法等领域个案的炒作试图刻意把舆论导向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攻击。这些现象都表明,“当今中国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不容漠视或否定”^[20]。这些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各个方面造成动荡,削弱党的阶级基础,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因此,用统一战线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非常必要。

四、统一战线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路径

统一战线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一定社会政治力量的联合”^[21]¹⁰,是政治联盟而非经济联盟,它作为不同社会力量在经济矛盾与政治联合之间的中介和平台,可以通过对包括工人在

内的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进行思想政治引导,不断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宣传等各个方面,囿于文章主题,本文仅从统一战线在团结引导资产者和工人两个方面作一粗浅探讨。

1. 加强对资产者的服务引导管理

其一,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资产者队伍。非公有制经济是当前中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应坚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积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统战部、工商联应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及时了解、反映民营企业的利益诉求,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帮助企业排忧解难,扩大生产。此外,应积极促进中介组织、社会组织、新媒体企业的发展。

其二,依法治理资产者各种削弱党的阶级基础的行为。对于前述资产者削弱党的阶级基础的各种行为,统一战线应坚持“既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前提下,按照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同这些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其三,规范资产者和准资产者的政治行为。对党外人士进行政治安排时,“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的,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22]。应坚持标准、严格程序、认真考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资产者的政治安排工作,把控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所占比例;加强政治引导和纪律约束,引导他们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积极引导资产者中的

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在确定党员发展对象时,应注意全面考察他们的社会关系、个人历史、思想品德、政治觉悟、入党动机等各方面情况,特别是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表现,坚决防止并抵制各种政治投机行为。

2. 维护工人阶级利益,提升工人政治自觉

其一,始终牢记我们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发挥统一战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社会功能,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应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积极承担服务管理员工的社会责任,发挥工商联协调劳动关系的作用,参与调节劳动纠纷。应推动非公有制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推动职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引导和教育职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其二,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下文简称“两新”)党建工作,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正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增强基层党组织对工人群众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

其三,加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灌输。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尽管可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深入自发产生,但“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代表着工人阶级先进性的高级阶级意识即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23]。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大多数是雇佣脑力劳动工人,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是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21][218]},统一战线对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教育引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共产党员标识的只是政治身份,一个人,不论什么出身,只要具有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21世纪初,关于“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大争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将阶级属性同政治属性混为一谈或直接联系,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存在障碍。

导本身就是加强工人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内容。作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理论化、体系化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思想、理论总结,其内涵丰富,涵盖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各个方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这样的先进理论不仅不可能从群众实践中自发地产生出来,而且对于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工人阶级来说,不经过长时间的系统学习也不可能在头脑中确立起来。因此,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加强对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工人、准工人在内的工人阶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引导广大工人认清自己的光荣使命,增强其政治自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4-29(02).
- [2] 列宁. 列宁选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6.
- [3] 王伟光. 开创当代马克思主义新境界[N]. 光明日报,2016-06-08(13).
- [4] 列宁. 列宁选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
- [5] 俞可平. 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9.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
- [7] 聂庆彬. 纯粹经济范畴内的“阶级”界定——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的考察[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7.
- [8] 列宁. 列宁选集:第4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 [9] 科恩 G A. 卡尔.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段忠桥,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92.
- [10] 陈志尚. 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几点认识[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40.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80.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4.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0-101.
- [14] 徐军. 当代中国自由职业人员的特征界定及实践应用[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3):21.
- [15] 冯仕政.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3):128.
- [16] 甘满堂. “工荒”:高离职率与无声的抗争——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阶级意识的考察[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62.
- [17] 张友谊. 对增强农民工工人阶级意识的一点思考[J]. 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学报,2008(4):38.
- [18] 徐家庆,周向军. 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过渡性”体征[J]. 学术界,2013(12):150.
- [19] 王浩斌. 社会转型期的阶层流动与阶级意识问题[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6.
- [20] 本刊记者. 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问题——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书林[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0):18.
- [21]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中国统一战线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2]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1-07-02(03).
- [23] 列宁. 列宁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7-364.



引用格式:许艳林. 新时代背景下提高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路径探讨[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4): 43-48.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4-0043-06

新时代背景下提高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 路径探讨

Discussion on the wa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arty branch construc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许艳林

XU Yanlin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基层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党的战斗力的基础,是直接对党员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基层组织。目前基层党支部建设中存在的党员入党后的继续教育与管理松懈,党的组织生活不严肃、不规范,党员激励与评价机制乏力,党务干部的工作缺乏活力与创新,以及党支部工作考核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削弱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提高基层党支部素质,改变基层党支部面貌,可以通过加强实效性建设予以改进和解决。提高基层党支部建设实效性的基本路径有三条:一是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通过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优化组织模式,常态化驱动党支部实效性建设;二是通过精准选配带头人,坚持集体领导,强化党员教育管理,长效化推进党支部实效性建设;三是通过建立健全效能评估体系,严格量化考核,制度化规范党支部实效性建设。

关键词:
新时代;
基层党支部;
实效性建设

收稿日期: 2018-05-24

作者简介:许艳林(1965—),女,河南省信阳市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党总支书记,高级政工师,主要研究方向:党建工作。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而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1]。然而,目前基层党支部建设中在教育、管理与评价等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具体包括:党员入党后的继续教育与管理有所松懈;党的组织生活不严肃、不规范,党员激励与评价机制乏力;党务干部的工作缺乏活力与创新;党支部工作考核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层党支部的作用变得愈加重要,它不仅担负着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的职责,而且担负着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的职责^[2]。因此,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必须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着力于提高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实效性。鉴于此,本文拟从组织模式、队伍建设和效能评估三个方面对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作一探讨,以期提升基层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贡献应有之力。

一、优化组织模式,常态化驱动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

常态化驱动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建设学习型党支部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指各级党组织须组织党员不断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科技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3]。建设学习型党支部,应将中央要求、岗位职责与个人需求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学习态度上应更加注重增强自觉性,在学习内容上应更加注重实际需求,在学习形式上应更加注重丰富多样,在学风建设上应更加注重

学以致用,在学习管理上应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建设学习型党支部,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基础工程,应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学习抓在日常、严在经常,以经常性教育促进党员优良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其日常行为带动其日常教育。学习不仅要有形式,更要有实际内容,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结合,将形式作为“骨架”,把内容当作“血肉”,才能收到实际效果。建立学习型党组织是一项系统工程、创新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使之持久,并不断取得良好效果,必须创新学习方法^[4]。应坚持运用“三会一课”制度、形势政策教育、主题联学、辅导报告、学者荐书、领导寄语等有效方法和手段,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扩大学习型党支部建设的覆盖面和参与度,着力营造重视学习、崇尚学习、坚持学习的浓厚氛围,在党支部内牢固确立全员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强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建设服务型党支部

2014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指出,“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础工程,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5]。因此,基层党支部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服务理念贯穿于工作始终、体现在支部党建工作的各个环节。建设服务型党支部,应围绕服务中心、建设队伍这一核心任务,把支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事业发展作为服务的主要内容,把本职工作作为服务的主要阵地,把工作对象和身边党员群众作为服务的主要对象,把履职尽责作为服务的主要方式,把支部党务工作置于事业发展中心工作的总体布局中来考虑,寻找党政合作的新方式、新途径,做到党政

思路同心、目标同向、工作同步、有机结合、团结协作、相互促进。

基层党支部的工作计划应结合中心工作统筹安排,活动方式应依据中心工作尽量灵活多样。应通过重点项目攻关,以党小组、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服务热线等为载体,围绕本单位职能抓大事、围绕业务发展抓难事,充分发挥党建优势、破解发展难题。应积极改进工作作风,完善便民服务工作机制,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体现在政策制定和工作开展全过程。应着力强化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建立健全关怀帮扶机制,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作用,积极开展结对帮扶、志愿服务、基层体验等活动,切实帮助生活困难的人民群众和党员职工解决实际问题。应注重总结经验,树立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先进典型,运用多种载体进行宣传推广,用基层经验和典型引领带动服务型党支部建设。

3. 建设创新型党支部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活力源泉。创新型党支部建设,是指把创新理论应用于支部党建工作,使广大党员在党组织的引导下,主动提升学习能力,积极投入到工作创新、管理创新等活动中来,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切实为群众服务,永葆党的先进性。创新型党支部建设作为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载体,应注重深化和推进理念创新、载体创新、机制创新,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党支部建设过程始终,既要充分发挥支部对群众实践的引领、规划、指导作用,又要鼓励群众探索、聚焦具体问题,把握好政策界限、范围、尺度、节奏;既要吃透基层一线情况,让各层面创新精准有效,又要及时将实践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形成理性认识,升华为制度创新,推动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创新型党支部建设应突出重点任务,紧密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和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着手,以党建工作项目化管理推动思想到位、行动到位、落实到位,避免“两张皮”。应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梳理制约和阻碍事业发展的“瓶颈”,认真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措施,选好抓手和突破口。应注重考评推广,把创新型党支部的创建工作作为党建工作考核、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党组织创先争优的重要内容,推动创新型党支部建设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二、加强队伍建设,长效化提升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

长效化提升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充分发挥支部书记的作用

党支部书记是基层党支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对支部的全面工作负主要责任。党支部书记既是贯彻落实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的执行人,也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更是抓好党支部自身建设的当家人。其个人政治觉悟、组织观念、工作能力、党性修养等综合能力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基层组织建设的效能和党的群众基础。一名合格的党支部书记,应具有优秀的政治素质、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良好的品德素质和较强的能力素质;同时还应具备良好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创造能力和协作能力。加强对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培养和管理,是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必然要求。

充分发挥支部书记的作用,应加强对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培养选拔、教育培训、管理监督和激励保障,切实把政治强、懂业务、作风好、肯奉献的优秀党员选拔到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岗位上;同时,应持续加强集中培训和日常帮带,不

断提高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政治觉悟和履职能力。充分发挥支部书记的作用,应围绕中心工作落实党建任务,统筹党支部建设与单位发展,结合单位部门发展规划制定支部中长期发展目标并分解确定年度发展计划和实施方案,配合单位重点工作,确保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实效性。充分发挥支部书记的作用,应通过提升自身素质带动基层党务干部和党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另外,支部书记还应追求自我革新,通过定期集中培训和坚持自学,提高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理论水平,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思维体系,更好履行工作职责。同时,还应强化责任意识,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意识,切实担当起履职尽责、一岗双责的重任。

2. 不断加强支委会建设

搞好基层党支部建设,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支委会作为支撑。应加强支部班子建设,严格按照党章和《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按时换届选举,及时增选补选支部委员,把组织放心、素质过硬、作风优良、勤于思考、善于管理的同志选配到支委会中,增强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6]。应狠抓政治业务学习,努力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掌握支委会工作所需要的业务知识,使各委员都成为学习践行党的理论的先行者,成为党建工作的行家里手。应主动适应党建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党支部工作的模式、内容、方法,形成既严肃活泼又生动有效、党员积极踊跃参与的良好局面,真正把党支部的活力激发出来。应落实好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遵循党章党规,从“三会一课”严起、从按时按标准缴纳党费严起,切实解决个别党员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个别党支部软弱涣散等问题。应加强作风建设,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带头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3. 始终注重党员能力素质培养

党员的能力素质是支部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源泉,党员能力素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问题。应注重吸收专业技术人员和较高层次管理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一线党员的占比,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增强党组织活力,扩大党组织的群众基础。应以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完善学习培训制度,围绕中心工作需要开展岗位培训,提升党员整体素质,帮助更多党员成长为行业专家和岗位能手;应充分挖掘和发挥支部成员优势,结合单位发展目标,制定适合个人的发展规划,提升达成目标的技能,并为党员畅通职业渠道,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不断增强党员的成就感与归属感。

应强化党员的规矩意识和纪律意识,以党的规矩和纪律规范党员言行,不断增强其敬畏意识,杜绝“侥幸”“打擦边球”等不良心理;应强化党员组织观念,使每名党员都牢记自己是党组织的一分子,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其接受组织监督、严守纪律的自觉性;应引导党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党的规矩纪律办事,使党员认识到“当官不能妄为,用权不能任性”;应强化党员清正廉洁意识,使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能坚守党的纪律,见微知著、防微杜渐,从点滴之处筑牢清廉防线。

三、深化效能评估,制度化规范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

制度化规范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坚持效能评估原则

党支部工作效能评估体系,可以客观评价

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充分调动基层党支部工作积极性;同时可以及时发现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以便改进和促进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建立党支部工作效能评估体系,应把握好以下三个原则。

(1)动态性原则。动态性原则体现在评估内容、评估指标和评估方式三个方面。评估内容的动态性是指应及时把上级党组织的新精神新要求融入考核内容中;评估指标的动态性是指应适时增减相关评估指标,使指标体系能充分反映党建工作的时代要求;评估方式的动态性是指应及时改变不符合党支部工作实际和党员愿望的考核方法。

(2)开放性原则。评估体系应根据基层党组织自身的工作任务和改革发展的实际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不断总结经验,客观地反映各支部工作的特点与个性,增强支部考评的针对性。评估主体虽是上级党组织,但可邀请党员群众全过程参与、监督评估工作,并建立透明的评估结果公布机制,使党支部的工作既对上级党组织负责也对党员群众负责;应将党支部季度和年终考核结果以内网、公告栏等方式予以公布,接受党内的监督。对党支部的评估既可采用闭环模式,即在党支部内部进行,也可邀请其他党支部参与,以增强外部推动力。党支部评估结果的运用,既应立足于本支部的整改提升,也应形成支部之间“比、学、赶、帮、超”的工作格局,以放大评估效应。

(3)融合性原则。应注重评估机制与业务工作绩效管理相融合,既注重考核基层党建重点工作和日常业务,又突出考核基层党建工作促进经营发展的情况^[7],强化对党支部“保障中心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估。党支部的评估还应与基层党组织的目标任务作用要素相融合,把“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

等化为评估指标,并纳入绩效目标。同时,党支部的评估还应注重与其他专项党建工作评估相融合,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党内教育活动相融合,避免出现“专项单干”的分散化考核现象,把践行群众路线、整肃“四风”、改进作风等要求纳入评估指标体系,提升考核效能,增强评估的时代性。

2. 健全效能评估体系

一要明确评估目的。评估目的在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促进工作有效开展,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于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制定措施、纠正错误,促进党支部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

二要完善评估内容。评估内容要充分体现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的要求,将健全工作制度、加强教育管理、服务群众情况等纳入考核体系,推进党建工作规范化,着力突出与单位中心工作的有效结合。应将支部评估考核作为党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的有效抓手,坚持分类指导原则,按照支部工作重点的不同合理设计考核内容,使评估体系能多样化地反映支部工作成效,坚持效率优先,将支部评估与创先争优、党务公开等专项党建工作对接,优化各类党建工作要素。应推动评估由以定性为主向以定量为主转变,由年终一次性向日常过程性转变,评估的重点应包含组织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工作、人才工作、廉政建设等。

三要灵活运用评估手段。应将动态评估与定期考核相结合,既通过加强过程控制对党建阶段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又定期开展综合考核进行党建工作年度综合评价,同时应建立健全干部群众参与机制,通过民主测评、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提高考核结果的客观真实性。

3. 严格效能评估实施

严格效能评估实施应坚持实事求是、客观

公正的原则,不断改进党支部工作方式,提高党建工作创造性,促进业务工作顺利进行。一是应明确考核组织领导。应在党委领导下,由党委职能部门和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组成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考核工作的协调与落实。二是应坚持“三评一用”,科学规划考核。“自评”即根据基层党组织效能评估体系,党支部认真梳理归纳年度工作基本情况与主要成绩,明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测评”即根据工作职能,结合党员民主测评,对党支部工作进行量化考核;“互评”即单位职能部门评价与党支部工作互评,形成党支部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意见;“一用”即将考核结果作为评选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重要依据,不断推动党支部建设的实效性。

四、结语

基层党支部建设是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自身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应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一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通过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支部,优化组织模式,常态化驱动党支部实效性建设;二要通过精准选配带头人,坚持集体领导,强化党员教育管理,长效化推进党支部实效性建设;三要通过建立健全效能评估体系,严格量化考核,制度化规范党支部实效性建设。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和党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求我们不断优化和调整基层党支部建设方式方法,创新工作模式与手段,充实和丰富基层党支部工作内容,务实推进基层党支部实效性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为基层单位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01).
- [2] 王强庆, 马红翠, 张成虎, 等. 新时代对高校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实践思考[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53.
- [3] 中办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EB/OL]. (2010-02-08) [2018-04-12]. http://www.gov.cn/jrzq/2010-02/08/content_1531011.htm.
- [4] 沈涛, 范德龙. 学习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探索[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2(6): 92.
-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EB/OL]. (2014-05-08) [2018-04-12]. dangjias.people.com.cn/n/2014/0528/c117092-25077701.html.
- [6] 周雷雷.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下机关党支部工作问题研究[J]. 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 2016(4): 103.
- [7] 张海云, 贺颖. 关于企业基层党建工作量化考核的探索[J]. 石油人力资源, 2017(12): 82.



引用格式:彭小伟. 论康德的先验时空观及其历史地位[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4): 49-56.

中图分类号: A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4-0049-08

论康德的先验时空观及其历史地位

On Kant's transcendental space-time view and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彭小伟

PENG Xiaowei

嘉应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与传统自然哲学意义上的时空观不同,康德的先验时空观第一次将时间和空间范畴引入了认识论,认为时间和空间并非自在之物的属性,而是先天的感性形式(纯直观形式),是主体的一种感受能力,属于意识的主观结构。时间属于内感官的直观形式,而空间则是外感官的直观形式;空间是一切外直观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而时间则是一切直观(包括外直观和内直观)得以可能的必然前提。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既是对传统时空观的汇总,也是对近代时空理论的进一步阐发,无论是海德格尔的时空观还是德勒兹的时空观,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或从时间性的维度阐发存在,或从先验的向度充实意识。在此意义上,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牛顿和莱布尼兹的时空观,下启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的时空观,因而在西方时空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康德哲学;
时空观;
直观形式;
形而上学阐明;
先验阐明

收稿日期: 2018-06-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5MZD016)

作者简介: 彭小伟(1981—),男,广东省茂名市人,嘉应学院讲师,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

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论题,时空观是哲学家们无法回避的哲学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有什么样的时空观就会有怎样的认识论。因此,时空观是哲学大厦的基石,也是探究哲学问题的窗口。对此,康德哲学就是典型的例子。康德在构建其先验哲学体系时,就是以时空观作为切入点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开篇就首先对时间和空间作了详细的考察。时空观由此构成了康德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深入其哲学体系的理论质点。

然而,这一点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人们要么将时空融入直观之中作对比考量(直观的质料与直观的形式等)以厘清直观与想象力之关联,要么将时空放在先验感性论的框架之中论证“数学何以可能”。这样既容易忽略康德先验时空观的独特价值,又容易掩盖其在西方哲学追问时空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对此,我们认为,与物理学的科学的分析方式不同,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时间与空间是不可分离的,对时空的追问应该诉诸时空观念的追问。鉴于此,我们拟尝试从时空观念史的视角重新审视康德的时空观,旨在凸显时空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向度,并由此揭示康德先验时空观在哲学中的历史地位。

一、作为直观形式的时空

众所周知,牛顿的时空观和莱布尼兹的时空观均对康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前者属于机械的绝对时空观,即把空间看作万物存在的形式、把时间看作无源无尽的河流;后者属于观念的关系时空观,即把时空当作单子的表象,其实质是万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此,康德曾说:“空间和时间是什么呢?它们是实在的东西吗?还是它们只是事物的一些规定或关系,当事物没有被直观时它们却仍然属于事物呢?还

是空间和时间仅只属于直观的形式,因之也就是仅属于我们意识的主观结构,离开意识就根本不能把它们归之于任何东西呢?”^{[1]46}“实在的东西”即牛顿意义上的时空,“事物的规定或关系”则是莱布尼兹意义上的时空,而“直观的形式”则是康德所主张的时空。

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并非自在之物的属性,而是先天的感性形式(直观形式),是主体的一种感受能力。其中,时间属于内感官的直观形式,而空间则是外感官的直观形式。空间是一切外直观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时间则是一切直观(包括外直观和内直观)得以实现的必然前提,因此,时间比空间更加根本、更加隐蔽。“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形式条件。空间是一切外部直观的纯形式,它作为先天条件只是限制外部现象。相反,一切表象,不管它们是否有外物作为对象,毕竟本身是内心的规定,属于内部状态,而这个内部状态却隶属在内直观的形式条件之下,因而隶属在时间之下,因此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先天条件,也就是说,是内部现象(我们的灵魂)的直接条件,正因此也间接地是外部现象的条件。如果我能够先天地说:一切外部现象都在空间中并依空间的关系而先天地被规定,那么我也能出于内感官的原则而完全普遍地说:所有一般现象、亦即一切感官对象都在时间中,并必然地处于时间的关系之中。”^{[2]29-30}由此可见,在康德看来,外部现象在时间的间接条件下凭借空间关系而被先天地规定,而内部现象(包括先验幻象)在时间的直接条件下凭借时间关系而被必然地确定。因此,康德总结说:“一切事物,作为外部现象,都相互并存于空间里。”^{[2]26}相应地,“一切事物作为现象(感性直观对象)都在时间中”^{[2]30}。据此,不难发现,在康德看来,作为直观的形式,时间比空间更加根本和更加重要。

时间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担负着更为特殊的角色,即充当与知性中的想象力相连接的中介。

康德时空观的一大创举是第一次将时空引入认识论。“从前的哲学家,都视时间空间问题为自然哲学(19世纪之前学术界对自然科学的称谓)问题,没有一个意识到它们是知识论问题的基础。康德创造性地将数学作为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与时间空间问题相联系。”^{[3]166}康德既把时空区分开来,作细化的考察,又将空间统摄于时间之中,凸显了作为整体时空的时间性。而且,康德通过时空将经验对象与人类的知识概念有效地统一了起来,证明了时空不再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的主观条件。他说:“时间只是我们(人类的)直观的一个主观条件(这直观永远是感性的,即限于我们为对象所刺激的范围),它超出主观就其自在来说则什么也不是。”^{[2]30}那么,作为直观形式的时空是如何与经验对象产生关联的呢?首先,康德将感性和知性连接起来,使得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对经验对象具有客观效力,认为必须在感性和知性之间寻求一个具有同质性的中介,此中介即图型既具有感性特质、符合经验原则,又具有理性特质、遵循知性原则。其次,康德认为,范畴是图型化的概念,而图型是有规则的时间。“图型无非是按照规则的先天时间规定而已,这些规则是按照范畴的秩序而与一切可能对象上的时间序列、时间内容、时间秩序和时间总和发生关系的。”^{[2]110}最后,康德认为,图型据以成为图型的规则源于想象力,“图型就其本身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是想象力的产物”^{[2]107}。要言之,使时间适用于知性范畴的规则(图型)是由想象力产生的,而想象力则是根据知性原则对时间进行规定的。由此,康德得出结论:时间就是既符合感性原则又遵循知性原则的同质性中介。他

说:“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先天规则之上而言,是与范畴(它构成了这个先验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但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包含有时间而言,先验时间规定又是与现象同质的。因此,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2]106-107}康德由此基于认识论维度给予时间和空间以先验的形式规定,凸显了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重构作用。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意义重大,海德格尔称康德为哲学史上的思想家中探索时间性的第一人。

时间和空间何以具有直观对象的效用?为此,康德明确地把时间(内感官的直观形式)和空间(外感官的直观形式)区分开来,并极力阐明时空之经验的实在性和先验的观念性。前者是指基于时空所形成的关于现象的知识,只要其应用于经验材料之上则其就具有普遍必然性亦即实在性;而时空的这种经验的实在性则源于其先验的观念性,即时空是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而非事物本身的属性。时空之经验的实在性和先验的观念性的根据又是什么?康德于是分别对时空作了形而上学阐明和先验阐明。

二、康德对时空的形而上学阐明

所谓形而上学阐明,就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概念本身所固有的意义阐发出来,使之明晰化。康德说:“所谓阐明,我理解为将一个概念里所属的东西作出清晰的(哪怕并不是详尽的)介绍;而当这种阐明包含那把概念作为先天给予的来描述的东西时,它就是形而上学的。”^{[2]23}这样,康德就以“剥洋葱”的方式阐明了时空的本体论向度。他认为,如果将物体的一切经验性的东西去掉,剥掉其感性的外衣,剩下的就只有时间和空间。所以,时空属于感官

的先天的直观形式。与经验的直观不同,时空属于纯直观,它是经验对象有可能得以实现的主观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根据经验对象在时空中所显示的那样来认识物自体,而不能按照物自体本身(如其所是)那样来认识物自体。在康德看来,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只有当其进入时空之域,我们关于它的意识才可能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康德无疑赋予了时空以本体论的意义。

康德关于时空的形而上学阐明可以归结为四点:其一,时间和空间不是经验性的概念。因为我们无法设想一个物体不在时间之流或不占任何空间,离开时空,我们不能设想任何东西。相反,我们却可以设想没有物体的空间和时间,即使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此,相对于作为其内容的经验性的东西,时间和空间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其二,时间和空间是一切现象的必然基础。时空是直观的先天形式,其中,空间属于外感官的先天形式,是外部对象的必然基础;时间属于内感官的先天形式,是一切对象(包括内部对象和外部对象)的必然基础。空间仅仅是外部对象被直观的可能性条件,其只有被纳入到时间中来才能被心灵所把握。因此,时间比空间更加基础。其三,时间和空间不是普遍性的概念,而是感性直观的纯形式。任何一个表象的空间都是同时并存的唯一,正如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前后相继的唯一一样。一切有关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是以一个先天直观(而不是经验性的直观)为基础的。其四,时间和空间都被表象为无限给予的数量。这意味着其大小的确定性只能通过限制才能被确定地加以表象。因此,时空的原始表象都必定不是由概念给予的,而只能由纯粹的直观为其奠基,因为每一个概念都只能包含作为部分的表象,任何概念本身都不可能将无限数量的表象都包含

于其中。^{[2]23-24,27-28}需要说明的是,康德对时空的形而上学阐明实际上有五条,但其中的第三条属于先验阐明,我们之所以将康德关于时空的形而上学阐明归结为四条,是为了使论证更加简洁。他说:“为此,我可以援引上面第3条,在那里我为了简短而把本来是先验阐明的事置于形而上学的阐明这个标题下了。”^{[2]28-29}康德关于时空的四条形而上学阐明主要阐明了时空不是经验的而是先天的,是经验的必然性基础;不是普遍性的概念而是直观的形式,是先天直观所表象的无限给予的数量。

不难发现,在康德看来,空间表象是几何学的基础,而时间表象则是算术的基础。但是,康德为何以几何学对空间概念作先验阐明,却不以算术对时间概念作先验阐明,反而以物理学中的变化来代替算术呢?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康德的时间观在形式框架的理解与作为能力的理解之间的冲突,即撇开“数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直接跳到“力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传统的空间化的时间向力学化、能动化的时间的一个过渡。^[4]由此就关涉到了康德时空观的第二重论域,即对时空的先验阐明。

三、康德对时空的先验阐明

与时空的形而上学阐明不同,时空的先验阐明并非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考察时间和空间,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由时空所形成的知识何以具有普遍必然性,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空间概念的先验阐明主要是从几何学的角度进行的,而时间概念的先验阐明则是以算术为视角。在康德看来,所谓先验阐明,“就是将一个概念解释为一条原则,从这条原则能够看出其他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2]24}。质言之,就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时空概念在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承担的功能,其目

的是要说明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因此,康德首先对经验判断和先天判断进行了划分。他认为,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是先天判断的可靠标志,“如果有一个命题与它的必然性一起同时被想到,那么它就是一个先天判断;如果它此外不再由任何别的命题引出,除非这命题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必然命题而有效的,它就是一个完全先天的命题”^{[2]2}。与先天判断不同,经验判断永远不可能具有严格的普遍性,“而只是(通过归纳)给它们以假定的、相比较的普遍性,以至于实际上我们只能说:就我们迄今所觉察到的而言,还没有发现这个或那个规则有什么例外”^{[2]2}。据此,康德得出结论:“如果在严格的普遍性上亦即不能容许有任何例外地来设想一个判断,那么它就不是由经验中引出来的,而是完全先天有效的。”^{[2]2}质言之,只有先天判断才具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

其次,康德区分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他认为,在一切判断中,从其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看,只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要么是谓词 B 属于主词 A,是(隐蔽地)包含在 A 这个概念中的东西;要么是 B 完全外在于概念 A,虽然它与概念 A 有连结。在前一种情况下我把这判断叫作分析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则称为综合的。因而分析的(肯定的)判断是这样的判断,在其中谓词和主词的连结是通过同一性来思考的,而在其中这一连结不借同一性而被思考的那些判断,则应叫作综合的判断。”^{[2]6}换言之,分析判断是在同一性的连结下谓词被包含于主词中的说明性判断,如“一切物体都有广延”;而综合判断则是在非同一性之下谓词独立于主词之外的扩展性判断,如“一切物体都是有重量的”。因此,只有综合判断才能扩展知识,而如果要确保其所扩展的知识具有严格的普遍性,那么这种判断就必须是先天的,此即先天综合判断。

再次,康德以数学和物理学为例,阐明了基于理性的一切理论科学都是以先天综合判断为原则。他认为,真正的数学命题都是先天综合命题。例如,算术题“ $7 + 5 = 12$ ”,就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命题(即先天命题),因为“它不包含经验性的知识,而只包含纯粹的先天知识”^{[3]9}。同时,无论我们如何思考,都无法在同一性中将 12 必然地与“ $7 + 5$ ”连结在一起(因为“ $6 + 6$ ”“ $9 + 3$ ”等均在这种可能性之列),尽管我们可以在“ $7 + 5$ 的和”的概念中想到 12。同样,几何学命题也是如此。例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其不可能在分析“直线的概念”中引出“最短”,因为这一命题必须借助于“直观”这一综合才得以可能。物理学的原理也是先天综合命题。例如,质量守恒定律所揭示的“在物质世界的一切变化中,物质的量保持不变”,其起源是先天的,而且有着必然性,“因为在物质概念中我并没有想到持久不变,而只想到物质通过对空间的充满而在空间中在场。所以为了先天地对物质概念再想出某种我在它里面不曾想到的东西,我实际上超出了物质概念”^{[2]11}。于是,康德进一步推论说,作为植根于人类理性的本性之不可缺少的科学,形而上学也应该包含先天综合知识,至少就其目的而言是由先天综合命题构成的。因为形而上学所关心的并非概念的分析说明,而是要扩展我们的先天知识,“在被给出的概念上增加了其中不曾包含的某种东西,并通过先天综合判断完全远远地超出了该概念,以至于我们的经验本身也不能追随这么远,例如在‘世界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开端’等命题中那样,所以形而上学至少就其目的而言是由纯粹先天综合命题所构成的”^{[2]11}。

最后,康德通过几何学和物理学分别对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作了先验阐明。他认为,空间的表象必须从本源上就是直观,“因为从一

个单纯的概念中引不出任何超出概念之外的命题”^{[2]25},而且这种直观必须是先天的、纯粹的,而非经验性的,“因为几何学的定理全都是无可置疑的,亦即与对它们的必然性的意识结合在一起”^{[2]11}。那么,作为空间表象的外部直观如何能够寓于主体之中呢?康德的回答是:“只有当这表象(空间表象)仅仅作为主体受客体刺激并由此获得对客体的直接表象即直观的形式性状,因而仅仅作为外感官的一般形式而在主体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时,才得以可能。”^{[2]11}也就是说,只有将空间表象作为主体受客体刺激所获得的直观的形式性状作为空间的一般形式,其才能寓于主体内心之中。如此,作为一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几何学才得以可能。如前所述,为了简便起见,康德将时间概念的先验阐明置于形而上学的阐明标题之下。他认为,因为时间只有一维,不同的时间不能同时并存而只能前后相继(正如不同的空间不能前后相继而只能同时并存一样),所以,时间关系的原理(如因果关系)是“作为使经验根本上成为可能的诸规则而起作用,并在经验之前教导我们,而不是通过经验教导我们”^{[2]28}。此外,康德还补充说:“变化的概念以及和它一起的运动(作为位置的变化)的概念只有通过时间表象并在时间表象之中才是可能的。”^{[2]29}因此,在时间的表象中,两个对立的规定在同一个事物中可以被前后相继地发现。如果说,空间是“一种不变的形式,因而它是对象被直观的一切关系的必然条件”^[7],那么,时间则是一种变化的形式,是所有直观形式的先验条件。虽然不能无条件地说万物必在时间之中,但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所知之物无不在时间之中。

因此,在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上,康德既继承了时间空间化的传统,又开创了空间时间化的先河。在认识的起源或发生学意义上,时

间先于空间,内感官形式包容了外感官形式(或内直观形式包容了外直观形式),时间更为根本;在认识的显现方面(或认识的客观性把握方面),空间表象是时间表象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外部直观,内部直观仅仅是一种潜在的能力,根本无法表象出来。^[6]可以说,经验的实在性和先验的观念性是康德时空观的两个基本原则。前者秉承了时间空间化的传统,后者则是空间时间化的创新。这是自赫拉克利特以来西方时空理论的重大转折,既是对传统时空观的继承,也是对近代时空理论的阐发。对此,海德格尔评价说:“在西方哲学史中有三种关于时间本质的沉思是里程碑式的: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是奥古斯丁的;第三种来自康德。”^[7]由此可见,康德的先验时空观在哲学史乃至人类认识史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四、关于康德先验时空观历史地位的评价

从时空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康德的时空观无疑深受牛顿时空观和莱布尼兹时空观的影响。康德批判地吸收了这两种时空观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康德接受了牛顿的时空观,承认了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认为我们虽能清除思维中的一切经验的东西,但不能除去时间和空间。他说:“如果从物体的经验的直观和物体的变化(运动)中去掉一切经验的东西,即去掉属于感觉的东西,剩下来的还有空间和时间,因此空间和时间是纯直观,它们是先天地给经验的东西做基础的,所以它们永远是去不掉的。”^[8]在这里,作为纯直观的时间和空间就是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另一方面,康德吸收了莱布尼兹的观念关系时空观,认为时空并非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而是主体的一种感受能力,属于意识的主观结构,离开意识就根本

不能把时空归之于任何东西。经验对象正是在意识的这种主观结构中,与主体发生关系,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是对牛顿时空观和莱布尼兹时空观的综合。但是,这种综合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批判地继承。在康德看来,时空既非牛顿所说的后天形式(而是固有的先天接受能力),亦非莱布尼兹所谓的主观逻辑关系(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先天直观形式)。康德的先验时空观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的时空观,还第一次将时间和空间引入知识论领域,赋予了时空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向度,为现代时空观——相对论时空观和量子论时空观——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奠基。

如果说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是在分别批判地继承牛顿时空观和莱布尼兹时空观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等人的时空观则是在批判地继承康德时空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先验时空观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时空观是继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之后形成的第三座历史丰碑,尤其是康德将空间纳入时间之中的时间性考察,海德格尔更是推崇备至。但是,海德格尔拒绝了康德的时间概念,认为这种通过时间的综合形成的关于经验对象的知识,仍然停留于传统的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层面,即探讨存在在意识中显现为何物。与康德不同的是,海德格尔要做的是发现存在的方式,即追问意识是如何遭遇存在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时间并非意识内部的“空穴来风”,“时间就是那使得‘在一已经一寓于某物一存在一之际一先行于一自身一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也就是使牵挂之存在成为可能的东西”^[9]。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对他来说,存在是首位的,而作为何种

存在者则是第二位的”^{[3]245}。时间是此在的“操心状态”,是此在的时间性存在。“此在就是时间,时间是时间性的。”^[10]此在正是在时间性中以各种情态展开自身。海德格尔将时间与时间性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在空间中被度量的机械的(物理性)概念,而后者则是自身在自我规定中的展开情态(时态)。对此,海德格尔用领会、现身与沉沦来描述了与之对应的三种时态,即将来、过去和当前。“领会首要地奠基于将来(先行与期备)。现身情态首要地在曾在状态(重演与遗忘)中到时。沉沦在时间性上首要地植根于当前(当下化与当下即是)。”^{[11]398}因此,如果说,时间在康德那里是牛顿的时空观的一种形而上学辩护,那么,时间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成为了康德时空观的一种存在论阐释。进一步地,如果说康德的时空观错过了存在,那么这一错失的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则获得了很好的补充。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德勒兹一方面吸收了柏格森的绵延理论,另一方面坚持了康德的先验经验论立场,认为时间就是意识的绵延,而意识既包括理性的反思,又包括非理性的经验。在他看来,习惯、记忆和期待是时间的三种综合方式,“展现了在经验之内意识所发生的重叠、积累和隐匿,以及在这些翻滚的意识中所蕴藏的力量”。可以看出,德勒兹对海德格尔的超越形而上学并不感兴趣,而是坚持了纯粹形而上学立场,走的是新康德主义的路线。

对于康德的时空观,海德格尔曾这样评价:“曾经向时间性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一个人与唯一的人,或者说,曾经让自己被现象本身所迫而走到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个人与唯一的人,是康德。”^{[11]27}海德格尔在此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康德的时空观是在思索现象与物自体之关联时提出来的;二是在追问时空的发展历程中,康德开创了时空理论的先河,提出了与传统的

时空观截然不同的时空理论。在康德看来,时空是纯粹的先天直观形式,是主体的一种感受能力,属于意识的主观结构。空间是一切外直观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而时间则是一切直观(包括外直观和内直观)得以可能的必然前提。康德的时空观因此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康德的时空观第一次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视角来考察时间和空间,是对传统时空观仅仅停留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层面的一种超载;另一方面,康德第一次提出了先验时空观,认为时空并非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的主观条件,是一种先天的直观形式,具有先验(不依赖于感性经验而存在)的特性。

无论是海德格尔的时空观还是德勒兹的时空观,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或从时间性的维度阐发存在,或从先验的向度充实意识。在此意义上,康德的先验时空观无疑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牛顿的时空观和莱布尼兹的时空观,下启海德格尔的时空观和德勒兹的时空观,因而在西方时空观念史上拥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哲学[M]. 北京:商务

印书馆,1975:46.

- [2]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4] 邓晓芒. 康德时间观的困境和启示[J], 江苏社会科学,2006(6):14.
- [5] 约翰·华特生. 康德哲学讲解[M]. 韦卓民,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7-78.
- [6] 邓晓芒. 康德空间观的两层含义[J]. 新建筑,2009(6):8.
- [7] 张荣. 创造与伸展:奥古斯丁时间观的两个向度[J]. 现代哲学,2005(3):98.
- [8]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42.
- [9] 海德格尔. 时间概念史导论[M]. 欧东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03.
- [10]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C]. 孙周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4.
- [1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46.
- [12] 李科林. 时间概念与形而上学——比较康德、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的时间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6):60.



引用格式:张连富. 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9(4):57-64.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57-08

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

Two aspects of Hume's naturalism

张连富

ZHANG Lianfu

贵州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关键词:

休谟;
自然主义;
怀疑主义;
形而上学

摘要:虽然现代学术界基本上把休谟哲学解读为一种建设性的自然主义,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深刻的怀疑主义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困难。如何理解休谟哲学中的自然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了休谟哲学之谜。正确理解休谟哲学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把它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根据其贯彻始终的自然主义动机可以称之为“自然主义”;其次要把它内蕴的怀疑主义看作与自然主义相对立的另一个面向。自然主义和怀疑主义分别构成休谟哲学的两个面向。

收稿日期:2018-02-28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GDQN2017017)

作者简介:张连富(1987—),男,江西省石城县人,贵州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哲学。

不少现代学者都认为,休谟思想是“说不尽的”^[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休谟哲学仍然是一个谜,人们对于正确理解休谟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人性论》仍然存在着很多困难。这也使得解开休谟哲学之谜,成为摆在现代休谟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如托马斯·里德^[2]、康德^[3]等,把休谟解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者,认为休谟哲学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建树、完全消极的怀疑主义体系。而现代的休谟哲学解读,如肯普·诺曼·史密斯^[4]等,不是把休谟哲学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怀疑主义,而是将之看作积极的甚至是野心勃勃的自然主义。在他们看来,休谟并不是简单地终结旧哲学,而是力图改良和改造旧哲学,并提出了野心勃勃的方案和主张。换言之,他们认为,休谟不是一位消极的、无所适从的怀疑主义者,而是一位重要的、大胆的哲学改良者。《人性论》的副标题就告诉我们,休谟正在进行将实验的方法运用于道德哲学的尝试,其序言告诉我们,休谟要建立人性科学,并因此为一切科学奠基^[5]。在《人类理智研究》的第一章,休谟告诉我们,他要建立人性的解剖学,以科学的方式探究人性^[6]。这些都表明休谟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企图。因此,哪怕是当代那些自称为休谟哲学的怀疑主义解读,如 R. J. Fogelin^[7],也不否认休谟哲学中包含着积极的和建设性的自然主义思想。正如 W. E. Morris 和 C. R. Brown 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典》的“休谟”词条中所归纳的:“今天,哲学家们把休谟看作是哲学自然主义的彻底拥护者。”^[8]虽然“自然主义”这一词是后来才出现的,但是当代学者认为把它用在休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否意味着,现代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者,而传统的怀疑主义解读已经过时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这一点从史密斯所奠定的自然主义解读在当代的休谟哲学研究中遭到的不同程度的反驳和挑战就可以看出来。因此,对于当代休谟哲学研究者来说,正确地解读休谟哲学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解读模式之间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

一、休谟哲学之谜

众所周知,休谟哲学曾一度被解读为一个激进和极端的怀疑主义体系——这个怀疑主义体系据说摧毁了一切确定和客观的东西,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休谟哲学也因此遭到了不少哲学家的尖锐批评。在这些激烈的批评者当中,最为著名的当数托马斯·里德和康德。托马斯·里德^[2]在其《按照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一书中,把休谟哲学解读为一个把为近代哲学家们共同接受的概念理论推到极致的绝对怀疑主义体系,认为休谟哲学本质上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因而是科学的观念理论体系。由于自身的逻辑困境,这个观念理论体系,必然走向怀疑主义。因此,里德^[9]认为,休谟的整个哲学体系虽然建立在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之上,但由于其自身的彻底性,它仍然是科学的。康德^{[3]261-262}则把休谟看作是批判哲学的先行者,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出并实施了对理性及其概念(因果性)的有效性根据进行检验和考察的哲学家。康德^{[3]263}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他通过对理性及其概念的考察表明,理性根本不足以建立形而上学,因为像因果性那样的概念完全没有理性的根据,而是从经验中来的,因此,形而上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休谟虽然成功地终结了旧形而上学(独断论),但是对于未来可能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完全没有预期。在里德和康德看来,休谟的怀疑主义所挑战的是近代的形而上学或者哲学本身,它所反映的休谟问题就是

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哲学必须对此做出有效的回应,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为休谟已把旧哲学引向了一个死胡同。

可见,以里德为代表的传统的休谟哲学的解读者,要么认为休谟哲学的核心是从笛卡尔、洛克和贝克莱那里继承来的观念理论,要么把休谟哲学简单地归入洛克—贝克莱的英国经验论的传统当中。按照这种解读,休谟是从为近代主流哲学家所普遍接受的原理出发,并进而揭露其怀疑主义的。他们一致地认为,休谟把从近代先驱继承来的错误的哲学假设的逻辑结果给推演出来,并发展出一个彻底的怀疑主义体系来:它摧毁一切确定和客观的东西,并瓦解一切常识信念。

这种解读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直到出现了史密斯的自然主义解读。史密斯反对把休谟哲学解读为纯粹的经验论或者观念理论的做法,针对上述怀疑主义解读,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解读。他认为,对休谟哲学的传统解读严重误解了休谟哲学的本质,歪曲了休谟建构哲学体系的根本动机。于是,史密斯竭力为休谟哲学辩护,挖掘它里面的积极因素。1905年,史密斯^[4]在《休谟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主张,休谟并非单纯的经验论者或者观念理论者,也不是常识信念的批判者和破坏者,而是一个比洛克、贝克莱更为忠实和强有力的捍卫者。他认为,休谟哲学的根本动机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似:贬抑理性,把理性严格限制在实践或经验的领域。休谟哲学中存在着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相似的知识革命:知识的功能不是提出形而上学,而是给我们以生活指导。在这里,史密斯首次提出,休谟哲学的核心思想是这样一种自然主义主张:决定人类生活的,不是理性而是感觉和本能,理性唯有在服从和服务于人的感觉和情感时才是有效的。休谟所要建立的自然主义,就是要终结并

替代西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传统的理性主义,把理性、情感和感性之间不平等的关系给颠倒过来。1841年,史密斯^[10]在《大卫·休谟的哲学》一书中对休谟哲学的怀疑主义解读(主要是里德—比蒂的解读)展开了系统而强有力的攻击,并对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解读作了系统而细致的论证。史密斯试图表明,休谟哲学中的怀疑主义所归谬的,不是自己的自然主义,而是其他近代哲学家都信奉的理性主义。根据这种解读,休谟的怀疑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和瓦解自然主义,反而是后者的同盟,并为之进行辩护。

史密斯^{[10]11}主张,休谟哲学不是洛克或贝克莱式的经验论或者观念理论及其消极后果,而是这样一种学说: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感觉。因此,他说,“休谟哲学被描述为自然主义会比描述为怀疑主义更合适,并且,它的主导原理是理性彻底从属于……感觉和本能”^{[10]84},并且,这种自然主义思想来自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休谟是“通过哈奇森的道德哲学的大门进入哲学的”^{[10]12}。这种道德哲学在休谟哲学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休谟把它扩展到认识论领域。

尽管史密斯的自然主义解读竭力强调休谟哲学中的哈奇森因素,但是当代的另一些自然主义解读者并非如此,而是强调它里面的牛顿因素。20世纪大多数学者都看到了“休谟成为道德科学的牛顿的野心”所表达的自然主义倾向。如P. John认为,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哲学名称(如怀疑主义、自然主义等等)来描述休谟的著作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的著作中还是有某种统一的;它为某个单一的压倒性的意图所支配”^{[11]2}。他还说,这一意图足够清晰地表现在《人性论》的副标题中,它把休谟的工作描述为“把实验的推理方法运用到道德科学中的一个尝试”^{[11]3-4}。也就是说,“休谟的野心

就是成为道德科学的牛顿”^{[11]43}。

史密斯以及其他自然主义解读者有没有解决休谟哲学内部的不同要素之间的统一和协调问题呢?显然没有,因为仍然有许多学者认为,休谟的自然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仍然存在不可调和的张力。这一点从 R. J. Fogelin^[7]等人对这种解读的批评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一致认为,休谟哲学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包含着无法协调一致、相互冲突的异质思想。如 R. J. Fogelin^[7]认为,像史密斯一样的自然主义解读者们过分强调休谟的自然主义而忽视了他的怀疑主义。他把休谟哲学内部的自然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张力深刻地揭露了出来,也进一步暴露了休谟哲学的内在危机。

当代休谟哲学研究者受到史密斯的广泛影响,继续使用这一研究来定位他们自己在这个主题上的立场。不仅如此,即使是史密斯的批评者也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他充分塑造了关于《人性论》的争论的相关术语,即根据基本的怀疑主义/自然主义的二分。休谟的极端怀疑主义原则和结论与他推进人学的目的能否协调起来?或者说,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能否协调起来?这些问题便构成了休谟哲学之谜。这个谜的实质是:休谟的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是相互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如何解决休谟哲学之谜,如何协调休谟哲学中各个看似相互矛盾、不可调和的部分,正是 R. Popkin^[12]所谓的休谟问题——

休谟有时是新牛顿,其他时候有时是一个一切事情的滑稽的批评者,有时又是一个现代的洛克主义者,有时又是苏格兰的马勒伯朗士,或者苏格兰的皮浪,等等。问题在某一时刻得到解决,在其他时候却被宣称是无法解决的。因此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哲学秘密要处理。

休谟哲学因此成了一个谜,研究休谟哲学就是要解开这个谜。

二、休谟哲学的统一性

如前所示,所谓的“休谟哲学之谜”或“休谟问题”,其实就是休谟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或者说是休谟哲学内部的协调性问题。因此,要真正理解休谟哲学,我们就必须对它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即必须首先把它看作一个内部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即使其内部存在着一些看似矛盾的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冲突也应该在某个主导性原则或者基本主张之下得到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肯定,休谟在写作如《人性论》等著作时,有着贯穿始终的根本目的、动机和问题意识。

但许多现代的休谟哲学研究者似乎对此并不认同,他们否认休谟哲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并声称要否弃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休谟哲学形象。比如,艾耶尔在其《休谟》中说:“休谟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作家。”^[13] H. O. Mounce 也说:“完全的清晰性和一贯性不是休谟哲学的显著特征。”^[14]《剑桥休谟指南》的编者之一 D. F. Norton 也指出,“休谟哲学包含两个完全分离的元素,每一个元素都是对两个不同的‘哲学危机’(一个是思辨的,另一个是道德的)的一个回应。……《人性论》的工程缺乏任何本质的统一性,而且去寻找这样一种统一性也是错误的”^[15]。怀疑主义解读者 R. J. Fogelin^{[16]17}更是区分出“四个休谟”来:第一个是自信的休谟,一个完整的人性科学的设计者;第二个是忧郁的休谟,深受他似乎无力动摇的皮浪式怀疑之苦;第三个是节制的休谟,在期望中保持适中,对命运保持合理的满意;第四个是忙于日常生活事务的休谟。这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现代休谟哲学研究者对于休谟哲学的整体性所

持的观点。他们既反对传统解读把休谟哲学看作一种怀疑主义体系,也反对像史密斯那样的现代解读者把它解读为一贯的自然主义体系。

虽然休谟哲学的整体性在当代遭到了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休谟哲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事实上,即使那些否定休谟哲学统一性的学者,也不得不去寻找某种统一。即使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休谟哲学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几个不能协调一致的部分堆砌而成的,但对它里面的各个部分的不一致做出某种解释,这样的诠释工作本身就是对休谟哲学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因为人们若要对它里面的各个部分的某种关系做出解释,就必须预先确立某个理论框架,然后才能在这个框架下对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做出解释,而预先确立这种理论框架的工作本身就是整体把握休谟哲学的结果。这样一来,这些休谟哲学研究者们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宣称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休谟哲学,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对它里面无法统一、相互冲突的各个部分做出某种解释,以使得它们有机地聚合在一起。这一点在极端的怀疑主义解读者 R. J. Fogelin^[16] 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他否认有一个统一的休谟哲学,但在对那些不同的、无法协调起来的休谟思想做出解释时,仍然也坚持休谟对人性科学的追求在其著作中是一致的,是贯穿始终的。也就是说,它们仍然在这一点上是统一的——至少在这一总体观点之下,它们是可理解的。因此,寻求休谟哲学的某种统一性,仍然是现代休谟哲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代的休谟哲学研究者更加重视休谟自己所说的(文本),提倡对休谟哲学的客观研究,也更加注重细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与此同时,人们对休谟的哲学著作和思想的研究也

趋于碎片化和表面化,过分注重一些细节而忽视了整体,只看到休谟著作中表面上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论述,而忽视了其贯穿始终的主线。这样的研究往往沉溺于文字的表面意思而不能自拔,流于肤浅而不能深入。这是当代的休谟哲学研究者过于专业化、专门化所带来的弊病。

但是,正如史密斯所说的,我们必须首先把休谟看作一位严肃而有着缜密思维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所写出来的严肃著作不可能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充斥着各种矛盾和不一致。如果我们要对休谟哲学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必须对之有一个同情之理解,而同情之理解的前提就是,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我们要真正理解休谟哲学,首先就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即应尽力地去寻找可以把它的各个部分统一起来的某种哲学主张或原则。

由此可见,对于休谟哲学的统一性问题,传统的解读者和现代的解读者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虽然二者存在着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水火不容的。休谟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怀疑主义思想,与他积极建立人性科学或者道德哲学体系的方案,并非截然对立。实际上恰恰相反,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或者说,它们仅仅是同一个休谟哲学的两个面向,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统一的休谟哲学。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和现代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中,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个面向并将之独立化和绝对化,以至于好像在里面有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内容似的。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休谟的怀疑主义——这是传统的休谟哲学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中所看到的——表现在他对传统哲学或者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攻击上。休谟在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也把新的人学建立起来了,即把积极的自然主义建立起来了。这两个工作是同

时进行的,也是相互映衬的。因此,建立人性科学和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不过是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是同一个休谟哲学的两个方面。

三、建立人学与拒斥传统形而上学

如前所述,传统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中看到的怀疑主义其实是休谟自然主义的另一个面向,而现代解读者在休谟哲学之中看到的自然主义是休谟自然主义积极、建设性的一面。因此,现代解读者所谓的“休谟的自然主义”指的是休谟对新事物、新价值的重建,究其实质不过是他对旧事物、旧价值的拒斥和攻击。

现代解读者把休谟的自然主义理解为他建立人学或者道德科学的企图,无疑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对休谟的人学或者道德科学的理解过于狭隘,要么认为它的目的不过是为常识或者自然信念奠基,以抵抗由传统理性主义所带来的怀疑主义的攻击;要么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关于人或者人性的普遍理论,以便对人的各种现象和活动做出自然主义的解释。这样的自然主义解读忽视了休谟建立人学或者道德科学背后的形而上学目的,即通过对理性的职能、范围和权限的考察,为人类知识设定界限,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并且在自然领域内重新为科学和知识奠基。也就是说,他们忽视了休谟自然主义消极的即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一面。

所以休谟的自然主义应该从两个面向来理解:一方面,可以把它理解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方位的批判和攻击;另一方面,则可以把它理解为休谟对新的自然主义体系的积极建构。这两个方面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传统的和现代的休谟解读者由于没有完整地把握休谟哲学,即没有同时看到休谟哲学的两个面向,所以都不可避免地理解休谟哲学时有所偏差。他们常常只是抓住了它的一个面向,然后就把它看作是休谟哲学的全

部,因而以偏盖全。

虽然我们应该从正反两个面向上去理解休谟的自然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面向是同样重要的,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并列和平行的关系。显然,休谟自然主义的前一面向,即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一面,与后一面向相比,要重要得多,它对于我们对休谟哲学的整体性把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休谟哲学中每个问题的展开和阐明,都是由他的形而上学企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全面反动——所规定的,也就是说,休谟拒斥形而上学的目的和动机,对于其整个哲学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休谟自然主义中的第二个面向,即肯定性的一面,只有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才能得到合适的理解。

休谟对每个问题的讨论,无不浸透着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和批判。休谟在积极地确立某一个正面主张的同时,都必然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在相关领域的失守。休谟每放出一箭,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都必定指向传统形而上学,或者说,休谟放出的每一箭,都是由他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休谟看作是一个哲学上的纯粹改革家,简单地认为休谟的目的只是为传统形而上学概念(如实体、共相、因果性等等)奠定新的基础(史密斯和 D. F. Norton^[17]就是这么认为的,后者把休谟称为后怀疑论者),或者建立一套人学体系(B. Straud^[18]就是这么认为的),而应该认定,休谟的每个肯定的、积极的主张都是由他所要否定的东西决定的。休谟哲学的重心不在于他所肯定的内容,不在于他对新体系的建构,而在于他所要否定的东西,在于他贯彻始终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休谟并不把具体的建构工作看作自己的特殊使命,因为这是各门具体科学的工作,而是把为这种具体的建构工作奠基、做准备和为之清除障碍看

作自己的本职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而不是像后来的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在做一些具体的建构性工作。休谟认为,当时激进的自然科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这方面已经在做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了,他的工作只是为他们的具体工作扫清障碍,把旧的、不合时宜的障碍清理掉,为新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奠定基础。这样的工作只能是形而上学的。

正因如此,如果单纯从休谟积极的、正面的主张和动机上看,而不考虑到休谟贯穿始终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意图,那么我们会发现,休谟所有那些正面主张和观点都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们充满了冲突和不一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对于休谟哲学中的这种不一致,塞比-比格在为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研究》所写的序中曾这样描述:“读休谟的哲学著作要非常细心。他的书写——尤其是《人性论》的书写——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他说了如此多的不同东西——以如此多的不同方式、不同关联,并如此不在乎他之前所说的,以至于很难断定他教授或没有教授这个或那个特定学说。他把同样的原理用于如此不同的主题,以至于毫不奇怪,在他的陈述中可以发现许多文字上的以及一些实在的不一致。……这就使得在休谟那里很容易找到一切哲学,要不然就是由于让一个陈述反对另一个陈述,以至于根本没有找到哲学。”^{[6]vii} 这里再次证明,单纯从休谟正面所建立起来的学说入手,很难把休谟哲学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实际上它们只是由否定性的目的联系起来的,这一否定性的目的就是拒斥形而上学。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抹煞休谟自然主义的另一面向。虽然休谟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对于整个的休谟体系具有主导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休谟的目的是纯粹消极的、没

有为建立新的形而上学给出任何预示,就像里德和康德认为的那样。正如前面所说的,摧毁旧的价值一定伴随着新价值的建立,摧毁旧的形而上学必定伴随着新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建立。因此,虽然我们应该把休谟拒斥形而上学看作休谟哲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但我们仍然需要把积极地建立一个形而上学体系看作它的另一面向,两者不可割裂。事实上,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表明,休谟哲学中确实包含了清除一切超验或者形而上学对象的形而上学体系,并且这一体系在后来 20 世纪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思潮中被发扬光大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的大部分休谟哲学解读者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从休谟自然主义的两个面向去理解休谟哲学,忽视了休谟哲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要么忽视了它积极的、贯穿始终的自然主义,即建立人学的企图;要么忽视了它贯穿始终的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目的。

只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休谟哲学,我们就能够正确把握休谟自然主义的本质。休谟自然主义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近代的形而上学危机,这种危机外在地表现为当时所兴起的各种怀疑主义、唯物主义、启蒙思想、科学主义思潮等对形而上学的冲击,内在地则表现在不同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一致及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主义。近代形而上学的内在危机在贝克莱的学说中以最极端、最荒诞、最为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对于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回应和克服近代形而上学危机,重新为科学奠基,是休谟自然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休谟认为,近代形而上学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理性过于狂妄,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和无能,没有认识到任何

一种试图超出自然领域的形而上学对于人类这样一种有限的存在者来说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人类理性根本不足以建构任何试图超越自然的形而上学体系,人类如果偏偏要运用理性去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就必然会导致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无休止的争吵。因此,克服形而上学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彻底放弃传统形而上学这种不可能的事业。可是要拒斥、否定和彻底放弃传统形而上学,就要证明传统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休谟正是通过对理性的职能、权限和范围的考察,为人类知性设定界限,把知识严格限定在自然或者经验的领域之内,并由此证明任何形式的传统形而上学都是不可能的、不合法的。显然,休谟意图由此一劳永逸地终结传统形而上学。而休谟在考察理性、限制知性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把知识体系重新建立起来,即在自然的界限内为新的知识大厦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休谟. 论政治与经济[M]. 张正萍,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 [2] 托马斯·里德.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M]. 李涤非,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 [3]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C]//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4] SMITH N K. The naturalism in Hume[J]. *Mind* 14,1905(4):149.
- [5] HUME 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xx.
- [6] HUME D.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 [7] FOGELIN R J, ROBERT J. Hume's skepticism in th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5:xii.
- [8] MORRIS W E, BROW C R.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B/OL]. [2014-05-21] (2017-07-12).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hume/>.
- [9] REID T.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of man[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163.
- [10] SMITH N K. The philosophy of David Hume[M]. London:Macmillan & Co Ltd,1941.
- [11] JOHN P. Hume's intentions[M]. London:Duckworth,1980.
- [12] POPKIN R. 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M]. San Diego:Austin Hill Press,1980:267.
- [13] 阿尔弗雷德·艾耶尔. 休谟[M]. 曾扶星,郑莹,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52.
- [14] MOUNCE H O. Hume's naturalism[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6.
- [15] RUSSELL P. The riddle of Hume's treatise: skepticism, naturalism, and irreligion[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8-9.
- [16] FOGELIN R J. Hume's skeptical crisi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 [17] NORTON D F.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m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9.
- [18] STROUD B. Hume[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7:3-4.



引用格式:李光明,王蒙蒙.文化折扣还是文化增值?——文化多元倾向的多维效应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65-72.

中图分类号:F740.2;G11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65-08

文化折扣还是文化增值?

——文化多元倾向的多维效应分析

Cultural discount or cultural appreciation?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effects of culture pluralism tendencies

李光明,王蒙蒙

LI Guangming, WANG Mengmeng

河海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文化产品在跨文化市场贸易中存在着文化折扣和文化增值现象,这种现象直接影响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开拓。基于态度的认知情感相符理论和感知价值理论,构建消费者文化多元倾向对外国文化产品价值认知和消费意愿的影响机理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其一,文化多元倾向的两个维度——接触多样性和相对性——识别,对外国文化产品的价值感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存在文化增值现象;而差异反感度这一维度对感知价值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存在文化折扣现象。其二,消费者对外国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认知会影响其消费意愿,无论是消费者对外国文化产品的享乐价值还是教育价值认知的提升都会促使其消费意愿的提高。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文化企业进行国际营销开拓跨文化市场具有以下启示:其一,文化企业在准备进入一国市场之前,应先对该国的消费者文化多元倾向进行测量,并以此进行市场细分,通过科学细致的调研测量目标市场的大小,最终做出是否进入该国市场的决策。其二,我国文化企业应采取免费体验、巧妙传播和品牌打造等方式逐步进入目标国市场,提升国外消费者对我国文化产品的价值认知,从而刺激目标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关键词:

文化折扣;
文化增值;
文化多元倾向;
感知价值;
消费意愿

收稿日期:2018-04-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CGL015)

作者简介:李光明(1979—),男,湖北省麻城市人,河海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消费、市场营销。

文化产品或服务在跨文化环境下进行市场营销时既存在文化折扣现象,也存在文化增值现象。文化折扣是指由于文化差异导致部分在本国受消费者青睐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在外国市场上并不会被当地消费者理解和欣赏,导致文化产品和服务在跨文化市场中的效用降低,销售受阻。^[1]文化增值则表示部分文化产品或服务在跨文化市场上不但没有出现价值折损,反而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喜爱和接受。^[2]显然,文化折扣对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市场开拓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而文化增值则相反。目前,文化折扣已成为文化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一大热点。当前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视角就文化折扣对文化贸易量的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关于文化增值现象则鲜有涉及。从微观层面来看,文化折扣或文化增值本质上是消费者对国外文化产品感知价值的评估,而感知价值会最终影响消费者制定购买决策和产生购买行为^[3]。显然,从微观视角厘清文化折扣或增值的前因变量,有助于企业在跨文化环境下锁定目标客户群,开展有效的国际市场营销活动,扩大文化产品的出口规模。

文化多元倾向是由 M. L. Miville 等^[4]提出的用以表述在跨文化环境下个体对于文化多样性所持有的态度倾向的一个多维度概念。根据跨文化环境下的文化产品价值流变理论,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决定着其对于外国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行为。^[2]而态度的情感认知相符理论也指出,态度会影响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感知,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行为。^[5]鉴于此,本文拟构建文化多元倾向多维度影响消费者对外国文化产品感知价值和购买意愿的理论模型,通过便利抽样获取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从微观层面厘清文化折扣和文化增值现象的理论成因,以期为我国文化企业国际营销目标市场锁定和策略制

定提供参考依据。

一、概念界定

1. 文化多元倾向

文化多元倾向是指消费者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态度倾向,即个体对于那些在文化方面与其既存在相似性又存在差异性的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和物所持有的一种认可和接受的态度。^[3]其中,文化相似性是指跨文化背景下个体之间的文化共通之处,对文化相似性的认知有助于人们的互动联接;文化差异性则是指个体体现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种族、信仰、语言等),这些差异影响着跨文化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有效互动。^[6]文化多元倾向既包括个体对自身与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存在的文化共通点的识别,又涵盖了个体对他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点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它包括3个维度,即接触多样性、差异反感度和相对性识别。^[7]接触多样性反映了个体面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积极态度倾向,接触多样性倾向高的个体思想开放且对外国文化感兴趣,他们往往会积极地参与多样性的、国际间的社会文化活动。差异反感度反映了个体面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消极态度倾向,差异反感度倾向高的个体对外国文化比较排斥和反感,他们在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交往互动时会产生一种紧张不安、不舒服的感觉。相对性识别反映了个体面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相对理解、充分认识的无偏见态度倾向,它衡量的是一种自我比较行为,即个体在面对一切外来物时首先会比较其背后蕴含的文化与自身文化,进而处理所获得的文化差异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 and 认识彼此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7]

2. 感知价值

感知价值是指消费者主观心理上对产品属性、产品功效和使用效果的相对偏好与认知评

价。^[8]消费价值理论认为,消费者之所以会选择购买某种商品是基于对商品消费价值的认知和评估,这些价值包括社会价值、情感价值、功能价值、知识价值和条件价值。^[9]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M. R. Holbrook^[10]提出了基于体验观的感知价值概念,认为感知价值是主体在与客体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相对偏好的体验,并根据内在/外在、主动/被动、自我导向/他人导向3个维度将消费者感知价值划分为8种类型:效率、趣味、卓越、美感、成功、声誉、道德、精神价值。鉴于文化产品在内容、生产、传播、消费等方面与一般的物质产品存在较大差异,汤晖等^[11]提出,文化产品的感知价值应该包括精神价值、审美价值、情感价值、社会价值、教育价值、娱乐价值6个维度。他们还指出,各具体类别文化产品的价值都不同程度地包含了上述价值中的一种或者几种,且因不同价值在其中所占比重不同而各具特色。^[11]

鉴于文化产品和服务包含的内容较多,本研究借鉴前人关于文化折扣的研究,以外国电影为例收集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电影是文化服务范畴,消费者观看电影是一种体验活动,而且消费者只是被动地观看电影,并非参与其中,因此,本文认为消费者从外国电影中认知的价值是一种自我导向的内在价值。结合消费者访谈,本文重点关注感知价值的两个维度:享乐价值和教育价值。享乐价值是指消费者从观看电影中获得的审美、乐趣和愉悦等享受型价值;教育价值是指从观看电影中产生的求知欲、好奇心等具有认知意义的价值。^[9-11]

二、研究假设

态度的认知情感相符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认知或判断在相当程度上受其情感态度支配。^[4]可见,消费者的文化多元倾向会影响其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价值的认知。具体来说,接触

多样性有助于感知价值认知的提升。从消费文化视角来看,每个国家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接触多样性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对外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情感联系和价值认同。^[12]根据通达认同的同化效应,当某一认同被激发而通达时,消费者对于与通达认同一致的外部信息会产生更积极的评价。^[13]也就是说,当个体的外域文化认同被激发而通达时,他对外域文化产生的联想会更加积极,进而对与外域文化一致的外域文化产品产生更积极的评价。反之,当消费者的母国文化认同被激发而通达时,消费者对母国文化产品会产生更积极的评价,而对外域文化产品则会产生消极的评价。接触多样性倾向高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外域文化的新异观念,在接触外域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易于习得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新的行为方式。^[7]他们对外域文化的认同也总是处于一种经常的、反复的激发状态。^[14]此时,消费者的外域文化通达性较强,更容易对外域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从而去欣赏和理解外域文化产品和服务所蕴含的价值。从信息加工角度来看,接触多样性倾向高的消费者之所以会给予外域文化产品以积极的评价,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外域文化产品中蕴含的那些与自己情感和认同一致的信息更具相关性,更加有利于他们实现自我发展和提升。^[15]据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H1:接触多样性倾向正向影响消费者对享乐价值(a)和教育价值(b)的认知。

相对性识别倾向高有助于感知价值认知的提升。相对性识别是描述个体通过多维度视角来构建客观世界能力的概念,是反映个体认知系统区分度、清晰度差异的重要变量。^[16]相对性识别倾向高的消费者在对外域文化产品和服务做出评价前通常会有一个文化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认

知复杂性。一般而言,认知复杂性较高的个体对文化信息进行区分、整合和抽象等认知加工能力也较强。^[17]相对性识别倾向高的消费者通过不断地进行文化信息的认知加工,相应的文化信息和知识加工处理经验不断丰富,认知加工能力也越高。这种重复经验有助于他对外域文化产品所蕴含的文化图式进行良好的组织和整合,从而更好地理解外域文化产品的意义和价值。^[16]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相对性识别倾向正向影响消费者对享乐价值(a)和教育价值(b)的认知。

差异反感度会对感知价值认知产生负面效应。差异反感度倾向高的消费者,对外域文化和外域人比较排斥和反感,他们在与来自其他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互动时会产生一种紧张不安、不舒服的感觉。^[7]因此,差异反感度倾向高的消费者倾向于避免从不熟悉的外域文化中提取新的观念,从而表现出较高的认知闭合需要。^[16]而较高的认知闭合需要会促使消费者遵守母国文化规范,不能容忍任何破坏母国文化生存活力的行为,此时消费者的母国文化认同的通达性较强。^[16]对母国文化认同的消费者更可能将外域文化产品与母国文化产品的竞争甚至威胁联系起来,认为外域文化产品影响了母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会促使他们对外域文化产品产生消极的评价。^[18]换言之,差异反感度倾向高的消费者通常会将外域文化产品与感知威胁联系在一起。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差异反感度倾向负向影响消费者对享乐价值(a)和教育价值(b)的认知。

消费价值理论认为,消费者选择消费某种产品的原因在于购买前对产品的价值评估,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买哪个品牌、买哪个产品等一系列消费决策过程中都是基于产品消费价值的认知与评价。^[9]可见,感知价值是消费意愿

的重要前因变量,感知价值越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越大。^[5]陈洁等^[19]研究了不同类别产品的感知价值对消费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消费者感知服务的社交价值和享乐价值越高,其消费意愿就越强烈。S. W. Jeong等^[20]在网络购物环境下验证了消费者感知的教育价值、娱乐和审美价值都有助于其购买意愿的提高。本研究将这些结论扩展至消费者对外域文化产品的感知价值与消费意愿关系中,提出如下假设:

H4:消费者对享乐价值(a)和教育价值(b)的认知正向影响其对外域文化产品消费意愿。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1. 变量测量与预调查

本研究量表均来自已有研究,文化多元倾向的12个问项采用J. N. Fuertes等^[7]开发的量表;感知价值的8个问项是借鉴T. Rintamäki等^[21]和J. N. Sheth等^[9]的研究;消费意愿的4个问项来自C. J. Keng等^[22]的研究成果。所有量表问项都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由于量表借鉴于国外文献,为了保证信度和效度,在大规模调查前,本研究进行了预调查。我们通过街头便利抽样的方式,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200份,剔除掉漏填较为明显或者明显存在规律性填写、错填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73份。将数据导入SPSS 20.0软件,并对文化多元倾向和感知价值两个构念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文化多元倾向的KMO为0.875,感知价值的KMO为0.847,都高于0.60的标准,而且两个构念均通过了Bartlett球体检验($p < 0.001$),表明数据符合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条件。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选择最大变异法进行正交旋转,选取特征根大于1。结果显示,文化多元倾向共析出3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比例为70.83%;感知价

值共析出 2 个因子,累计解释方差比例达到 67.55%。各个问项与因子之间对应的关系与原有量表是一致的,且不存在交叉载荷现象。因子载荷系数在 0.69~0.86 之间,高于 0.60 的标准,这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此外,各因子的克隆巴哈系数(Cronbach's α)在 0.79~0.94 之间,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综上分析可见,量表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于正式调查。

2. 样本与数据收集

2017 年 10—12 月,我们运用网上调研平台“问卷星”(www. sojump. com),并在电影院门口进行了实地调研。其中,“问卷星”回收样本 278 份,实地回收样本 345 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和回答基本集中在某一数值的无效问卷后,两种问卷最终有效样本为 438 份,样本有效率为 70.3%。样本整体呈现出高学历、年轻化的人口统计特征(见表 1)。这与《中国电影受

众市场研究报告(2017)》报告的人口统计特征一致,可见,本次调查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1. 信度、效度分析

我们运用 LISREL 8.7 软件对正式调查样本数据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标如下: $\chi^2 = 573.12, d.f. = 227, \chi^2 / d.f. = 2.42$ (远小于 5 的标准值), $RMSEA = 0.058$ (小于 0.08), $GFI = 0.90$ (大于 0.85), $AGFI = 0.87$ (高于 0.80 的标准), $NFI = 0.98, CFI = 0.99$ (均高于 0.90 的门槛值)。可见,测量模型各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表明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可以接受。各个测量项目与相应的因子关系明确,因子载荷标准化系数介于 0.70~0.88 之间,均在 0.70 以上,且 t 值显著。可见,测量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测量模型的相应数据,我们计算了各变量的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见表 2)。如表 2 所示,组合信度均在 0.70 的标准之上,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也都高于 0.50 的门槛值,这表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信度。此外,所有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都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接受的区分效度。^[23]

2. 假设检验

运用 LISREL 8.7 软件,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结构模型分析,以检验前面所提出的模型和假设。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如下: $\chi^2 = 592.66, d.f. = 241, \chi^2 / d.f. = 2.46, RMSEA = 0.058, GFI = 0.90, AGFI = 0.87, NFI = 0.98, CFI = 0.99$ 。可见,结构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要求,可以进行假设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由表 3 可知,多元文化倾向的接触多样性

表 1 样本特征统计描述

人口统计特征	组别	人数	比例
性别	男	261	59.6%
	女	177	40.4%
年龄	18 岁以下	9	2.1%
	18-25 岁	153	34.9%
	26-35 岁	193	44%
	36-45 岁	70	16%
	46 岁以上	13	3%
受教育水平	高中(职)及以下	63	14.4%
	大专	124	28.3%
	本科及以上	251	57.3%
月收入	2000 元及以下	114	26.1%
	2001~4000 元	98	22.3%
	4001~6000 元	119	27.2%
	6001 元以上	107	24.4%
职业	公司职员	168	38.4%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	71	16.3%
	学生	103	23.5%
	工人、服务人员、操作人员	50	11.4%
	个体工商户	30	6.8%
	其他	16	3.6%

表2 组合信度、平均方差萃取量检验

变量	CR	AVE	1	2	3	4	5	6
接触多样性	0.90	0.69	(0.83)					
相对性识别	0.88	0.65	0.228**	(0.81)				
差异反感度	0.90	0.71	-0.608**	-0.487**	(0.84)			
享乐价值	0.84	0.57	0.519**	0.464**	-0.598**	(0.75)		
教育价值	0.89	0.66	0.567**	0.503**	-0.699**	0.570**	(0.81)	
消费意愿	0.92	0.75	0.591**	0.495**	-0.738**	0.669**	0.764**	(0.87)

注:1. **表示 $p < 0.01$ (双尾检验); 2. 对角线上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

表3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t值	结论
H1a:接触多样性之享乐价值	0.31***	5.10	支持
H1b:接触多样性之教育价值	0.24***	4.69	支持
H2a:相对性识别之享乐价值	0.26***	5.00	支持
H2b:相对性识别之社会价值	0.23***	5.13	支持
H3a:差异反感度之享乐价值	-0.36***	-4.96	支持
H3b:差异反感度之教育价值	-0.51***	-8.08	支持
H4a:享乐价值之消费意愿	0.37***	8.07	支持
H4b:教育价值之消费意愿	0.61***	12.76	支持

注: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维度对个体从外域电影中感知到的享乐价值 ($\beta = 0.31, p < 0.001$) 和教育价值 ($\beta = 0.24, p < 0.001$) 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 成立。同样, 多元文化倾向的相对性识别维度对个体从外域电影中感知的享乐价值 ($\beta = 0.26, p < 0.001$) 和教育价值 ($\beta = 0.23, p < 0.001$) 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 成立。不过, 多元文化倾向的另一个维度——差异反感度显著负向影响个体从外域电影中感知的享乐价值 ($\beta = -0.36, p < 0.001$) 和教育价值 ($\beta = -0.51, p < 0.001$), H3 成立。H4 描述了个体感知到的感知价值对其消费意愿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个体从外域电影中感知价值的两个维度——享乐价值 ($\beta = 0.37, p < 0.001$) 和教育价值 ($\beta = 0.61, p < 0.001$) 均对消费意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态度的认知情感相符理论和感知价值

理论, 笔者认为, 多元文化倾向不同维度会导致个体对外域文化产品的价值认知产生差异, 也就是文化折扣或文化增值, 最终影响个体对外域文化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意愿。基于此, 本文构建了多元文化倾向影响消费者价值和消费意愿的理论模型, 并以外域电影为例, 通过调研获取数据,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模型和假设, 得到如下结论: 其一, 多元文化倾向不同维度对个体的外域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认知影响显著。具体来说, 接触多样性和相对性识别两个维度较高的消费者会更加容易理解和欣赏外域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相应的消费意愿也会提高, 从市场上来看就表现为文化增值; 而差异反感度倾向高的消费者则难以形成对外域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认知, 表现为文化折扣。这一研究结果验证了态度的情感认知理论。其二, 消费者对外域文化产品或服务的价值认知会影响其消费意愿, 无论是消费者对外域文化产品的享乐价值还是教育价值认知的提升都会促使其消费意愿的提高。这一结论在跨文化消费环境下验证了感知价值理论。

研究结论对于我国文化企业进行国际营销开拓跨文化市场具有以下启示: 其一, 文化企业在准备进入一国市场之前, 应当先对该国的消费者文化多元倾向进行测量, 并以此进行市场细分, 通过科学细致的调研测量目标市场的大小, 最终做出是否进入该国市场的决策。如果目标市场容量足够盈利, 那么可以依据目标市

场消费者的多元文化倾向锁定目标消费群体。根据研究结论,企业应当开拓接触多样性和相对性识别倾向较高的目标国消费者市场,认真研究和努力契合这些消费者对多元文化的心理认同,并针对他们的特征设计营销策略进行重点突破,打开目标市场。其二,文化企业应当提升目标市场国消费者对本企业文化产品的价值认知。一方面,在设计和开发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要重视多元文化融合的主题。多元文化融合不仅包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地域文化的吸收,还包括对时尚元素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中产生的共生文化的驾驭,从而提升目标国消费者对我国文化产品的价值认知。另一方面,价值认知是一种主观心理活动,而文化产品或服务提供的更多是一种体验。因此,我国文化企业在目标国市场可以采取免费体验、巧妙传播和品牌打造等方式,提升国外消费者对我国文化产品的价值认知,从而刺激目标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本文从微观视角为文化产品或服务在国际营销中存在的文化折扣和文化增值现象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为文化贸易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过,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以外域电影消费为例进行数据搜集,虽然帮助本研究控制了不同文化产品的多元特性,但也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更广泛的文化产品类型在国际市场上的折扣和增值现象。此外,多元文化倾向作为一种态度,其形成和改变的机理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1] 卫迎春,钟晓玥. 消费成瘾、文化折扣与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J]. 学习与实践, 2016(6): 128.
- [2] 胥琳佳,刘建华. 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流变:文化折扣与文化增值[J]. 中国出版,2014(8):8.
- [3] 李凌慧,曹淑艳. B2C 跨境电子商务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1):151.
- [4] MIVILLE M L, GELSO C J, PANNU R, et al. Appreciating similarities and valuing differences: the miville-guzman universality-diversity scale [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99(3): 291.
- [5] 符国群. 消费者行为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6] STRAUSS J P, CONNERLEY M L. Demographics, personality, contact, and universal-diverse orientation: an exploratory examination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3(2): 159.
- [7] FUERTES J N, MIVILLE M L, MOHR J J, et al. Factor structure and short form of the miville-guzman universality-diversity scale [J].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00(3): 157.
- [8] WOODRUFF R B. Customer value: the next sourc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7(2): 139.
- [9] SHETH J N, NEWMAN B I, GROSS B L. Why we buy what we buy: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991(2): 159.
- [10] HOLBROOK M B. Introduction to consumer value [C]. HOLBROOK M B. Consumer value: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nd research.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28.
- [11] 汤晖,钟洁. 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感知价值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11): 136.
- [12] VERLEGH P W J, STEENKAMP J B E M.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untry-of-origin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99(5): 521.

- [13] REED II A, BOLTON L E. The complexity of identity [J].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5(3):17.
- [14] LEUNG A K Y, CHIU C.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ulti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openness to experience on creative potential [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08(4):376.
- [15] WHEELER S C, PETTY R E, BIZER G Y. Self-schema matching and attitude change: situational and dispositional determinants of message elaboration [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5(4):787.
- [16] 杨晓莉, 刘力, 张笑笑. 双文化个体的文化框架转换: 影响因素与结果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5):840.
- [17] BURLESON B R, CAPLAN S E. Cognitive complexity [C]//MCCROSKEY J C, DALY J A, MARTIN M M, et al.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ity: trait Perspectives, Cresskill. NJ: Hampton, 1998:230-286.
- [18] 郭晓凌, 张银龙, 康莹仪. 发达国家消费者如何评价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品牌——基于全球认同与当地认同视角的分析 [J]. 营销科学学报, 2014, 10(1):52.
- [19] 陈洁, 王方华. 感知价值对不同商品类别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的差异 [J]. 系统管理学报, 2012(6):802.
- [20] JEONG S W, FIORE A M, NIEHM L S, et al. The role of experiential value in online shopping [J]. Internet Research, 2009(1):105.
- [21] RINTAMÄKI T, KANTO A, KUUSELA H, et al. Decomposing the value of department store shopping into utilitarian, hedonic and social dimensions: evidence from finlan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006(1):6.
- [22] KENG C J, HUANG T L, ZHENG L J, et al. Modeling service encounters and customer experiential value in retailing: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hopping mall customers in taiw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2007(4):349.
- [23] HAI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et al.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a global perspective [M]. 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09.



引用格式:赵占恒. 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4): 73-80.

中图分类号:F715.2;D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73-08

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ment power, social status and corporate top manager's corruption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赵占恒

ZHAO Zhanheng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以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企业高管腐败案件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出发,对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其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社会身份是导致企业高管腐败行为的两个重要因素;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其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且在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较高情况下,管理权力对腐败行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其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这些发现对全面理解我国企业高管腐败背后的诱因,推动对企业高管腐败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1)治理企业高管腐败,不仅需要加大对高管腐败的惩治力度,更需要深入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2)需要企业塑造诚信公正、合法守纪的健康文化,提升企业高管的道德认知水平,进一步完善企业资金管理制度,构建有效的资金使用监督体制;(3)治理企业高管腐败需要社会各领域腐败治理工作的同步推进,只有从制度、经济、文化等根源上遏制腐败,才能真正化解“反腐无用论”的质疑。

关键词:

管理权力;
社会身份;
企业高管;
腐败

收稿日期:2018-05-25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182400410049)

作者简介:赵占恒(1982—),男,河南省汝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领导者行为与组织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各领域反腐力度的加大,企业高管腐败案件正呈现出高发趋势,2013年更被称为“高管落马年”。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企业高管腐败将严重破坏经营效率、财富公平、社会清廉与团结和谐等^[1]。因此,系统探讨企业高管腐败的诱因,打击企业高管腐败,对深入推进我国企业高管腐败治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腐败更多地被视为一个政治术语,故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官员腐败领域。直到21世纪初,受安然、世通等世界知名企业腐败行为的影响,企业高管腐败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目前,对企业高管腐败诱因的研究,西方学者主要从微观层面的领导个体因素、中观层面的企业文化与公司治理因素、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因素三个层面展开^[2]。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阶段,在市场环境、公司治理机制、高管行为特征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独特性,因此,有必要基于我国国情对企业高管腐败的诱因展开深入研究。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制度问题是中国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3],因此,现有的对我国企业高管腐败诱因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我国的薪酬管制^[4]、市场化改革^[1]等制度环境因素展开探讨。但强调中国文化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关系”特质,传统的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腐败问题的重要文化根源^[5]。那么,社会身份、管理权力作为企业高管人际关系(包含非正式关系和正式关系)形成的基础变量,与其腐败行为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搜集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采用目前学术界常用的变量测量题项,对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管理权力与其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推动我国对企业高管腐败的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企业高管腐败及其治理

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学科领域,腐败

均被视为一种基于权力寻租手段的利益攫取行为^[1]。以此为基准,依据控制权私利理论,C. L. Pearce等^[6]将企业高管腐败界定为:企业高管以牺牲投资者利益或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代价谋取私人直接利益的不道德行为。徐细熊^[2]进一步将企业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企业高管为谋取私利而实施的明显违反相关法律或监管条例的行为,如违规资产操作、非法侵占企业财产、收受贿赂等;后者是指企业高管以奢靡的在职消费、获取超额薪酬、构建商业帝国等隐蔽的途径或方式而实施的权力寻租行为。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何种类型的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均会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和投资者利益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7],且企业高管腐败往往会诱发政府官员腐败,系列的腐败案件会恶化企业所在区域的社会道德风气^[8]。

在企业高管腐败案件频发背景下,企业高管腐败治理正成为经济、社会、管理、法律等学科日益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揭示企业高管腐败的诱因是治理腐败的前提和关键,现有的有关企业高管腐败治理文献大多是从探讨企业高管腐败的诱因入手的。例如,徐细熊^[2]在对国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中发现,当前对企业高管腐败诱因的研究,主要涵盖微观的领导个体因素、中观的企业文化与公司治理因素和宏观的制度环境因素三个层面的内容。根据我国情况,国内学者主要是基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以19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政府分权改革为背景展开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的存在与企业高管腐败正相关^[4],而市场化改革则有利于缓解所在地区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1]。因此,减少政府干预、改善政府服务、加强法制建设等,均有利于抑制企业高管的寻租活动与非生产性支出^[9]。H. Hung^[10]针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小金库”现象进行研究后发现,“小金库”是企业为高管支

付超额佣金、建立和维系高管私人网络关系抑或为满足高管奢侈的在职消费等而设立的账外账。因此,抑制企业高管腐败不仅需要在机制上加大组织监控力度,更需要从根源上彻底变革企业高管的意识形态,提高企业高管的认知水平和精神境界。L. J. Huang 等^[11]通过对中国国企高管腐败案例的深入分析,指出高管腐败是我国国有企业内部道德风气败坏的集中表现形式,而官僚性领导风格和监管缺失则是造成国企内部不良道德风气的根源。可见,目前对我国企业高管腐败诱因的研究,虽涵盖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内容,但研究视角多立足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尚缺乏从我国的关系文化视角进行探讨。

2. 管理权力与企业高管腐败

S. Finkelstein^[12]认为,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是企业高管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主要通过企业高管的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来衡量,其中,结构权力是科层组织赋予高管的法定职位权力,所有权权力反映了企业高管的资本控制权力,而专家权力和声望权力实际上都源于企业高管的个人能力,因此,E. H. Kim 等^[13]进一步将二者统称为个人能力权力。漆多俊^[14]认为,任何权力都源于权利(得到公认和保障的应受分配之利益),但在权力形成之后,往往会出现权力背离权利(利益)现象。权小锋等^[15]将研究具体到企业高管管理权力领域,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管理权力与其所获取的私有收益正相关;徐细熊等^[1]也发现,CEO 的权力强度与其腐败行为正相关;李连华^[16]也发现,高管学历是影响企业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学历是构成企业高管管理权力的指标之一。李锡海^[17]进一步指出,虽然永无止境的权力欲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化倾向,但我国的官本位特征明显,悠久历史积淀的博大权力文化已成为诱发我国权力拥有者腐败犯罪的文化根源。据此,本文认为,我国企业高管(包

括董事长、总经理、职能部门管理者等)的管理权力是诱发其腐败的关键因素。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在企业内部,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也越大。

3. 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

社会身份是个体作为某个社会群体成员的自我概念,一旦个体将自己归入某个社会类别或被外界归入某个社会类别,该个体就具有特定的社会身份^[18]。借鉴高勇强等^[19]的研究,本文将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限定为企业高管参与政府、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而形成的特殊角色身份。

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属性,体现了其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但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企业高管社会资本可以提高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20];另一方面,企业高管在利用社会资本从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获取信息、影响力和商业友谊等资源时,需要付出高昂的维系成本,且可能以牺牲个人决策自由为代价^[21]。H. Hung^[10]在对我国企业高管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也指出,企业高管建立和维系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是其腐败行为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也越高。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声望(名)、权力(权)和财富(利)被视为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源,这三种资源虽各自独立,却有一个共同特质——达高性^[22]。因此,微观个体在无限追逐其中一种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往往会以另外两种资源作为基础。对于企业高管而言,社会身份作为一种声望资源,其社会身份越高,其所拥有的视野越开阔,其通过寻租获取财富的机会就越多,如果此时企业高管在企业内部拥有较大的管理权

力,寻租动机向寻租行为转变的可能性将会更高。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对于社会身份较高的企业高管而言,其管理权力与腐败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二、研究设计

1. 样本来源

采用手工搜集手段,考虑到数据的易获得性和样本量的合适程度,本研究整理了2010年至2014年6月间发生且在网络上公开报道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例,具体搜集方法和程序是:(1)在百度搜索上进行关键词查找,获取媒体公开报道的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信息,根据案发时间,查阅上市公司公告,若公告中披露了该负面事件,则将该案件中的涉事高管确定为研究样本;(2)依据案发时间,按照上市公司的规模、性质、主营业务、行业排名、所在区域等标准,寻找1家与腐败企业极为相似但未发生高管腐败行为的上市公司,从中随机选择1名与涉案高管职务相同的未涉案高管,作为对照样本;(3)依据本研究的变量测量指标,搜集所有样本的相关信息。剔除个别信息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发生腐败行为的高管样本87个,未发生腐败行为的高管样本91个。

2. 变量测量

(1)管理权力。参考E. H. Kim等^[13]的研究,从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个人能力权力三个维度测量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其中,结构权力用企业高管的现任职位和任职年限来测量,对现任职位而言,由于董事会在影响企业决策和行为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徐细熊等^[1]、赵息等^[23]在测量CEO权力时,均把CEO是否兼任董事会成员作为其衡量标准。依此规则,本研究先运用三分法的定序指标(董事长的权力最大,取值为1;其他董事会成员的权力次之,取值为2;非董事会成员权力最

小,取值为3)对企业高管的职位情况进行描述统计,然后以企业高管职位是否超过样本均值,设置一个哑变量作为测量变量。对任职年限而言,企业高管任现职时间越长,对业务越熟悉,威信越高,地位也越稳固,测量方法也是先对其任职年限进行描述统计,然后以样本均值为标准,设置一个哑变量。所有权权力用股权结构和高管持股来衡量。股权越分散,股东的“搭便车”倾向将导致其对企业高管的监督较为薄弱^[23]。具体计算方法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结果若小于1,则意味着股权结构较为分散,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企业高管一旦持有公司股份,则其将拥有更大权力^[12],以企业高管是否持股设置一个哑变量。个人能力权力用内部晋升、学历水平进行衡量。相对于“空降兵”而言,由内部晋升的企业高管对企业更为熟悉,其积累的权力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其行使权力^[1]。高学历的企业高管(硕士及以上),其专业技能越高,越容易获得同事的认可,其权力就越大。综合以上6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第一大主成分被定义为“企业高管的综合管理权力”。

(2)社会身份。借鉴高勇强等^[19]的研究,从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政党身份、行业身份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依据企业高管是否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否加入共产党或民主党派、是否加入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分别设立三个哑变量。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出的第一大主成分被定义为“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

(3)其他变量。企业高管腐败被设置为哑变量,若存在腐败行为,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同时选择企业高管的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定义具体见表1。

三、数据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87个腐败高管样本进行初步统

计。就管理权力而言,担任董事长职位的腐败高管有 23 人,担任内部董事的腐败高管有 38 人,即兼任董事会成员的腐败高管数量占总腐败样本数量的 70.11%;腐败高管任现职年限的均值为 3.45 年;40.23% 的腐败高管(35 人)在其任职公司中持有股份;81.61% 的腐败高管(71 人)任现职以前在其公司有工作经历;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38 人)占腐败高管数量的 43.68%;且这 87 个腐败高管分布在 79 个上市公司中,52 个公司为国有控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控股比例之和的公司为 34 家(占比 43.04%)。就社会身份而言,82.76% 的腐败高管(72 人)为中共党员,35.63% 的腐败高管(31 人)担任地方以上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52.87% 的腐败高管(46 人)为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成员。另外,腐败高管的平均年龄为 49.53 周岁,性别多为男性(占比 94.25%)。

其次,对 178 个总样本数据(包含腐败高管样本和未腐败高管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对管理权力的 6 个指标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 $KMO = 0.683 > 0.5$, $p = 0.002$,说明测度指标间存在共线性问题。运用相同方

法,社会身份的三个测度指标间的共线性问题($KMO = 0.782 > 0.5$, $p = 0.000$)也得到了证明,表明两个变量均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借鉴徐细熊等^[1]的研究,分别以提取出的第一大主成分对管理权力和社会身份两个变量进行衡量,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由表 2 可知,样本中有 49% 的高管发生了腐败行为,企业高管腐败与其管理权力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428 > 0.04$, $p = 0.008 < 0.01$,这表明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为假设 1(H1)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性证据。同样,企业高管腐败与其社会身份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109 > 0.04$, $p = 0.036 < 0.05$,说明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这为假设 2(H2)提供了初步的支持性证据。由表 2 还可发现,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48.58 岁,且年龄与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年龄与腐败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这表明年龄并不是影响高管腐败的主要因素,但企业高管年龄越大,其内部管理权力和外部社会身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与我国强调资历的文化环境基本一致。但是,研究并没有发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因变量	高管腐败	若企业高管存在腐败行为,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现任职位	以“董事长为 1,其他董事成员为 2,其他为 3”为统计标准,当现任职位小于样本均值时,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任职年限	任职年限超过样本均值时,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股权结构	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 1,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高管持股	若企业高管持有本公司股份,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内部晋升	若企业高管任现职前,在本公司具有工作履历,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自变量	学历水平	若企业高管学历在硕士以上,则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管理权力	以上 6 个指标的主成分合成指标
	政治身份	企业高管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政党身份	企业高管加入共产党或民主党派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行业身份	企业高管加入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的,赋值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社会身份	以上 3 个指标的主成分合成指标
	年龄	以腐败信息公布日期为基准统计企业高管实际年龄
	性别	男的为 1,女的为 0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腐败	权力	身份	年龄	性别
腐败	0.49	0.504	178	—				
权力	0.58	0.498	178	0.428**	—			
身份	0.41	0.495	178	0.109*	0.037	—		
年龄	48.58	5.852	178	0.031	0.132**	0.447*	—	
性别	0.92	0.281	178	0.056	-0.015	0.128	0.146	—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05,**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现性别与其他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其部分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女性样本过少(仅占总样本的8%)所致。

2. 实证检验

(1)H1 检验。以管理权力均值为划分标准,将管理权力划分为两个组,以企业高管腐败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均值差异性检验。T检验结果显示:就企业高管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而言,两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且权力越大,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高(分析结果见表2)。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也显示,管理权力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beta = 0.583, p = 0.000$)。因此,H1得到充分检验。

(2)H2 检验。检验方法同上。T检验结果显示:在社会身份高低程度不同的两组样本间,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存在显著性差异(均值分别为0.61和0.39, p 值小于0.05);且社会身份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beta = 0.218, p = 0.027$)。因此,H2也得到充分检验。T检验结果具体见表3。

(3)H3 检验。由表1可知,社会身份与管理权力间的相关系数不显著,因此,可适合进行调节作用的检验。H3推测,社会身份正向调节管理权力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管理权力与社会身份的交互作用显著($F = 0.108, p = 0.037 < 0.05$),表明社会身份的调节作用确实存在(见图1)。由图1可知,社会身份正向调节了管理权力与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见,当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和管理权力均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

性最低,但在二者均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发生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最高。

表3 T检验结果

分组变量	样本组	样本	均值	T值	显著性
管理权力	大	102	0.53	2.261	0.038
	小	76	0.44		
社会身份	高	82	0.61	4.735	0.016
	低	96	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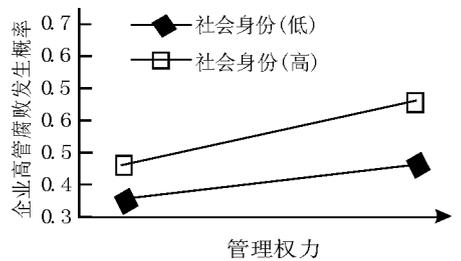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身份的调节作用

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明以上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首先,借鉴徐细熊等^[1]的研究,采用求和均值法对管理权力和社会身份两个变量进行重新计算,并按照前文实证检验的步骤,逐一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全部假设也均得到检验。由于该验证过程与前文相同,因此在此不再赘述。

另外,无论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还是求和均值法,均是对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两个变量的综合衡量,无法呈现其内含指标对因变量的解释效价。因此,以表1所列示的管理权力的6个指标变量、社会身份的3个指标变量为自变量,以高官腐败为因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具体见表4。

表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B 值	标准误	β 值	t 值
截距	13.587	1.258		9.457
现任职位	6.984	2.143	0.215	5.487**
任职年限	3.569	3.237	0.117	3.256*
股权结构	-4.642	-2.49	-0.138	-2.872*
高管持股	6.947	2.144	0.196	5.316**
内部晋升	2.172	1.37	0.057	2.359*
学历水平	2.081	1.45	0.033	2.215*
政治身份	3.461	1.073	0.165	4.213**
政党身份	2.048	3.154	0.048	0.097 n. s.
行业身份	4.194	1.375	0.069	2.375*

$R=0.781, R^2=0.457$, 调整后的 $R^2=0.454, F=179.258^*$

注:n. s. 表示回归系数不显著,* 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05,** 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0.01。

由表4可知,管理权力的6个指标变量的回归系数全部达到显著水平,即企业高管的现任职位越高、任现职年限越长、学历越高,则越容易发生腐败行为,同时,如果高管所在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或高管持有公司股份、抑或高管任现职以前长期在公司工作,则高管发生腐败的可能性也较高。另外,在社会身份的三个指标变量中,政治身份和行业身份的回归系数显著,表明拥有政治身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行业身份(行业协会或工商联组织)的企业高管,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较高。但同时也发现,政党身份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也间接表明在党派群体网络下,成员间的关系资源利用并不紧密。

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实证分析部分,用管理权力、社会身份的综合衡量结果进行假设部分的检验,其分析过程和分析结论是可靠的。

四、结论与启示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频发的企业高管腐败现象,本文基于微观视角,探讨了管理权力、社会身份与企业高管腐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如下。

其一,企业高管的管理权力越大,则其越有

可能发生腐败行为。这说明:不仅在政治领域权力趋向腐败,在商业管理领域权力也是导致高管腐败的关键诱因。该现象的存在,不仅与我国政府分权改革背景有关,还与我国传统的权力文化相关:强烈的权力欲和功利意识为企业高管腐败埋下祸根。

其二,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则其越有可能发生腐败行为。已有研究表明,政治晋升预期较高的高管,倾向于采取公款消费、跑官等寻租手段来打点、维持、提升各种关系,尽可能为其政治升迁铺平道路^[24]。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尤其是政治身份和行业身份),其发生腐败的可能性越大。这也表明,在“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影响下,企业高管往往会以牺牲股东利益为代价进行私人社会关系的维护。

其三,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越高,管理权力与腐败行为间的正向关系越显著。这表明,企业高管社会身份越高,其不仅运用非私人财产维系其个人社会关系的成本更大,且其面临的寻租机会更多,此时,如果高管拥有足够的管理权力,其腐败的可能性会更大。可见,管理权力是导致企业高管腐败的关键因素,而社会身份则为企业高管腐败提供了支撑。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其一,治理企业高管腐败,不仅需要加大对高管腐败的惩治力度,更需要深入推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其二,由于企业高管的社会身份具有合法性特征,且社会身份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往往具有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防范企业高管在私人社会关系网络上的过度(或非法)投资,不仅需要企业塑造诚信公正、合法守纪的健康文化,提升企业高管的道德认知水平,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资金管理制度,构建有效的资金使用监督体制。其三,企业高管腐败是整个社会不良道德风气的体现,治理企业高管腐败需要社会各领域腐败

治理工作的同步推进,只有从制度、经济、文化等根源上遏制腐败,才能真正化解“反腐无用论”的质疑。

受数据搜集方法的限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研究结论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同时,受样本量较小的影响,本文并未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类型进行深入分析,仅仅以哑变量的方式对企业高管腐败的可能性进行了初步分析。当然,这些不足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 [1] 徐细熊,刘星.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J].管理世界,2013(3):119.
- [2] 徐细熊.企业高管腐败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4):73.
- [3] 孙焯,张晶.制度环境对高管腐败作用的边界条件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7(7):128.
- [4] 陈信元,陈冬华,万华林,等.地区差异、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J].管理世界,2009(11):130.
- [5] 金爱慧,赵连章.论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对腐败的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
- [6] PEARCE C L, MANZ C C, SIMS H P. The roles of vertical and shared leadership in the enactment of executive corruption: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8(3):353.
- [7] OLER D. Governance, CEO power and acquisitions[J]. Journal of Finance, 2011(8):2012.
- [8] LUO Y.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f corruption[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1):119.
- [9] 万华林,陈信元.治理环境、企业寻租与交易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非生产性支出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0(2):553.
- [10] HUNG H. Normalized collective corruption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small treasuries in large Chinese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1):69.
- [11] HUANG L J, SNELL R S. Turnaround, corruption and mediocrity: leadership and governance in thre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1):111.
- [12] 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2(35):505.
- [13] KIM E H, LU Y. I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power bad? [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4):495.
- [14] 漆多俊.论权力[J].法学研究,2001(1):18.
- [15] 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73.
- [16] 李连华.内部控制、学历水平与高管腐败:理论框架与实证[J].财经论丛,2017(6):69.
- [17] 李锡海.权力文化与腐败犯罪[J].山东社会科学,2007(1):81.
- [18] 汪良军,刘美辰.社会身份与行为决策关系实验经济学研究前沿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4):22.
- [19] 高勇强,何晓斌,李路路.民营企业社会身份、经济条件与企业慈善捐赠[J].经济研究,2011(12):111.
- [20] 贺远琼,田志龙,陈昀.企业高管社会资本与企业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07(3):33.
- [21] ADLER P S, KWON S W.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1):17.
- [22] 尉建文,赵延东.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J].社会学研究,2011(3):64.
- [23] 赵息,张西栓.高管权力及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1):114.
- [24] 曹伟,杨德明,赵璨.政治晋升预期与高管腐败——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动态,2016(2):59.



引用格式:王千,赵伟伟. 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与路径研究综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81-87.

中图分类号:F27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81-07

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与路径研究综述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and path of users' participation in innovation

王千,赵伟伟

WANG Qian, ZHAO Weiwei

郑州大学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或增加新服务时,用户参与已经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通过对目前学界关于用户参与创新的内涵、动力和路径的梳理发现:用户参与创新是指用户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或者获得相关利益,间接或者直接地与企业合作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而提出创造性意见的行为。用户参与创新的内部动力来自于用户,而外部动力来自于企业、外部环境等。用户参与创新的路径因企业与用户类型不同而不同,有企业与领先用户合作、用户创新工具箱的使用和服务行业特殊的用户参与创新等。在互联网时代,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用户在企业创新过程中都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企业必须对用户参与给予高度重视,结合自身条件与所处的环境,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探索并开辟适合本企业用户参与创新的新路径,充分利用群众智慧,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

用户参与创新;
用户需求;
市场环境;
用户创新工具箱

收稿日期:2018-04-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U15047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15YJC630127)

作者简介:王千(1975—),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虚拟经济与管理;赵伟伟(1992—),女,河南省新乡市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虚拟经济。

随着技术飞速变革和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复杂的生存环境使企业愈发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而用户需求的差异化与信息的黏滞性又使企业单纯依靠技术人员进行创新的模式无法跟上以用户为中心的市场化趋势。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创新模式愈益显示出其民主化倾向,用户参与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抓手和发展领域^[1-2]。还有学者通过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发现在很多行业和领域中,企业不再是唯一的创新源,用户也是创新系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用户也是创新者^[3-4]。随着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或增加新服务时,用户参与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拟通过对目前学界关于用户参与创新的内涵、动力和路径的梳理,总结已取得的成果,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明确其未来研究的重点,以期深化该问题的研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用户参与创新的内涵

关于用户参与创新的内涵,有很多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例如,吴贵生等^[5]认为,用户参与创新是指用户为了自己的使用目的而提出的新设想,并对所使用的工具、材料、设备、工艺和生产的 product 进行改进;吴伟^[6]认为,用户参与创新包括直接的用户行为和间接的用户精神两个层面,用户既可通过实际行动参与创新,也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参与创新;郑彤彤^[7]认为,用户参与创新是一种合作创新模式,强调用户全方位参与和互动,用户和企业相辅相成,共同创造价值;陈晓萍^[8]认为,用户参与创新,主要是指使用某一产品或服务的用户通过企业提供的互动平台进行知识分享,依赖自身和外部的知识、经验、技能对产品或服务提出

新的想法、进行渐进性的改进或根本性的改进活动,以满足自身或有相同需要的用户。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用户参与创新内涵的界定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强调了用户参与的重要性,并概括了用户参与创新的方式。结合目前学界对用户参与创新内涵的界定,我们认为,用户参与创新是指用户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或者获得相关利益,间接或者直接地与合作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而提出创造性意见的行为。

二、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

关于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由内部产生的直接动力

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目前学界主要从用户自身需求、用户特性、用户能力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一主题。

(1)用户自身需求。C. Huffman 等^[9-10]发现,获取与自身需求相关的利益可促使用户参与产品创新。张辉等^[11]指出,只有当用户可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时,用户才愿意将自己掌握的信息传递给企业,即通过参与产品创新来获得礼券、折扣等优惠。

(2)用户特性。研究表明,用户特性对用户群体的个体创造力会产生一定作用,包括兴趣爱好、主动性、感知度等。用户独特的兴趣爱好会使用户对某一领域的新事物感到新鲜,产生强烈的好奇心,促使用户产生创新性思维。李霞等^[12]在研究中发现,用户的主动性会对其与企业的交互产生直接的影响,主动性高的用户会积极地向企业表达自身的需求和想法,主动性低的用户则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激情去展示自己的新想法。若用户感知度强,对产品的各种性能较为敏感,当新产品开发出来时,这些感

知度高的客户会优先关注新产品,并做出评价。李霞等^[13]提出,领先用户相对于普通用户更愿意参与到产品的创新或改造中,以期获取超前的利润和创新的成就感。

(3)用户能力。研究表明,用户能力能够体现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而个人综合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用户参与创新的能力。何国正^[14]认为,与创新活动相关的用户能力包括知识能力、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能力。樊银芳^[15]指出,如果用户自身的知识水平不够、技术有限或能力不足,那么企业就要花费精力、财力对用户进行培训。由此可见,只有具备相应创新能力的用户才会应邀或者主动参与到企业的创新活动中,用户的综合能力越强,参与创新的程度越高。

2. 由外部产生的间接动力

现在的市场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企业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而用户的需求变化也越来越快,因此企业必须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和对用户需求变化的创新能力^[16]。当今时代已不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时代,而是个性化定制的时代,这样的市场环境激励着企业去了解用户的喜好,去迎合用户的需求^[17]。梳理总结相关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学界认为,用户参与创新由外部产生的间接动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市场环境、国家政策三个方面。

一是企业。李随成等^[18]认为,当企业意识到用户参与创新的重要性时,它们会积极挖掘用户的特殊需求,并邀请用户与之共同创新。吴伟^[16]认为,企业激励用户参与产品创新,主要是基于这种参与能为产品创新绩效带来积极影响:一方面,提高产品创新的效率。企业通过引导用户参与,可以迅速并准确获取用户提供的有用信息,及时地把握顾客偏好、获取新创意,通过让用户参与测试,能避免重复试错,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另一方面,降低产品创新的成

本。由于存在黏着信息,企业与用户在进行信息交流时会有某种程度的沟通障碍,导致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因此,用户参与创新在经济上是具有合理性的,有效地降低了产品开发成本。

二是市场环境。近些年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在服务业、制造业都催生了企业商业模式的新一轮创新热潮,理论界也对此展开了很多研究。刘丽辉^[17]分别从外在和内在层面分析了市场和用户的变化:从外在层面看,市场正在快速进入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个性化消费时代,用户更愿意选择“自己想要的产品”而非“厂家愿意销售的产品”;从内在层面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注重产品的使用感,以获得心理上、精神上的满足。孙黎等^[19]站在创新的视角,认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已不是销售额或价格的竞争,而是互联网思维的开发模式与传统开发模式的较量。王静^[20]认为,互联网的普及为用户参与企业创新提供了无限的平台(如众创、众包、众筹平台等),使得用户参与创新的深度与广度均得以极大拓展。体验经济的到来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类需求提高的必然结果,企业的用户创新意识逐渐觉醒。

三是国家政策。郑彤彤^[7]指出,政府通过颁布政策法规,对用户参与创新进行鼓励、保护,并给予相应的财政支持,这些政策法规对整个市场走势和企业运营也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此外,学者们普遍认同,学术界提供的理论上的支持,对用户创新的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为用户成为一种活跃的、积极的、可持续的创新源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综上所述,用户参与创新的直接动力来自于用户,而完成创新过程的关键在于用户的参与,普通用户可能被企业以各种方式邀请参与企业创新,而素质较高的领先用户则会主动地参与企业的创新。用户参与创新的间接动力来

自于用户以外的各个方面,企业对于技术、流程、产品质量等的把控,还有市场环境和政策的刺激作用都是促使用户参与创新的重要因素。只有当直接动力与间接动力一起发挥作用时,才会促使用户参与创新的真正实现。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用户、企业和市场环境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也会因为这些变化而改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大部分学者是针对当前的形势进行的,而鲜有学者对未来用户、企业和市场环境的形势变化进行预测。因此,对于用户参与创新动力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入。国内学者可以结合我国国情解读国家新政策,预测企业未来创新的新方向,探究其用户参与创新的新动力。

三、用户参与创新的路径

国内外学者共同认为用户参与创新的路径很多,不同的路径适合不同的行业领域。有学者认为,用户创新的方式虽多样,但行之有效、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用户接受的方式是企业与领先用户的合作创新^[21];也有学者认为,用户创新工具箱的使用更有效率,不仅降低了设计成本、缩短了产品研发周期,而且更好地满足了用户需求^[22]。在理论界,大多数学者更关注制造行业的用户参与创新,而对服务行业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因此,不仅需要对企业与领先用户合作创新和用户创新工具箱的使用进行梳理总结,也需要对服务行业特殊的用户参与创新的途径进行探讨。

1. 企业与领先用户合作创新

E. V. Hippel^[23]是提出领先用户概念的第一人,他认为领先用户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先于其他用户发现市场潮流趋势,二是可以从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中获益。如果领先用户的超前需求不能被满足,那么他们就会主动参与到企业的创新过程中^[24]。由于普通用户几乎没有

兴趣和精力参与到产品创新中,而且大批用户的参与会加重企业的负担,因此,企业需要对高价值的用户(领先用户)进行吸纳,而识别领先用户是做好用户创新工作的首要工作。

(1) 识别领先用户。多数学者认为,应根据用户特征来识别领先用户。例如,郑彤彤^[7]和吴伟^[16]提出,企业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领先用户识别体系。关于识别领先用户的具体方法,杨少华^[25]按照时间先后顺序阐述了领先用户识别方法的发展历程:在早期,领先用户识别先后有群体筛选法和金字塔法;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学者们开始采用一些网络研究的方法,主要有网络志和众包这两种方法;近年来,以 S. Pajo 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尝试将一些机器学习分类算法用于在线社区中领先用户的识别,2016年 S. Pajo 等人又提出了基于用户动态特征提取的在线创新社区领先用户识别方法。

(2) 与领先用户进行合作开发。郑彤彤^[7]和吴伟^[16]指出,与领先用户进行合作开发一般分为需求采集、方案设计、原型开发、测试改进四个阶段。首先,识别出领先用户之后,企业的创新项目小组成员获取领先用户提供的信息,然后根据需求信息并结合市场环境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对领先用户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进行评估。由于制造商更擅长具体的产品开发和制造,因此产品原型开发主要是由制造商来完成的,制造商只需在领先用户提供的现有方案基础上进行改进,使其可以投入生产即可,当然,领先用户也可以参与具体的设计工作。当进行产品测试时,由于企业与用户的关注点不同,双方可以进行合作测试,以更全面地发现问题和提出更合理的改进方案。

2. 用户创新工具箱的使用

制造商探寻并获得用户需求然后生产满足用户需求产品的方法,不仅过程麻烦、效率低

下、成本高昂,而且用户需求变化越来越快,企业捕捉用户需求愈发困难,因此许多制造商现在已经转变了发展策略,不再努力理解用户对于产品事无巨细的需求,而是向用户提供用户创新工具箱,用户利用工具箱设计出初始方案,构建出产品原型,并根据具体情况对产品原型进行试错、改进,直到满意为止^[26]。

(1)有效使用用户创新工具箱的条件。徐哲等^[27]基于 V. Hippel 教授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以下创新工具箱有效使用的五个必备条件:其一,简单易学、界面友好。这样,用户就可以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语言来运用工具箱,而不必再进行新的技术和语言的培训。其二,提供标准化的模块和部件。这样,用户就不必浪费时间和精力进行重复设计。其三,可以进行反复试错,实现干中学。工具箱应能实现产品功能模拟。第四,提供足够的空间,让用户有能力做出自己想要的设计。用户自己设计的产品必须在企业的生产能力范围内,因此工具箱必须包含制造商的生产能力信息,这样双方才能进行合作。其五,能实现用户设计语言的直接转换并投入生产。

(2)企业使用用户创新工具箱的案例分析。国内学者主要以海尔集团为研究对象。高凯^[28]和武光等^[29]在研究中都关注到了海尔集团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特点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改革,海尔利用全球网络在全球五大研发中心搭建了一个全球资源整合平台,这些资源来源于全球 10 万个专家学者、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这些顶尖资源会在这个平台上与企业进行交流研讨。吴伟^[16]指出,海尔在国内最早进入了智慧家庭领域,认为应该使用户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与需求自主设计。在海尔推出的“我的冰箱我设计”定制营销模式中,用户可以在海尔电子商务平台上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和需要的部件来定制自己的冰箱。许庆瑞^[30]表示,

这一举措,不仅为海尔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更使海尔服务于用户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了海尔的品牌形象。2016 年,有微博粉丝向海尔官微提出了能否出一款冰箱贴叫“冷宫”的需求,海尔新媒体认为,用户这样的需求非常珍贵,而且要保护这种主动性。具备一定技术的用户根据微博留言,总结梳理出将近 5000 条有价值的构想和建议,联合数据机构分析整个用户群体的大数据,根据用户年龄、层次与购买力等,1 天之内就设计出了这款冰箱的工业设计图,并公布在网上,7 天之内,根据收集到的网友反馈意见继续改良,再运用 3D 打印技术,这台冰箱就定制完成。现在海尔有一款优家 APP,用户在这个 APP 里可以自主地下单,海尔有 9 家全自动化无人工厂,工厂里的每个机器人头上的传感器会通过这个 APP 将产品的定制进程实时反馈给用户。吴敏一^[31]指出,海尔优家 APP 的诞生和发展,折射出了海尔对用户需求的高度关注。

3. 服务行业特殊的用户参与创新

服务业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服务类行业,用户往往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创新^[32]。关于用户参与服务创新的界定,结合 I. Alam^[33]、P. R. Magnusson^[34]和 A. Marianne^[35]的研究,周冬梅等^[36]认为,企业采用恰当的参与形式,在恰当的创新阶段引入恰当程度的用户参与到服务创新过程中,即为用户参与服务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对用户进行引导和培训,以使用户发挥最大的积极性。服务行业用户参与创新的特殊之处在于:服务型企业特点鲜明,用户群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针对某些特定用户群体的特定需求进行创新是服务行业用户参与创新的关键。结合相关文献,以餐饮业和培训业为例进行简单的案例介绍。

众多用户在满足温饱之后追求高品质服

务,餐饮业的佼佼者海底捞的火爆与其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密不可分。站在创新的角度,服务人员与用户的密切接触为用户参与创新提供了便利渠道,用户的建议和反馈是企业进行服务创新的思想源泉。

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服务品质的较量,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培训是服务品质的升华,基于学生不同的特征与学习需求,培训机构针对每个学生制定的个性化培训方案都是唯一的、独特的,在制定培训方案的过程中,学生及其家长提出的需求即是在参与培训机构的创新,在培训过程中,若培训方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学生及其家长应不断地向培训机构反馈,培训机构则对此进行修正,直到满意为止。

综上所述,对于用户参与创新的路径的研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制造型企业,大部分选择与领先用户进行合作创新。但领先用户毕竟占少数,因此让普通用户也参与到企业的创新过程之中是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突破。用户创新工具箱的使用在国外已相当成熟,国内除了几个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已在使用外,其他企业也应该加快培训普通用户开发利用该工具箱的步伐。由于服务型企业用户参与创新的特殊性,很多企业忽略了用户参与创新,或对此不够重视,或对群体分类不明确,导致做了许多无用功,而理论界对于用户分类的讨论也较少,以用户为视角进行细致、精确的分类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四、结语

本文基于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市场大环境,通过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用户参与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按照因果逻辑首先梳理了用户参与创新的内涵与动力,然后结合实例介绍了用户参与创新的路径。通过对以上内容的梳理发现,在互联网时代,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用户在企业创

新过程中都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企业对用户参与创新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企业在认识到用户参与创新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要结合自身条件与所处的环境,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探索并开辟适合用户参与本企业创新的路径。

社会在不断进步,时代在不断发展,用户、企业、市场环境也或快或慢地在发生变化,因此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与路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目前理论界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还有一定的时滞性和局限性。另外,大部分学者是从企业的视角,通过分析已经成功运用用户参与创新的企业,总结其成功的方法,关注用户参与创新的路径。用户参与创新的动力是用户参与创新的关键与突破口,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千差万别,我国学者应结合我国的国情,高度重视用户参与创新的研究成果及其应用,借助互联网,充分利用群众智慧,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丽平,褚文倩. 领先优势状态、价值共创与用户创新绩效:心理授权的调节作用[J]. 中国科技论坛,2018(3):19.
- [2] 谢康,肖静华,王茜. 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8.
- [3] HIPPEL E V. The dominant role of users in the scientific instrument innovation process[J]. Research Policy,1976(3):212.
- [4] HIPPEL E V.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user in semiconductor and electronic subassembly process innovation [J].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EEE Transactions on,1976(2):60.
- [5] 吴贵生,谢韡. 用户创新概念及其运行机制[J]. 科研管理,1996(5):14.
- [6] 吴伟. 产品创新中用户参与的动力机制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6):79.

- [7] 郑彤彤. 用户创新的机理及模式研究[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 [8] 陈晓萍. 价值共创视角下用户参与企业创新的机理研究[D]. 合肥: 安徽工业大学, 2017.
- [9] HUFFMAN C, KAHN B E. Variety for sale: mass customization or mass confusion? [J]. *Journal of Retailing*, 1998(4): 491.
- [10] 王海平. 用户激励、用户参与产品创新及其绩效研究[D]. 北京: 北方工业大学, 2015.
- [11] 张辉, 汪涛, 刘洪深. 新产品开发中的顾客参与研究综述[J]. *中国科技论坛*, 2010(11): 105.
- [12] 李霞, 郭要梅, 宋维维. 用户参与产品开发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 77.
- [13] 李霞, 宋维维, 郭要梅, 等. 领先用户参与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11(4): 651.
- [14] 何国正. 基于领先用户的顾客参与新产品研发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 [15] 樊银芳. 用户创新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2.
- [16] 吴伟. 企业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用户参与研究[D]. 沈阳: 东北大学, 2009.
- [17] 刘丽辉. 体验经济时代的市场需求及营销新动向[J]. *经济师*, 2003(11): 187.
- [18] 李随成, 姜银浩. 用户参与产品创新的动因与方式[J]. *管理现代化*, 2008(1): 4.
- [19] 孙黎, 杨晓明. 迭代创新: 网络时代的创新捷径[J]. *清华管理评论*, 2014(6): 30.
- [20] 王静. 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研究述评——问题由来、激励因素、作用结果[J]. *现代管理科学*, 2018(2): 115.
- [21] 姜忠辉, 崔珍珍. 用户创新研究评述与展望[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5): 91.
- [22] 姚山季, 来尧静, 唐娟. 用户创新工具箱的研究现状与展望[J]. *科技管理研究*, 2009(2): 88.
- [23] HIPPEL E V. Lead users: a source of novel product concepts[J]. *Management Science*, 1986(7): 791.
- [24] 郑鑫. 领先用户参与、机会信念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研究[D].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17.
- [25] 杨少华. 在线创新社区领先用户识别研究[D]. 西安: 西安理工大学, 2017.
- [26] HIPPEL E V, KATZ R. Shifting innovation to users via toolkit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2(7): 821.
- [27] 徐哲, 范婷婷. 基于工具箱的用户创新模式[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20.
- [28] 高凯. 海尔电器定制化商业模式困局与路径[J]. *企业管理*, 2017(3): 107.
- [29] 武光, 田志亮, 张有明. 基于用户价值的商业模式创新[J]. *广义虚拟经济研究*, 2014(3): 74.
- [30] 许庆瑞. 全面创新管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31] 吴敏一. 海尔优家 APP 五大功能全新升级[J]. *计算机与网络*, 2016(10): 33.
- [32] 范秀成, 王静. 顾客参与服务创新的激励问题——理论、实践启示及案例分析[J]. *中国流通经济*, 2014(10): 79.
- [33] ALAM I. Removing the fuzziness from the fuzzy front-end of service innovations through customer interactions [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2006(4): 468.
- [34] MAGNUSSON P R, MATTHING J, KRISTENSSON P. Managing user involvement in service innovation: Experiments with innovating end users [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03(2): 111.
- [35] MARIANNE A, LAURENCE B C. How to take customers into consideration in service innovation projects [J].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2004(1): 56.
- [36] 周冬梅, 鲁若愚. 服务创新中顾客参与的研究探讨: 基本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整合[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3): 26.



引用格式:彭青秀,丁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研究综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4):88-93.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8)04-0088-06

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研究综述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function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彭青秀, 丁力

PENG Qingxiu, DING Li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其功能的发挥将直接影响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一是目前学界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研究过程大致经历了内涵探索、单一经济服务功能和功能拓展三个阶段;二是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功能发挥方面还存在着提供服务的项目数量较少,提供服务的成本低、层次低,以及服务功能不健全等问题;三是学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评价正在从单一的服务功能评价向综合功能评价发展。未来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研究应从单一的服务功能向其他功能拓展,增加实证研究的数量,运用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并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大环境中考量。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服务功能;
综合功能

收稿日期:2018-06-24

基金项目:河南省研究生教育优质课程项目;郑州轻工业学院研究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017040);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JJ07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8-ZZJH-616);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182400410151)

作者简介:彭青秀(1975—),女,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经济。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合作社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中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一种发展期待变为乡村社会新的治理场域”^[1]。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出台14个中央1号文件,都对扶持发展农民合作社作出了明确要求。尤其是,2007年7月1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和农村的中坚力量,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十几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方兴未艾,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7年7月,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93.3万家,是2007年底的74倍,年均增长60%;实有人社农户超过1亿,约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6.8%^[2]。

由此可见,农民合作社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但是,一个组织即使其功能体系很完备,在实践中其功能也不一定能充分发挥。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社制度化、名实分离、组织变异等功能失常现象的客观存在,使得合作社功能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纵观近十年农民合作社功能的研究文献,在研究数量上,从2008年的3篇增长到目前的每年30余篇(截至2018年的3月份);在研究主题上,近几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社功能的内涵、功能的演进路径、功能的影响因素、功能的评价等。其中,对于合作社功能的内涵,大多研究者只限于探讨合作社功能的内容,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相关研究将合作社的功能内涵、功能评价和影响因素归结为合作社服务功能,而对于合作社其他功能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对2008—2018年国内外有关合作社功能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阶段探索合作社综合功能的演进路径,尝试澄清合作社功能的内涵,对合作社的功能发挥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研究现

状进行系统评价,以期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内涵

关于合作社的功能内涵,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功能内涵探索阶段。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合作社是指“那些分享其服务利益的人所拥有和经营的组织”。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合作社可以用内部交易替代一定的外部交易,减少交易的数量和频次,实现规模经济^[3],农户生产合作是零散农户进入大市场的有效方法^[4]。合作社不仅能降低成员的生产经营风险^[5-6],而且能节约成员的交易成本^[7],提高成员的市场地位^[8]和经济效益^[9-10]。黄祖辉等^[11]认为,合作社以服务成员为宗旨,但合作社的服务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社员,其对周边农户也会产生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单一经济服务功能为主阶段。正是为了满足成员的需求,合作社才应运而生。凡是满足使用者需求的任何一种属性都属于功能的范畴,合作社实现其价值的主要途径就是为成员提供服务^[12],通过合作社的经济活动,为成员提供行之有效的综合服务^[13],在服务成员方面的成绩体现了合作社的价值^[14]。高钰玲^[15]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是指合作社为满足农户农业生产经营需求所发挥的一种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通过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经营的相关服务而实现的。其中,经济服务功能是关键,是牵动所有功能的核心功能^[16],为成员提供服务是合作社的宗旨,而且是唯一宗旨^[16],是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之一^[17]。

三是功能拓展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功能不断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丰富,逐渐突破了单一经济范畴,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8]。胡健^[19]认

为,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提供信息、连接市场、抵御风险、加强沟通、增加收入、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等。刘登高^[20]认为,技术承接、规模集中、智慧共享、作业同步、信誉培育、能力互补和产业开发,是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应该发挥的功能。唐宗焜^[21]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兼有企业部门功能和社会部门功能。王拓等^[22]从农户需求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生产、销售、加工、金融四个方面的功能。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合作社的其他功能,如品牌建设功能^[23]、流通服务功能^[24]、社会功能^[25]等。

综上所述,合作社的功能内涵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的逐步演进过程。合作社的功能是通过服务社员而发挥的,服务社员、满足社员共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的需要与抱负,是合作社的根本宗旨,也是其唯一宗旨,同时还是合作社所有功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发挥存在的一些问题

由于产品特性、合作成员、生产集群、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26],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发挥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提供服务的项目数量较少,很多合作社仅提供一项或少数几项服务;二是提供服务的成本低、层次低,如购买生产资料、提供销售信息、技术培训等,而农户急需的一些服务功能不仅相当薄弱且差异很大^{[9][26]},如农产品深度加工、综合营销、过季储藏、资金融通等,还有很多合作社系由政策推动而建立,服务功能更不健全。孙亚范^[27]考察了位于农村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后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匹配,其功能十分有限,半数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仅能提供一两类服务,更有为获取各种政策收益的“空壳合作社”和“翻牌合作

社”等不具备经营实体的合作社轮番登场,农户“被社员”的现象屡见不鲜。

为了探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较弱的原因,很多专家和学者依据农民对合作社服务需要的迫切程度,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进行了排序,依次为销售服务、加工服务、金融服务和生产服务^[22]。究其原因,目前我国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依然严重,制约农户与市场接轨的重要因素仍然是销售难,销售服务是农户最为迫切的需要,因此排在第一位。黄季焜等^[9]通过对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供给因素的研究后发现,组织化潜在收益、合作社创建方式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发挥的主要因素。除此之外,市场条件、企业家因素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发挥有一定影响。总体来看,在内外部条件的制约下,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发挥普遍比较薄弱,与之密切相关的原因不仅有合作社服务的特性和成本,还有合作社的资金实力。高昂的创新成本^[28]、集体行动的悖论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总之,从单一视角、标准去考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可能会以偏概全;而从多标准、多视角去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易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复杂化,难以厘清脉络。鉴于此,我们可尝试从系统论的视角去考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并对其进行评价。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评价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了评价。例如,王拓^[22]基于农户需求这一视角、运用AHP方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进行了评价,认为大部分合作社的功能设置和有效性并未与农户的理性需求有效对接,合作社不能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农户需求没有在参与合作社的

活动中得到满足。黄祖辉等^[12]基于农业产业化角度从整体上测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认为不同主营产品类型的合作社在服务功能实现程度、实现宽度与实现深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备产品加工服务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很少,其功能实现深度也很低。高建中等^[29]从实现程度、农户需求程度、农户满意程度三个维度综合评价了合作社功能的发挥水平,并对合作社的功能进行两两交叉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合作社的大部分功能实现程度较低且农户满意度不高。2014年,在Rabo合作银行的支持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力进行了评价,发现合作社社会经济指数和社会进步指数存在着紧密联系,一国农业合作社越发达,合作社的社会经济影响力也越高。

综上所述,近几年学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评价性研究逐渐增多,从单一的服务功能评价逐步走向综合功能评价,这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契合。2017年6月22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取消了合作社的同类限制,扩大了合作社的服务类型,合作业务由单一的生产经营向保险、融资、互助、信用等内容延伸,合作领域也由单纯农业生产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设置不足,尚未满足农户需求,实现程度整体较弱,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合作社功能势必不断拓展、越来越综合化。目前,“三农”工作面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大环境,新时代赋予了合作社更多的功能,亟待深入研究。

四、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发挥的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发挥的好坏一方面受合作社功能供给的影响,一方面受合作社功能

需求的影响。高钰玲^[15]沿着需求—供给—实现的逻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进行了统计分析,考察了影响合作社服务需求的因素、影响合作社服务供给的因素、影响合作社服务功能实现程度的因素,并分别进行了计量分析。黄祖辉等^[30]认为,在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发展和服务供给的诸因素中,产品特性是重要因素。何安华等^[31]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户服务供需对接不恰,整体上处于结构性失衡状态,通过分析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异质性和资金短缺是其两大主要原因。邵科^[32]论证了成员的积极参与对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运行的重要性;而公司绩效、公司管理、对管理者的信任、分配制度和初始资本是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重要因素^[33]。毛飞等^[34]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合作社服务功能增强、资产实力增长、社员组织事务参与度提升对融资服务供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不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大都集中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他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

五、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目前学界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学界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内容的研究多集中于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而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其他功能研究不足。有些研究仅限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或其他功能进行描述性介绍,有些研究仅聚焦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特定领域的特定功能,缺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系统分析。此

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分类也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致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内容的界定处于混乱状态,难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2)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评价来看,一是实证研究较少;二是就功能谈功能,对合作社功能或经济数据本身关注较多,而对合作社功能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研究较少,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培养农民的人文关怀的研究更少;三是重经济功能、服务功能,轻其他功能,对合作社的拓展功能鲜有研究;四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评价重视负责人评价,轻视社员评价,大部分评价数据主要来源于农业主管部门评定或合作社负责人自查自评,来自普通社员的评价较少;五是除服务功能外的其他功能,评价指标不全,大部分相关指标权重过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综合水平难以反映。

(3)从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一般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单独的组织主体进行分析,缺乏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竞合关系的研究。

结合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实际,在今后的合作社功能研究中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首先,应立足于综合功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和划分。作为特殊的产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功能载体,它不仅是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服务性自助经济组织,也是现阶段发展我国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对其功能进行研究是解决农业层面经济社会问题的主要抓手。

其次,应注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尤其是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质量兴农和绿色兴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我国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必由之路,是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的重点工作。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因此,应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从过去数量型、速度型的发展方式真正转变为质量型、效益型的发展方式,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发挥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还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农业观光休闲等服务需求,更能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绿色化需求。

最后,应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进行系统分析,进一步探讨合作社功能的实现问题。应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置于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大环境中,结合农业产业链或三产融合或其他产业组织体系,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模式,拓宽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的实现途径。

参考文献:

- [1] 马超峰,张兆安.退出与呼吁:合作社的功能转变与治理变革[J].农村经济,2018(2):116.
- [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193.3万家[N].人民日报,2017-09-24(002).
- [3] 杨明洪.从“中心化模式”向“中间化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演化分析[J].中州学刊,2008(5):27.
- [4] 胡林春.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中国农户合作行为[J].农业经济,2013(11):120.
- [5] 黄祖辉.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4.
- [6] 高帆.中国“三农”问题的突围之途[J].学术研究,2009(12):59.
- [7] 蔡荣.“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

- 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1(1):58.
- [8] 唐宗焜. 合作社功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 经济研究,2007(12):11.
- [9] 黄季焜,邓衡山,徐志刚.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及其影响因素[J]. 管理世界,2010(5):75.
- [10] 吕东辉,李涛,吕新业. 对我国农民销售合作组织的实验检验:以吉林省梨树县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2010(12):93.
- [11] 黄祖辉,徐旭初.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J]. 农业经济问题,2003(5):41.
- [12] 黄祖辉,高钰玲. 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农村经济,2012(7):4.
- [13] 吴敬学,毛世平,王志丹. 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原始创新能力的思路与对策[J]. 农业经济问题,2012(8):56.
- [14] 毕美家. 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促进农民合作社健康发展[J]. 中国农民合作社,2014(1):6.
- [15] 高钰玲. 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理论与实证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14.
- [16] 苑鹏. 试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条件[J]. 农村经营管理,2006(8):16.
- [17] 黄祖辉,邵科. 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预印本,2009(1):10.
- [18] 唐华仓. 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中的经验与问题——第四届农业政策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河南会议)综述[J]. 农业经济问题,2008(1):103.
- [19] 胡健. 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考[J]. 农村经济,2005(8):123.
- [20] 刘登高. 一项新的农业企业组织制度的诞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J]. 农村经营管理,2006(12):16.
- [21] 唐宗焜. 合作社功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 经济研究,2007(12):11.
- [22] 王拓,高建中. 基于农户需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建设研究[J]. 农村经济,2009(11):123.
- [23] 孔祥智. 大力发展服务于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J]. 中国农民合作社,2009(1):54.
- [24] 田野. 农民专业合作社流通服务功能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4.
- [25] 杨永康,贾婷婷. 农民合作社社会功能的多角度探析[J]. 江苏农村经济,2016(5):39.
- [26] 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J]. 中国农村经济,2002(3):13.
- [27] 孙亚范.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利益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8(9):48.
- [28] 孙亚范.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新的成本约束及化解[J]. 经济问题探索,2004(2):29.
- [29] 高建中,袁航,李延荣. 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发展程度及影响因素[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28.
- [30] 黄祖辉,邵科. 基于产品特性视角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结构与运营绩效分析[J]. 学术交流,2010(7):91.
- [31] 何安华,孔祥智.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成员服务供需对接的结构性失衡问题研究[J]. 农村经济,2011(8):6.
- [32] 邵科,黄祖辉.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参与行为、效果及作用机理[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45.
- [33] 黎黎,刘开华. 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为例[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2):46.
- [34] 毛飞,王旭,孔祥智. 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服务供给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软科学,2014(7):26.



引用格式:任东改.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4): 94-99, 1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14; J0-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3969/j. issn. 1009-3729. 2018. 04. 013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4-0094-06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emotional design of urban public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任东改

REN Donggai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艺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1200

摘要: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城市空间整体环境不可缺少的要素,更是城市的“心灵之窗”,彰显着城市独特的文化特质。当下不少的设计者都在通过情感设计来延伸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精神功能,希望其使用者的情绪借此得到调整,变得积极而快乐、向上而奋进,生发参与体验、嬉戏、感恩的意愿等,获得人性关怀。通过对国外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优秀设计案例在情感层面出彩设计的考察,发现实现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的实现路径为:以造型的趣味性使受众获得愉悦情感,以可参与的场景组合实现人与设施的情感互动,以围合形式营造出安全感,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体验式情感。设计师在设计公共环境设施时,应将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虑,以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物质和精神需要,促进人、设施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公共环境设施;
情感设计;
人文关怀;
参与;
围合

收稿日期:2018-06-14

基金项目:2018年度郑州市社会科学重点调研课题

作者简介:任东改(1981—),女,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成功财经学院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城市空间环境整体化不可缺少的要素^[1],更是城市的“心灵之窗”^[2],彰显着城市独特的文化精神特质。例如,深圳市政府门前的“拓荒牛”雕塑,以拓荒牛的形象寓意深圳特区第一代建设者们的拼搏进取精神;青岛五四广场“五月的风”雕塑,以螺旋上升的风的造型和火红的色彩,体现“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基调和奋进的民族力量。不过,目前国内许多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太过庸俗化,尤其是对情感功能的考虑不够充分,不能很好地彰显城市的文化特质和人文关怀。有的公共设施在造型上缺少趣味性和创意,不够生动和活泼;有的缺少具有故事性的场景组合,不能较好地反映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不能调动使用者的参与性;有的围合形式呆板单一,不能满足不同精神状态下使用者的个性化情绪需要;有的不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反映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与大众的信息化智能需求,等等。总之,目前我国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略显单薄、不够丰满,设计水平亟待提高。

反观国外,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人为本主义思想兴起,设计者就开始考虑使用者的需要,将人的需求作为一切设计的依据。美国设计师普罗斯曾说:“人们总以为设计有三维:美学、技术和经济,然而更重要的是第四维:人性。”^[3]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展现城市人性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城市文明有着不可忽略的价值。但目前学界从人性出发对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公共环境设施的功能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以国外优秀的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为案例,对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中的情感类别进行分析,阐释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在满足公众情感需求中的重要作用,以期成为当下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

提供参考。

一、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功能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主要是指在城市户外空间中满足人们进行户外活动需要的器物,其功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功能,即为市民提供具体的使用需求;二是精神功能,即为市民各类情感的释放提供真实的依托对象。

1.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物质功能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作为体现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表征,是营造自由平等、充满人文关怀等美好氛围的重要元素^[1]。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中的休息设施、交通设施、信息设施等最基础的功能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休息、出行、信息等需要,如公共座椅和公交车站等。也有不少的公共设施虽没有具体明确的使用功能,但也起着装饰、美化环境与宣传当地文化特色的积极作用,如雕塑、景观等。

2.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精神功能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作为城市的一部分,随着人们的审美观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日常活动的需要等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城市环境建设的众多要素中,公共设施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设计者不得不考虑公共设施设计与不同情感的产生及其接受程度之间的联系^[4]。

在现代城市高强度、高节奏的工作环境下,在沉重的工作、生活负担和压力下,人们对公共设施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公共设施在城市公共空间环境中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使用者情感的需要就显得至关重要。当下不少的设计者都在通过注入情感设计来延伸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使用外延,希望自己所设计的作品能让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情绪得到调整,变得积极而快乐、向上而奋进,萌发参与体验、嬉戏、感恩的意愿等,从而获得人文关怀。

情感作为最能打动人心、激发人的各种潜在思想的精神要素,在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中至关重要。公共环境设施的情感设计对于缓解公众的生活压力和精神烦恼、感受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美妙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如何在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中将情感进行有效表达,是值得每一个设计者关注的问题。

二、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的实现路径

按照具体的使用属性,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可分为休息设施、照明设施、交通设施、卫生设施、无障碍设施等,不同类别的设施可在不同时段为不同人群提供具体可视的服务。人作为有情感感知的使用者在接受不同形式的环境设施服务时,自然而然又会衍生出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情感体验。

1. 以造型的趣味性使公众获得愉悦情感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城市大环境中必不可少的景观构筑,它以一定的形制、颜色、质感和比例影响人们的心理^[5],其造型设计更是设计师长久以来不断探索的方向,出色的造型是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中展现创意和艺术性的关键手段。国外不少的设计师就是通过拟人化手段创造出有趣的造型来进行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并以此来使公众获得愉悦情感的。公共环境设施使用者的心情和状态是不一样的,

难免有遭遇了工作的烦闷和生活不快的,而具备趣味愉悦情感的公共环境设施可以排解人的不快和烦闷,获得愉悦的情感。

坐下休息是人们在户外活动时的一项基本需求,而公共环境设施是否舒适安全不仅影响人的休息质量,也关系到人在身体得到休息的同时其情感能否得到满足。简洁的坐凳可以休息,造型逗趣的座椅也能休息,然两者在休息的质量上有所不同。例如,英国街头臀部裸露的公共休息座椅(见图1),其整体外观以人半蹲下时裸露的下半身形象为基本造型,运用腿部作为座椅的支撑,将裸露的臀部处理之后的平面充当座位的椅面,这一别致的造型被公然摆放于室外空间,异常醒目也特别逗趣,让人忍俊不禁。再如,美国HIP-HOP公交站休息设施(见图2),将公交站座椅与站台灯箱平面图形结合,使三维空间座椅与二维平面人夸张的脑袋外形以合适的高度搭配,水平的座具与垂直的背景相呼应,人坐下后头部正好与背景夸张的发型融为一体。这样一处休息设施,可使奔波于城市、忙碌于工作的乘车者,坐下休息时既解除了身体的疲乏也舒缓了烦乱的情绪,使其等车过程变得轻松和欢乐。由此可见,附有情感设计功能的公共环境设施,在为大众提供休息设施的同时,也可为人们增添快乐的情感,这种愉悦的情感远比个体获得单纯的身体休息更受大众欢迎与喜爱。



图1 英国街头臀部裸露的休息设施



图2 美国HIP-HOP公交站休息设施

2. 以可参与的场景组合实现人与设施的情感互动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是处理城市中人与环境依存关系的手段,是设计师与使用者情感体验的一种交互方式^[4]。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应注重与人之间的互动,使人能够在城市生活中获得欣赏、亲近、体验公共设施的机会^[5]。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在城市环境中有的是以单体形式进行摆放,有的则是以多个组成场景的方式进行布置。场景结合式的公共环境设施可以较好地满足不同人群在户外活动时产生的参与多样情感互动的诉求。比如,澳大利亚 Rundle 商场的猪群雕塑(见图 3),位于阿得雷德商业街区,四只形态各异的猪,可谓形象逼真。在商场逛累了可以坐在其背上歇息腿脚,而小朋友则可以摸摸猪的嘴巴、拍拍猪的肥肉,并摆出各种造型与之合影嬉戏一番。再如,瑞典马尔默步行街入口处的五人乐队组合雕塑(见图 4),该景观设施以形态夸张的五位乐手列队组合成为场景雕塑。该雕塑固定在马尔默市步行街的入口处,不仅丰富了街道的视觉内容,也舒缓了人们在此购物行走时的疲倦。人们的购物过程因这一可参与场景雕塑的存在而不那么单调乏味,步行于此的人们大多对乐队的表演活动产生浓厚的兴趣,有欲作为队友列与其后模仿表演的,也有饶有兴致地观察五位乐手不同演奏



图 3 澳大利亚 Rundle 商场的猪群雕塑

姿态的,人们在此可以收获无限的乐趣,逛街的疲惫也由此一扫而光。

3. 以围合形式营造出安全感

赋予设计物以人性化的品格,可以使其具有情感、个性、情趣和生命。同样,布局合理、设计周到的公共设施能使人们感受到来自城市无微不至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服务^[3]。安全感是人们在任何环境下都需要的。在户外公共环境中,我们有时需要独处,有时需要安静思考,有时需要倾诉密语。营造具有安全感的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往往以围合的形式来完成,这种围合可能是多角度围合,也可能是相对开放的单个方向连续围合。比如,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K. Sheila 开发的太阳能曲线形围合休息设施(见图 5)与位于比利时卢森堡市广场的折线形围合休息设施(见图 6)。这两组设施的设计者分别通过不同的材质围合了一个能坐能躺的休息设施。前者运用优美的曲线造型进行围合,主要为单个对象提供休息服务,其两侧出入口较大,单个对象需要和周围人群交流时会更方便;后者则通过连贯的折线在墙体中间围合成了一个可供单人休息也可供两三个好友密语的休息空间,其围合的材质和区域相比于前者显得封闭性较强、安全度更高。这两组设施的上下前后界面都为封闭的介质,只有左右两侧留有进出的洞口,高度的围合性无疑在开放的空



图 4 瑞典马尔默市步行街

五人乐队组合雕塑



图5 美国的曲线形围合休息设施



图6 比利时卢森堡市广场的折线形围合休息设施

间中营造了一片安全的静谧之地,很好地满足了使用者对不同程度安全情感的需要。这种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作为前提所作的公共环境设施设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于人^[6]。

4.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实现体验式情感

我国城市化率从 2005 年的 42.99% 提高到 2011 年的 51.2%, 年均增长 2.96%, 预计到 2020 年, 将有 5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2050 年则有 75%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3]。信息技术在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中的普及和应用程度, 是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标尺, 可以使市民更多地体验城市的智能和便捷。交互设计理念介入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目的是满足公众的使用需求并建立信息的传导, 满足市民使用的便利性需求^[7], 而信息化设施为公众提供的就是信息提示和广

而告之的信息共享。例如, 位于荷兰鹿特丹公共车站的智能化自动称重设施(见图7), 运用信息感应技术在公交车站添加可自动称重的设施, 只要有乘客触及它, 便会在侧面站台面板上显示出该乘客的体重, 在此休息候车的乘客不仅可打发闲暇时间, 还可获取自身的体重和健康状况信息。这样巧妙运用信息化技术的城市公共环境设施, 可使使用者收获相关体验愉悦情感。同样, 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麻省理工学院的 Senseable 城市实验室也做了一个以智能化技术为支撑的概念性公交车站设计方案(见图8)。该概念设计利用了太阳能、e-INK 触摸屏和互联网技术, 不仅可以显示出公交线路和到达时刻, 还可以查询自己所在的位置、寻找最短的巴士路线、检测空气质量、浏览网页、发布



图7 荷兰自动称重公交站



图8 EyeStop 概念设计公交站

广告和社区通知^[8]。这些功能可为候车者候车时提供便捷的信息获取服务,使市民获得更多的体验满足,也增加了公共设施的使用频率^[9]。

5. 以使用性广告设施引申出感恩情感

西方现代化大都市中公共环境设施的设计充分展示了新工艺、新材料的艺术美和新鲜感,高度重视人的切实感受,许多优秀的设计以其独特的设计形式、超前的创意和完善的功能让使用者获得精神愉悦和情感满足^[3]。在西方一些国家,有些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是由大型企业出资筹建安置的。当企业参与城市公共环境设施的筹建时,通常会融入自身的企业文化,通过相应的手段在公共环境设施中植入一定的广告内容,借此进行企业文化的宣传。比如,美国IBM公司在街头投放的休息与遮雨的公共环境设施(见图9、图10)。IBM公司借助城市街区的墙面,将平面转换为立体带有功能性的长椅、遮雨棚,在为企业打广告的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贴心的公共环境设施。这些公共环境设施构思巧妙,充满创意,通过不同的色彩既点缀了城市,又为公众提供了休息、挡雨等服务。市民在疲惫和忘带雨具时,恰遇此休息和遮雨设施可消除疲劳和避免遭受淋雨的窘境,会很轻松地接受IBM想表达的中心主旨,在情感上萌发感动与感恩,赞赏商家的善举和用心,也易激发人

们的回馈性消费情感。可见,融入情感因素的细腻设计,能牵引出使用者的多纬度情感。因此优秀的公共环境设施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既能完善城市的服务功能,同时又能表征城市的精神与灵魂^[11]。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多个国外城市公共环境设施优秀案例在情感层面出色表现的分析,发现其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在情感层面上的表达丰富和贴心,可以为致力于改造现代城市环境设施的我国设计者提供参考。设计师在设计公共环境设施时,应把人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来考虑,以满足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物质和精神需要;应注重公共设施的安全、实用、舒适、美观、环保等,以使用者的需求为主要依据^[3],以促进人、设施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服务的主体是人,具体的物质使用需求是明确而直接的,而情感的需求则是隐含而多变的。人类的情感是丰富的,但也是需要通过客体去诱发的,需要给予也需要释放。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的情感性是依附于实体而存在的,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诱发人类丰富的情感,最大程度地满足使用者的情感诉求,让其使用功能得以延伸、精神内涵得以展



图9 IBM街头休息设施



图10 IBM街头挡雨设施



引用格式:牛牧. 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实践研究——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4): 100-108.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8.04.01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8)04-0100-09

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实践研究

——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the watercourse landscape of rural river

—Take Lyuhua town, Chongming district, Shanghai city for example

牛牧

NIU Mu

上海市水利设计研究院 第一设计所, 上海 200061

摘要: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联系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实践,研究认为,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认知是河道景观改造提升的前提,乡村河道治理应秉承自然生态原则、文化传承原则和社会生活原则,确保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有的放矢,避免大拆大建式的景观再造;对乡村河道自然条件的梳理是河道景观提升改造的基础,对比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存储现状,可为乡村河道景观的改造提升铺垫基础,以便有针对性地修复、保留其历史文化元素,凝练其标志性符号,打造根植于历史、富有人文精神、彰显水乡个性、契合当地特色的河道景观。乡村河道水景观的改造提升应总体把控,充分考虑乡村河道特征元素和自然条件,并针对不同情况,实施个性化提升方案。

关键词:

乡村河道水景观;

亲水;

生态护岸;

植物绿化;

桥梁曝气

收稿日期: 2018-04-28

作者简介: 牛牧(1992—),男,陕西省蒲城县人,上海市水利设计研究院助理工程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景观设计。

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指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及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加之当代人的观念转变,乡村级别的河道水环境提升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朴实无华,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2],但乡村河道的景观改造提升不同于城市滨河风景带,前者更强调河道的美学功能与实用功能,而后者则更侧重于河道的景观休闲功能,因此针对乡村级别河道的景观改造提升应有专门的策略。目前,乡村级别河道的改造提升,由于受限于河道规模,因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改造,大多还停留在纯粹的水利工程的范畴内,只注重水利特性而忽视河道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改造提升后的河道只能满足防洪、排涝、灌溉等水利功能,难以满足河道周边民众的日常亲水休闲需求,河道与人的良性互动关系无法得到体现,生态宜居的目标很难达成。鉴于此,本文拟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通过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自然条件的分析与梳理,探索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基本路径,以供业界参考。

一、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前提

我国乡村河道多属于中小河流的支流与末端河道,主要由天然河道和人工河道两种形式组成。乡村河道普遍存在以下特点: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但长期以来只重水利而忽视环境景观;周边污水直排河道,导致部分河道存在淤塞、河水污染等问题;沿河地带多为人口稠密区域,

人地关系紧张;河道的陆域控制线范围内存在被占用的情况,阻塞水体,影响护岸安全。由于乡村河道在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迫在眉睫。

改造提升乡村河道,首先要了解乡村河道的特征元素。笔者认为,乡村河道特征元素包括人文和物质两个层面,是一片水域(乡村河道)区别于另一片水域(乡村河道)的文化符号,具有一定的文脉延续性和形象认知性,体现了一片水域(乡村河道)的整体人文生态之特征。例如,“九曲十八弯”是黄河的自然特征,“小桥、流水、人家”是江南水乡的专属,“两岸猿声啼不住”再现了长江三峡的美景。因此,认知乡村河道特征元素是景观改造提升的前提。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择水而居、依势而建是人类选择栖息地的基本规律。在前工业社会,人口的迁徙与河流密不可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法则。城镇或乡村,因滨河地带交通便利,生活成本较低,人员流动性大,以及多元文化在此聚集,易于形成以地区聚居为特色的乡村河道——人们对河道高度依存,河存人存,河枯人徙,用之以河、取之以河、食之以河、排之以河,兴也河道、衰也河道,河道成为人类文明的生命线。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特别是到了近代,物质经济刺激了人们对自然的无限度索取,忽视了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理性认知与保护,导致人们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污染和破坏。

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梳理可以从物质和人文两个层面展开。其中,物质层面包括自然生态、乡土植被、水文水利、格局形态、建筑小品(水车、廊桥、磨坊)等元素;人文层面包括历史典故、文化遗迹、艺术诗歌、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等元素。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梳理,应考虑三个原则。其一,自然生态原则,即兼顾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坚持保

护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设计理念,充分考虑区域和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其二,文化传承原则,即乡村河道景观的改造提升,不是割断文脉的景观再造,亦不是虚无缥缈的景观再生,应充分考虑流域内的历史文脉,在规划、内容、方法途径上做到系统和完整,防止出现文脉断层或支离破碎。其三,社会生活原则,即改造后的乡村河道景观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人们生产生活、交流憩息的场所,有度、有节、科学、合理的适用型特征元素予以保留,过度、无序、有悖科学、不尽合理的滥用型特征元素予以剔除。有取舍、有保留、有所为、有所不为,应成为乡村河道特征元素梳理的基本理念。

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梳理可采用元素罗列法、查阅文献法、走访调研法等方式进行。所谓元素罗列法,是指在对乡村河道特征元素认知的基础上,将其按照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标准分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分门别类地解析内涵,因势利导,推陈出新。由于部分特征元素可能因为人为原因而破坏(物质层面元素),或因历史久远而失传(非物质层面元素),查阅历史文献或者地方志成为必然的选择,也是必需的选项。查阅文献,可理清特征元素间的逻辑关系,丰富特征元素内容,完善特征元素,弥补缺项漏项。走访调研法可以弥补元素罗列法与查阅文献法的不足,进一步弄清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来龙去脉,把握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精髓。以上

三种方式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河道治理与改造提升奠定了基础。

以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为例,该镇河道交错、阡陌纵横、鱼塘湿地散布、建筑紧邻水边(见图1),有着良好的先天景观发展条件。但由于沿线周边人地关系紧张,河岸绿地或多或少都存在被占用的情况,沿线污染物排放来源复杂,部分老旧的水利设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成为阻塞河道、聚集污染的集中点,部分护岸设计与当今生态建设的规律相违背,还有部分护岸因管理维护不善存在坍塌崩坏的情况。简而言之,该镇乡村河道水景观提升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首先,人地关系紧张,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处理好河道整治与景观提升的关系,是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次,污染排放复杂,外围生产、生活环境交错,让人们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任务十分繁重;第三,原有水利设施陈旧破损、河道阻塞,甚至部分护岸设施与乡村振兴战略相悖。鉴于上述对该镇河道特征元素的梳理与认知,笔者认为,乡村水环境的改造提升需要由以往单纯的水利改造提升转变为集水利、生态、景观为一体的综合性环境改造提升,将水利改造、环境修复、文化传承和持续发展的理念融为一体。

二、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基础

乡村河道景观的改造提升,其核心要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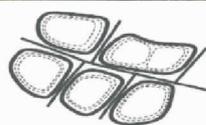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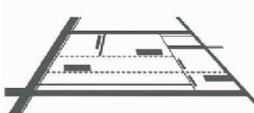


图1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乡村河道景观图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自然,在认知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前提下,通过科学有序的梳理,将特征元素归纳、分类,针对不同的特征元素,采取个性化的改造提升策略,使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既能满足人们亲水性的要求,又符合现代生态理念。可见,对乡村河道自然条件的梳理是河道景观改造提升的基础。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地处崇明岛西南端,东与三星镇相邻,北与跃进农场相接,东南部濒临崇明岛上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明珠湖,南与西紧邻长江南北支流,与江苏省常熟市、海门市隔江相望,是长江分水岭所在地。绿华镇是

崇明区最年轻的乡镇,拥有西沙湿地 5A 级景区、天然明珠湖等丰富的旅游资源,生态基础较好。同时,随着马拉松特色小镇定位的确立,绿华镇未来在城市空间布局和设计上将会不断优化提升,以满足其规划要求。河道作为镇域空间布局的主要构成要素,其风貌影响着该区域的整体形象。

在绿华镇约 41.15 km² 的区域内,河道分布呈现出“1 环 29 竖”的格局(见图 2)。镇域范围内乡村河道主要包括市管河道两条,即环岛运河穿过绿华境内 13.33 km,新建港穿过绿华镇境内 5.83 km;镇级河道 27 条,总长度 58.29 km。镇域范围内水网密布,整体生态状



图 2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水系分布图

况较好。但是部分河道岸坡缺少护砌,局部坍塌严重,河道大部分为自然土坡,缺乏必要的工程护坡措施,在长年降雨径流的冲刷和河道水位变动的淘蚀下,河岸土壤侵蚀严重,河坡出现不同程度的坍塌破坏,坍塌与水土流失的土体落入河底,造成河道内淤积,导致河床抬高,水流不畅。同时,局部河岸段紧邻村庄道路和房屋,无防护措施的河道为村民的生产、生活与安全埋下了隐患。

区域范围内 27 条镇级河道是绿华镇水网的骨干河道。镇级河道普遍水质较好,水流通畅,沿河两岸植被茂密,整体水环境状况良好。村级河道作为绿华镇水网布局的基础,共有 231 条,长 89.34km,此类水体数量众多,分布范围广,河道流经村宅、农田、鱼塘,其水质环境直接影响着沿线居民的居住环境,对居民生产生活影响大,反过来又易受污染。因此只有将其提升改造后才能促进此类河道进入良性循环的阶段。

依据乡村河道景观提升改造的基础要求,通过元素罗列、查阅文献和实地走访调研等方法,结合无人机航拍视频和规划部门提供的

GIS 地图,对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发现该镇河道特征元素显著,保存基本完好,但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河道问题。目前河道多为人工开挖,以直线形河道居多,无收放变化关系,河道表现形式单一。同时由于修路、建房等原因,存在断头河的情况,不利于水体流动(见图 3);部分天然河道,由于长期缺乏维护,河道淤积,河堤塌陷,河道内污染物堆积严重。

(2)绿化问题。沿河两岸整体绿化状况虽较好,但缺乏疏密关系,植物季相变化不够明显,植被类型单一,同时部分土地存在裸露的情况,居民集中区域河岸多被私自改造为菜地。

(3)景观设施问题。现有的景观设施有的距离居民区较远,且功能较为单一,便民的公共设施缺乏景观化设计,稍显粗糙。

(4)功能定位问题。目前河流缺乏生活功能,人水关系分离,周边居民无法有效利用河流开展相关活动,与绿华镇的生态定位不符。

(5)驳岸问题。部分河道无护岸,为杂草坡,居民段部分建筑直逼河道,影响整体景观效果;部分河道为传统的桩板式护岸,传统护岸仅



图 3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现状航拍图

侧重于某些功利价值如防洪、水运、灌溉等^[3],忽视了生态性、亲水性的需求。

对乡村河道自然条件的梳理,旨在研究、分析、对比其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存储现状,为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奠定基础,以便有针对性地修复、保留其历史文化元素,凝练其标志性符号,打造根植于历史、富有人文精神、彰显水乡个性、契合当地特色的河道改造方案。

三、乡村河道水景观改造提升的实践路径

通过对绿华镇所在地域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分析与梳理,在保持原有空间、文化和生活连续性的基础上,凝练乡村河道特点,突出乡村河道特色,在水景观改造提升中可运用河道特色文化元素,因地制宜地打造乡村河道水景观。

乡村河道水景观不同于城市滨河。村级河道由于受陆域控制线和周边人地关系等问题的制约,要想将其打造为大范围贯通式成片、成带的滨河景观片区有违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之宗旨,同时此种大拆大建的模式也与节约型、环保型社会发展之要求相悖。通过对绿华镇河道现状的分析,包括特征元素的提炼、自然条件的梳理和实地调研,可采取“生态水利优先、景观点缀亮点”^[4]的规划策略,坚持“基于规划、结合现状,集中连片、规模治理,生态修复、优化基底,人居关怀、突出风貌”^[5]的整治原则。

首先,应总体把控,充分考虑乡村河道的特征元素和自然条件。应从土地和自然系统出发,通过创造性地适合绿华镇本土的规划设计塑造有特色、多功能、人水和谐的乡村水景观。换句话说,应回归传统,建设安全和谐、蕴含地域特色、宜居宜业的现代水乡。在整体设计方案中,应着重考虑河道的生态性,在保证水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软化水岸形态,丰富河道曲线,注重植被的季节搭配,增设实用且美观的景观亲水设施,由小处着手,通过各个节点的景观提升带动区域总体景观效果的提升。

其次,应针对不同问题,实施个性化提升方案。

(1) 针对河堤塌陷问题,在满足河道安全与河道周边拥有相对开阔场地的前提下,去直取弯,堆填造岛,在非建设区域适当开挖大水面,增加河道的多样性(见图4)。

另外,根据滨水用地的不同性质,采用不同类型的生态护岸。由于崇明地区土壤系沙洲冲积土,土质松散,土层一般分上下两层,上层土颗粒较细,略带黏性;下层土粒较粗,土层较厚,属粉砂性土粒,颗粒浑圆光滑不具棱角,在地下水渗透流作用下,很容易发生坍塌。因此,河道需要一定的护岸结构才可保证堤岸的安全,设计中应主要采用生态石笼、圆木桩、柴笼、固化土等形式的生态护岸,并预留挺水植物、沉水植物的种植生长空间,以及当地青蛙、螃蟹等两栖动物登岸所需要的通道,真正地打造生态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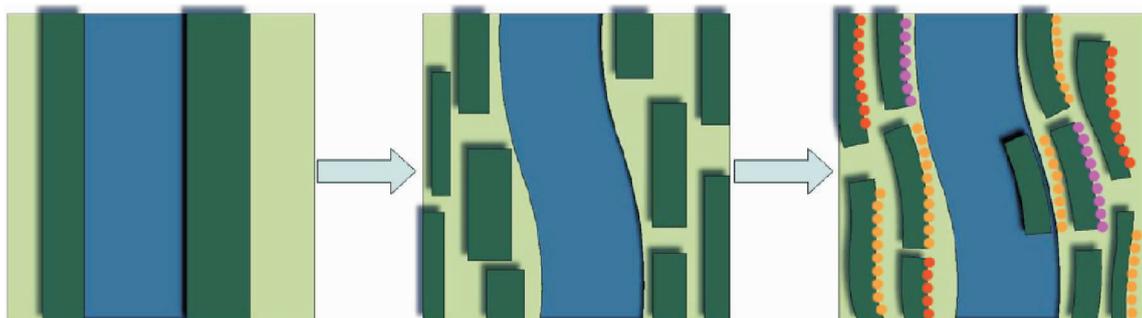


图4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去直取弯示意图

生态河道(见图5)。在陆域控制线相对宽裕的区域可结合《上海市中小河道综合整治和长效管理工作导则》,将部分河段的防汛通道与休闲健身步道相结合,运用“海绵城市”工程技术,将雨水花园等融入河道绿化设计中,作为绿色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雨水花园不仅可保护存在于景观之中的自然过程,而且可将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丰富场地的功能性与可观赏性。

(2) 针对绿化无章问题,以绿华镇镇树(栾树)为主要树种,结合场地实际情况,分段增加主干树种,考虑到后期对河道的管理维护,适当增加挺水植物和水生植物,丰富植物的多样性,

在某些植物种植过于密集的区域可对植物进行抽稀,以利于植物的生长。针对部分河段沿岸存在土地裸露的情况,可在补种植物时考虑季相变化明显的植物,通过不同树种的搭配,以丰富植物资源,使不同季节都有不同的植物景象(见图6)。植被建议补种花草类植物,因现有乔木栽种较为密集,所以不建议补种灌木球、灌木丛之类的植物,可在河道转弯处或者有较大空间处种植,结合花草、树木、景石等形成植物花镜,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 针对原有水坝阻水、影响水质的问题,在方案设计中,制定“拆坎建桥,实地开河”的策略,并对桥梁进行景观升级改造,做到功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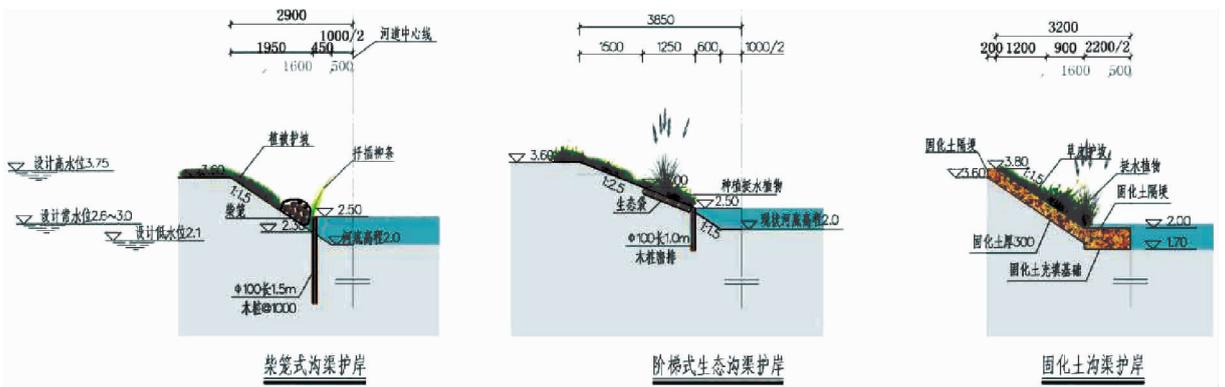


图5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生态护岸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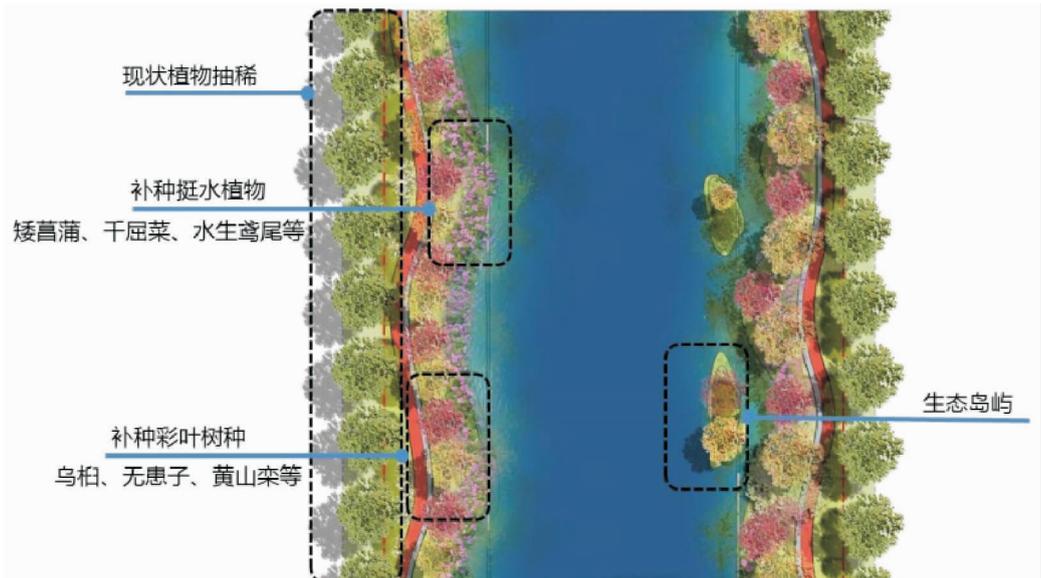


图6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河道景观植物绿化示意图

与美观性相结合。应通过更换护栏、加装装饰材料、布置装饰灯光等措施,并结合桥梁提水曝气装置对桥梁进行提升,以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人居景观环境提升相结合。在桥台与护岸结构交接处应规划种植如矮芦苇、水葱、黄菖蒲等植物,以形成群落搭配。另外,应利用景石对桥台与护岸结构处进行美化,以形成含蓄、自然、多变的局部小空间,使桥梁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除对桥梁进行景观提升外,还应对滨水设施——水桥进行景观提升。现有水桥多是由预制混凝土板制成的滨水阶梯,只可容纳一人,且只有使用功能,水泥板构造与河道整体环境契合度较低。沿线居民多有在水中利用小型网箱养殖的习惯,现有水桥所能够为居民提供的日常活动空间稍显局促(见图7)。因此,可结合护岸形式、河道形态等设计要素对其进行景观提升,设计“凹”字形水桥平面,便于居民日常生活使用。考虑到后期维护与造价问题,可用人造木饰面混凝土平台对其进行外表面处

理,完善水桥使用功能的完整性,并使其更具有美观性(见图8)。

(4)针对河水污染问题,通过水生动植物和其他措施来实现河道生态净化,构建水下全生态系统(见图9)。该系统应包括健康型微生物生态系统、净水型沉水植物系统、景观型挺水系统、浮叶植物系统、生物操纵型水生动物系统,应实现水域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水生植物)、消费者(水生动物)、分解者(微生物)的合理配置,形成食物链循环。该系统的构建可通过微生物、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的配置,丰富生态多样性,提升河道自净能力,构建良性循环的生态环境。

四、结语

通过上海市崇明区绿化镇乡村河道景观改造提升项目的实践,我们发现,乡村河道景观提升改造需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与河道的关系、特征元素与自然



图7 桥梁曝气设施与桥梁原有效果图



图8 水桥现状与提升效果



图9 水下全生态系统示意图

条件的关系、生态宜居与生产发展的关系等。乡村河道景观提升不能仅从景观设计的角度出发,需结合水利、生态、上位城市规划与水系规划,尊重原有的乡村肌理,避免大拆大建。总之,只有在科学把控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从全面认知乡村河道特征元素的维度出发,针对不同问题采取个性化设计策略,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乡村河道的水环境与水景观。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J]. 中国合作经济,2018(2):18.

[2] 刘滨谊,陈威. 中国乡村景观园林初探[J]. 城市规划汇刊,2000(6):66.
 [3] 陈明曦,陈芳清,刘德富. 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构建城市河道生态护岸[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7(1):97.
 [4] 上海水务海洋. 解读上海市中小河道综合整治与长效管理导则[EB/OL][2018-03-01]. <http://www.shanghaiwater.gov.cn/shwaterweb/gb/sswj/n206/n240/n269/u7ai28047.html>.
 [5] 杨锐,王丽蓉. 雨水花园:雨水利用的景观策略[J]. 城市问题,2011(12):51.

(上接第99页)

现,是一项细致而深入的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人们物质生活得到相应满足后,需要越来越关注心理层面上的需求。相信伴随着设计者对城市公共环境设施情感设计上的关注和不断探索、创新,未来我国城市公共环境设施在情感设计方面将更为细腻、更具温度,从而对提升我国城市环境品质,塑造城市形象,张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等,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毕留举. 城市公共环境设施设计[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2.
 [2] 葛明媚. 公共设施——城市意境的外在表达[C]//2011年国际工业设计研讨会暨第十六届全国工业设计学术年会论文集. 杭州: Interna-

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249.
 [3] 黄文论. 城市公共设施人性化设计管理初探[C]//中国第五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改革与战略杂志社,2013:231-234.
 [4] 蒋楠楠. 城市公共设施的情感性研究[D]. 武汉:湖北工业大学,2012.
 [5] 张也. 城市公共设施人性化与艺术化应用分析[D]. 厦门:厦门大学,2014.
 [6] 任东改. 浅析公共环境设施设计中的情感成分价值[J]. 美术教育研究,2012(6):70.
 [7] 张旭,王锋. 城市公共设施交互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2010(5):30.
 [8] 王鹏. 基于物联网概念的城市公交车站人机交互系统设计研究[J]. 中国包装,2014(11):34.
 [9] 刘波. 城市公共厕所的优化设计案例分析与研究[J]. 包装工程,2014(5):117.